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期货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数量 开户时间不限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交易咨询 详情请参阅 <http://www.cnf.com.cn>



华安基金·世界资本经典译丛

市场、群氓和暴乱

——对群体狂热的现代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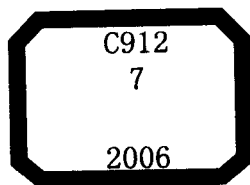
〔美〕 罗伯特·门斯切
(Robert Menschel) 著

Markets, Mobs, and Mayhe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WILEY



 华安基金 · 世界资本经典译丛

市场、群氓和暴乱

——对群体狂热的现代观点

[美] 罗伯特·门斯切 著
(Robert Menschel)

郑佩芸 朱欣微 刘宝权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场、群氓和暴乱——对群体狂热的现代观点/(美)罗伯特·门斯切(Robert Menschel)著;郑佩芸,朱欣微,刘宝权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10

(世界资本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Markets, Mobs, and Mayhem: A Modern Look at the Madness of Crowds

ISBN 7-81098-713-5/F·659

I. 市… II. ①罗… ②郑… ③朱… ④刘… III. ①群体社会学-研究 IV. C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7882 号

☐ 责任编辑 史亚仙
☐ 封面设计 宋 名
☐ 版式设计 孙国义

SHICHANG QUNMANG HE BAOluan

市 场、群 氓 和 暴 乱

——对群体狂热的现代观点

[美] 罗伯特·门斯切 著
(Robert Menschel)

郑佩芸 朱欣微 刘宝权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

上海远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装订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13 印张 199 千字

印数:0 001—4 000 定价:30.00 元

总 序

约翰·邓普顿爵士说过:“一个国家的财富不能依靠自然资源,它应该依靠人们心中的想法和观念。”

近年来,中国证券市场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制度化建设不断推进,市场规范化程度越来越高。股权分置改革,更使中国证券市场实现了一次基础性的变革。与此同时,中国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人比例也在不断提升,各类机构投资人迭次出现,市场投资主体的构成日益丰富。

在这样的投资大背景下,无论是专业的机构投资人,还是刚刚涉入市场的投资新手,均有学习和提高自己的必要,因为在每一个投资决策的十字路口,我们都需要智慧和勇气来作出正确的判断与抉择。

有鉴于此,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策划推出了这套10本“华安基金·世界资本经典译丛”。与我们上一套丛书“华安基金·现代基金投资与管理译丛”不同,本套丛书主要侧重于通俗易懂的投资界名家传记、在各个重要历史转折关头的投资实录等。我们的目标,是以人文、历史的眼光,选择可读性强的证券投资界经典性的作品——它们既可供专业人士在休息时轻松阅读,也可为非专业投资人提供身临其境的实践指南,进而从中有所体悟。

这10本书中,《兀鹫投资者》读来就像是一本悬疑小说。它生动地叙

述了一群寻找并获得资本金矿的投资者的故事。所谓的“兀鹫投资者”，简言之，就是那些买进陷入财务困难或经营有待改善的企业的债务，通过直接或间接对公司施加影响，在改善公司的质量后卖出，从中获取高额回报的投资者。作者罗森伯格的故事讲得惟妙惟肖，生动再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投资风云。

《赢家——华尔街顶级基金经理人》是一本关于华尔街最优秀的共同基金经理人的人物传记。作者通过多年的访谈，记录下这些杰出人物的从业历程、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14 位行业顶尖人物的亲身经历，无疑对国内证券投资人有着极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撰著的《1929 年大崩盘》，自其 1954 年初版以来，在 1955、1961、1972、1979、1988、1997 年不断再版，是学术界和证券投资界经常大量引用的典范性著作。《大西洋月刊评论》认为：“经济文学很少以其娱乐价值而著称，但这本书却做到了。加尔布雷思的文章雍容而机智，并且幽默地鞭挞了这个国家某些金融领域的智者和政策所犯的错误。”

《贪婪的智慧——从为人不齿到受人尊敬的投机史》以翔实的资料，生动记录了美国期货市场的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在 19 世纪，那些雄心勃勃的商人们，是如何在利益的驱使下，为了垄断黄金、白银和粮食市场，而创立现代标准期货合约的；期货市场又是如何在人们的谩骂声中，艰难起步的；而到了 20 世纪，为何会有大量的公司、个人，甚至外国政府迅速进入这一领域。本书在展示期货市场 100 多年来风雨历程的同时，还在人性层面对投机事件作了精彩解读。

《至高无上——来自最伟大证券交易者的经验》记述了历史上 5 位著名证券交易者的成长历程，颇有可读性和启发性。这些在 20 世纪跨上华尔街巅峰的投资者，以其卓越的表现，向读者展示了那些历久弥新的、永恒的投资策略。

《迷失的华尔街》主要分析了华尔街在筹资、提供公司和个人理财建议、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失败现象，并提出了避免失败的对策。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其内容大量来自华尔街的案例，并保持了深入浅出的叙述风格。

《股票作手回忆录》(图文版)记述的是 20 世纪初最显赫的股票与期货



市场、 群氓和暴乱

投资者——利维摩尔生平事迹的经典作品。本书的中文版在上个世纪末曾经出版过;这次出版的译本,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全面展示了 80 余年前这本书在美国《周六晚间邮报》上进行系列连载时的原貌,并配以当时的插图,真实地复原了当时的历史。值得指出的是,数十年来,一代又一代证券投资人,均通过阅读本书,从中学习金融操作所应秉持的态度、反应和感受。

在描述市场恐慌的书籍中,《绝境与生机——市场动荡、风险和机遇》选取了独特的视角——如何在弱市中赚钱,如何面对市场恐慌——因此,别具一格,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本书作者对投资者的一些常见问题提供不同寻常的答复,并指出为什么恐慌会带来独特的机会,并提出了新的理解市场恐慌周期的方法。此外,本书对一些直接介入处理主要股票危机的市场专家的采访和内幕报道,则在最大程度上展示了恐慌发生时的现场真实情况。

《解读华尔街》在美国发行量达到上百万册。该书介绍了华尔街运作的全过程。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这本书帮助各个层次的投资者确切地理解证券市场如何运作,以及在限制风险的情况下,如何建立起有效的投资组合。

《市场、群氓和暴乱——对群体狂热的现代观点》从人类近代史上若干次“群众运动”导致的疯狂与灾难性后果,以及金融市场泡沫的破灭等现象入手,生动分析和描述了人性中的盲目的一面。本书论述生动,旁征博引,从一个侧面诠释了投资者心理学及其如何对市场产生影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中国第一批基金管理人,我们深知:华安基金既是中国基金业的创业者、引领者之一,也应成为市场的培育者和奉献者。我们愿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一起,借这套丛书的翻译、发行,与更多的朋友一起分享证券投资殿堂的智慧与乐趣。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6 年 10 月

译者序

在当今这个凡事均以“成败论英雄”的经济社会中，我们总是过度轻视自身的判断，而将一切希望都寄托于群体。然而事与愿违，经济的盛衰令我们丧失理智，谣言与暗示使我们偏听偏信，恐惧与惊慌让我们无所适从，情感的放任使我们粗鄙凶残，群体与自我之间的平衡则令我们身心疲累。当我们在群体的狂潮中迷失航向之际，《市场、群氓和暴乱——对群体狂热的现代观点》却通过理性而睿智的态度，告诉我们：“当周围的人都丧失理智时，你需保持冷静。”惟有冷静，才能令我们面对成败得失，宠辱不惊；惟有冷静，才能使我们面对流言蜚语，不为所动；惟有冷静，才能让我们面对惊惧惶恐，泰然处之；惟有冷静，才能使我们不屈从于群体暴力的淫威；惟有冷静，才能令我们恰到好处地履行自身的职责。

《市场、群氓和暴乱——对群体狂热的现代观点》的作者——罗伯特·门斯切不仅是高盛集团的高级董事，也是其机构投资部的缔造者。在市场征战多年的他，将自己总结出的经验、原则，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了公众面前。究其核心，罗伯特的主旨依然集中于：相信自己的能力、保持头脑的冷静、作出理智的判断。同时，作者结合了生动的事例，旁征博引地将自己的观点生动而鲜明地展现于读者面前。就体裁而言，其中涉及了小说、诗歌、寓言、童话、新闻……就内容而言，其中涵盖了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心理……于是，在解读经济现象的同时，我们也有幸涉猎了多种文体，接触到

各色内容。因此,如果您在探究经济原理的同时,还希望能够开阔自身的视野,丰富思考的路径,那么,阅读此书将是一次不错的体验。

不仅如此,罗伯特·门斯切并没有将本书简单局限在经济学讨论的范畴中,而是将我们引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对于人性的思考。作者通过精辟的论述告诉我们:坚持自我、保持独立。而我们又如何能在狂热群体的环抱中坚守住理性的阵地呢?于是,在作者的指引下,我们获得了这样的答案: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冷静的分析、坚定的信念,作出判断和抉择。同时,作者希望我们:以一种包容而辩证的态度看待群体,而不是将群体本身全盘否定。由于作者抱着客观、求实的态度进行观察判断,于是,本书便具有了一种兼容并蓄的风格特色,透射出一种圆通开明的处世哲学。它不但摆脱了狭隘的“非是即否”的价值判断,也将帮助我们用一种更为全面、成熟的观点,分析各项现实问题。

或许,孤独的坚守并不容易,因为坚持自我意味着接受生活中的平淡与枯燥;或许,前行的旅程并不坦荡,因为在狂潮中保持冷静原本就有违人类的本能;或许,问题的解答并不简单,因为粗鄙的情感总是让我们迷失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既然我们已经在内心树立了明确的航标,就应当向着彼岸坚定地探寻下去。

译者

2006年10月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前言

唱反调

H. B. 尼尔(H. B. Neill)是一位来自佛蒙特州的思想家。他在其 1954 年出版的《逆向思考的艺术》的献词中写道：“爱唱反调的人(contrarians)和自由论者遍及各地，其人数必将增加！”

这就是目前《牛津英语词典》的编撰者能够查到的“contrarians”(爱唱反调的人)一词的最早使用。这种比较新式的用词方法源自拉丁语中的“contra-”(相反的)，它完美诠释了一小撮脾气暴躁且敢于打破旧传统的人。这些人逆流而行、格格不入。在旅鼠一般的传统思想家眼中，他们喜欢同自己为难；尤其是当他们明明作出正确判断、明明获得财富、明明找到幸福的时候，却总是自找麻烦。

不，我们的人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并未增加。就算在荷兰人暗中潜入、然后大肆传播“郁金香狂热症”之后的岁月里，这一数量还是没有增加。事情理应如此：依照定义，由于鼓手不同，鼓点无法取得一致；而“一群个人主义者”的说法原本就自相矛盾。爱唱反调的人是永远的少数派，他们无法以温和的态度获取智慧，也不能像多数人那样惶恐不安地自欺欺人。

执拗的做派并不值得称颂。我们知道：通过隐居度过平静人生的灵魂无法同人性和现实取得一致。一味的抵抗(譬如：不惜一切地想要与众不同；或者更糟，刻意费尽心力地将自己界定为另一类人)只是顽固的消极论，而不是真正的唱反调。尽管真正爱唱反调的人有时也会态度强硬地抵

制过度流行的风潮,但他们却清楚地意识到:草率的坚持绝非明智之举。

在雪城大学就读时,我住在一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预制的宿舍里。当时我的室友罗伯特·门斯切(Robert Menschel)向我推荐了查尔斯·麦凯(Charles Mackay)在1841年创作的《大众错觉与群体狂热》。实际上,当我们还在布朗克斯科技高中时,就曾首次联手,身着象征个性的制服。门斯切对于揭示群氓心态的古怪书籍情有独钟,他对这类书的痴迷程度远远超过了对财经课程中指定篇目的喜爱。他将那本破旧不堪的《疯狂》奉若《圣经》,并从中引经据典。门斯切还偏爱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格言警句,比如:“伟人能在茫茫人群里尽享独处的自主。”听了这话,我的回应是:“那就让我一个人呆着。”

好在门斯切并没有照本宣科。他不断提炼并学习着一种生活哲学:“既不要受他人过度激情的左右;也不要因他人的惧怕而畏缩。”由于他在投资时秉承了这一方针,才在过去的40多年里保持着20%的平均年收益,从而使高盛公司的同行对其敬畏有加。也正是在高盛公司,他化身为投资界的一个传奇。由他组建的事业部为华尔街的顶级投资银行树立了楷模。当门斯切50岁时,当许多像他这样年纪的人正为了个人积蓄四处奔波时,他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位慈善家。在过去的20年里,他接管了一家私人基金会,并且大幅提升了标准普尔公司的平均股价。作为高盛公司现任的高级董事,门斯切施展着自己在金融和营销领域的才能,指导着医院、学校、图书馆和美术馆的发展,并给予各种支持与鼓励。这其中就包括纽约现代美术馆,而他同时也是纽约现代美术馆的现任馆长。门斯切是一个最可靠的受托人。他在就任期间总是致力于推动董事会或投资委员会的发展;同时,他自己在行动中又有着一套判定“优秀”的独到标准。

时至今日,门斯切的一位弟子仍然在解读:当人们陷入群体的情感漩涡时,会发生哪些令人费解的转变。他的研究兴趣不仅限于经济的盛衰、营销掀起的风尚以及对于生化恐怖分子的恐惧。“群体狂热”这条旧式短语所蕴含的主题,贯穿政界、传媒,体现出战争期间的狂暴与和平年代的矫情。究竟是怎样的政治风潮阻碍我们作出更为正确的判断呢?为什么在动用私刑的群氓中,原本冷静的个体也会变得狂暴盛怒呢?是什么原因使企业陷入困境呢?当我们面对接踵而至的变故时,如何会变得麻木不仁、自私自利呢?

这本书生动地介绍了令人惊异的决策失误事件。同时,选集编者也竭力地找寻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告诫人们不要重蹈覆辙。从某种角度看,



《市场、群氓和暴乱——对群体狂热的现代观点》是一本“通俗读物”，它采纳了人们一生中所面临的各种阻碍心智探寻与发展的困惑，并给予了——解答。而从另一种角度看，书中的信息又与“通俗”一词背道而驰。书中既有瑟伯对愚蠢至极的莫名恐惧的打趣，也有对于人类仇恨传播的反思，后者至今仍使人类蒙着羞辱的面纱。

无论身处何地，我们每个人总能不时听见蜚短流长与同伴压力的浅唱低吟，它们最终不可避免地汇入群体的呼声之中。宣扬要打破旧传统的人们时时警惕着传统智慧的侵袭；由于媒体的大肆鼓吹淹没了其他声音，于是我们对其置若罔闻，直到自己最后在“大鱼吃小鱼”的世界里（水族馆里鲨鱼池的驯养师是这么说的）引得水花四溅。当有人站出来镇定地宣称皇帝什么都没穿时；当公众又恢复了原有观点时；当咧嘴而笑的柴郡猫^①怀着懊恼的心情销声匿迹时；当队伍朝着另一方向迈进时，也就宣告着“唱反调时刻”的来临。

的确，群体并不总是狂热的。爱国热情可以朝着好的方向引导。一个民族的集体智慧至少该受到一定的尊敬。本书的末尾引用了卢迪亚·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对于个性的经典礼赞——《是否》，以此向那些面对全球恐慌却仍坚持自我、不为所动的人们致敬。然而，这首诗现在却被一些人肆意篡改，成了“当周围的人都丧失理智时，如果你还能保持冷静，那么你可能并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这就是说：对于正确判断、优秀品质和美好生活而言，目前，最大的威胁源于盲目追随潮流的脉动。本书作者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并在以下事件、评论、箴言的叙述中都融入了自己的观点，使我们能够再三思考“通过合作，和谐相处”的含义。

当你确信上天无路时，你要向下方观瞧。当人们都忙着射击时，你要停止开火。当别人以为前途渺茫时，你要投资。当你嗅出蛊惑人心的信息时，不要加入这个团体。当发现自己正被兴高采烈的民众扛在肩头时，你要及早悬崖勒马。

威廉·萨菲尔
(William Safire)

① 《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那只爱笑爱无缘无故消失的猫。——译者注

致 谢

我要感谢霍华德·敏兹(Howard Means),他的学术理念、文学标准和思想内容都使我受益匪浅。倘若少了他的工作,本书根本无法面世。

我要感谢以下人士多方面的帮助。感谢杰弗里·胡恩(Jeffrey Hoon)和谢尔曼·克莱尔(Germaine Clair),他们初期的努力和想法促进了本书的形成。特别感谢彼得·伯恩斯坦(Peter Bernstein)和彼得·多尔蒂(Peter Dougherty),感谢他们无私贡献出自己的时间并给予我鼓励。

为了我得到的建议,为了我们终生的友情,我特别感谢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还要感谢我的儿子——大卫(David),谢谢你的指点和初期的意见;感谢我的女儿——劳伦(Lauren)。

我还要将许多的感谢给予我一生的伙伴和文稿代理商——莫顿·L. 詹克娄(Morton L. Janklow),以及他的助手安妮·赛布尔德(Arne Sibbald),感谢他们夜以继日的工作。感谢约翰威利(John Wiley)出版公司的编辑阿里·斯图亚特(Airie Stuart)和她的助手艾米丽·康维(Emily Conway),感谢她们的指导和专业建议。

我非常感谢弗吉尼亚·克利登(Virginia Creeden)为获得版权许可所做的工作,感谢克莱尔·休斯曼(Claire Huisman)和英谱里森图书杂志服务社,他们帮助了此书最后成形。感谢我12年来的行政助理——玛丽安·森麦可(Marianne Sammarco)以及她的助手杰奎·卡罗(Jacquie Carroll),她们工作兢兢业业,为人富有耐心。

最最感谢的是我的妻子乔伊斯(Joyce),永远感谢你。

致
谢

序 文

一场大规模的恐慌

去年,炭疽热“时疫”席卷了美国。所幸,受害者人数不多,地区分布也有限,因此不算是一场真正的时疫。然而一场大规模的恐慌却由此产生。它的出现是因为少数病例和自然恐惧产生的乘数效应,是因为媒体的过度宣扬,还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因特网重新连接的世界。

“高等法院因炭疽热恐慌关闭:数千民众急需救治”——《华盛顿邮报》上刊登着这样一条头号标题。新闻迷们已经煞费苦心地在报刊中找到了这篇有着 11 个段落、长达 14 页的文章,从而了解到:有人在空气过滤器中装入了疑似炭疽孢子,然后将其放入最高法院的仓库内。这是乔治王子县城郊某个未经透露的地点;事发地点并不在最高法院的主楼(主楼位于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的市区,毗邻美国国会大厦)。但是新闻迷毕竟为数不多;现在,此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对于当时在最高法院仓库内的少数工作人员而言,炭疽热事件显然是一种现时的威胁。对于那数千名急需救治的华盛顿市民而言,这篇文章也无疑切中了要害。当时再没有比手拿一瓶绿色的环丙沙星胶囊更为引人注目的了。最高法院主楼里的工作人员(包括 9 名法官)感到紧张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材料就在仓库与主楼之间来回流转。果不其然,4 天后人们就在法院召开例会的地点查获了少量炭疽孢子。好在法官们出于安全考虑,事先已经转移到了新的街区。

可是当美国其他地区的千百万民众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最高法院和炭疽热的新闻时;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当他们通过电视看到并听到这条新闻时,故事似乎产生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效果。人们在想:连这些社会名流都险遭变故,何况是我呢?连国家首府都危机四伏,何况是纳什维尔或者塔尔萨、弗雷斯诺或者法戈呢?这一回,公众都染上了歇斯底里的毛病。在纽约,人们纷纷涌入急诊室,检查自己类似感冒的症状是否就是致命的炭疽热发作的前兆。医疗体系原本就受到“世贸中心攻击事件”的影响而不堪重负,这下更是濒临崩溃。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美国有线新闻网络、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福克斯新闻台、微软全国广播有线电视公司和许多互联网上突然出现了一帮速成专家,屏幕上不时穿插着演说家们神情惊讶的头部特写。炭疽热恐慌不断扩散,似乎惟一安全的解决方法只能是:离家出走、减少呼吸,甚至仅仅通过电子邮件鸿雁传书。

群体狂热就是这样发展而来的。

关于大规模的恐慌还有第二个例子。从某些角度上看,它更具威胁力:人们担心经济辉煌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人们担心股市的低迷不仅只是昙花一现,这种现象可能长达几年、十年,甚至更久。

在过去十多年里,那些没有获得任何实际支持的公司可笑地鼓吹所谓的高额股价,于是受到诱惑的投资者便蜂拥着涌向山顶。加之媒体似乎总在报道中承诺股价会不断地呈螺旋式上升,终于引发了一场投资狂潮。而即便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普通商业分析员,哪怕他已忘记或者从不知晓此类历史事件的最初例证,他也会对这些投资者嗤之以鼻。[可参阅詹姆斯·K. 格拉斯曼(James K. Glassman)与凯文·A. 哈赛特(Kevin A. Hassett)著的《道—琼斯 36000》。该书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近 30% 的时候,预见到它会再度反弹 300%。]投资者不久又蜂拥着冲下同一座山。这一回,他们下山的速度比上山时还要快。然而,与往常一样,真理存在于两个极端之间。

我们晚上就寝时,联邦政府还在洋洋自得地夸耀着 4 万多亿美元的盈余。可是当第二天早晨我们醒来时,这些盈余却好像不翼而飞了。与此同时,联邦预算官员们还在加班加点地工作,试图推算出未来 5 年的数额和未来 10 年的数额。但是,就连他们也无法确定能否在接下去的 15 天里得出账本底线。

在传统智慧看来,如果美国民众能够将政府持有的退休基金投入股



市,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长期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但不久之后,安然公司这家以休斯敦为大本营的能源贸易公司轰然倒闭。这时,传统智慧又突然宣称:那是一个危险的歪点子。

当日本经济持续繁荣时,谁都知道这其中的原委:当时,政府、银行、工业,甚至工人都在千篇一律地工作。当日本经济衰败时,大家也都知道其中的原委:裹足不前的思想太多,而独立的呼声又太少。于是,惊慌逃窜的群体忽然扭转方向似乎也就非常合情合理了。

2000年夏天,我来到长岛东端风景秀丽的东汉普顿度周末。假期里,一位过去在高盛投资公司(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几乎都在高盛公司度过的)的合作伙伴邀请我去参加他举办的午餐会。当时出席午餐会的8个人里还包括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他那时已经接替了罗伯特·路宾(Robert Rubin),成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财政部长,并即将担任哈佛的校长。过去,这个团体几乎每年都要聚会一次,大家就股市和经济的各项问题展开讨论。当时,拉里记起我曾在上次聚会时极力反对购买高倍数的科技股票。

“瞧瞧思科,”这回他问我,“现在你还认为向科技领域投资是错误的吗?”

这个问题本身很有道理。作为高科技投资者的宠儿,思科当时每股被炒到了66美元。但我却坚持自己的立场。

“没错,”我说,“现在思科的销售额是自身收益的200倍。可是有谁会相信呢?”

当时列席的是一群精明的投资者,大家都为自己和股市中的客户赚取了丰厚回报。然而,没有一个人能接受我的这种观点,因而他们反驳道:“思科是一支能留给自己孙子辈的股票。”在众人眼里,它的走势只可能上升。一年后不久,思科股票从峰值下跌了80%,而大家却依然相信它会向上反弹500%,回到原来的位置,因为人们都认为它是一支“不可错过并可以留给孙子辈”的股票。

结果,即便在投资者对行情了如指掌的前提下,还是爆发了一场群体狂热。

最后还有第三场发生在美国的恐慌时疫。它没有固定的形式,却可能是所有事件中最具摧毁力的。对于恐怖主义的恐惧,对于2001年9月11日袭击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恐怖分子(白宫或者国会山除了为美国联合

航空公司 93 号航班上乘客们的勇气而动容,也可能为恐怖分子感到震惊)深深的忧虑,都只是冰山的一角。

从我读到与听到的所有消息来看,现在的恐怖分子根本微不足道。而义愤填膺的年轻人都准备投身前线、浴血疆场。而从我了解的全部内容来看,生活在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我们能够运用知识与意志,在不对自身社会形态以及信仰作出妥协的前提下,成功战胜这些恐怖分子。即便如此,群体狂热还是将理性的镇静抛诸脑后。

从逻辑上讲,对抗所有那些大规模的恐慌并不困难。在炭疽热恐慌出现的一个月里,因吸入炭疽孢子而记录在案的死者有 4 人。另外 14 名得到确诊的患者中,有半数的人只是出现了各种皮肤感染,情况并不危险。就算将之前几个月的死亡人数乘以 800,其总数仍旧小于 3 300(这是 1952 年死于脊髓灰质炎的美国人口,当时报道的病例几乎就有 58 000 人);而与 1916 年(这是美国历史上脊髓灰质炎最泛滥的一年)7 000 人的死亡数字相比,其结果更是不足一半。其实,与被雷电击中的几率相比,即便你手持着高尔夫球棒,你感染炭疽热毒素的几率似乎要小得多。

我无意漠视那些身染炭疽热毒素的受害者及其家庭和爱人所经受的痛苦,也不是要淡化与如此微小的已知物质展开斗争的复杂性。然而,数字的确能够说明一个问题,它告诉我们:与恐惧诱导出的结论相反,其他所有的测算均表明,炭疽热远未达到时疫的规模。

美国于 1858 年爆发黄热病,在密西西比河下游超过 13 000 人因此丧生。1981 年至 2000 年 6 月间,美国有记载的死于艾滋病的人数约为 440 000 人。1918 年和 1919 年,流感疫情夺去了 550 000 美国人的生命——当时,每 21 个美国人中几乎只有 1 人能够幸存。相比之下,那些才叫时疫,而炭疽热不过是恐慌而已。

数字讲述着,或者说,数字应当讲述着一个同样可信的故事:当因特网形成的泡沫破灭之后,股市随即崩溃。至 2002 年中,道一琼斯的平均价格从 2000 年 4 月的高峰下跌了将近四分之一。仅在 2001 年的前 10 个月,标准普尔公司 500 支股票的平均价格就下跌了 28%。纳斯达克的平均价格在市场泡沫中攀升得比谁都要高,而一旦投资者决心不再支持这种疯狂行为时,它却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幅度开始下跌。可是,正如我们不久之后将会看到的,股权投资市场讲述着这样一个简单而永恒的道理:股权投资市场能在极端情况下进行自动调整。当初,投资者本应将股市暴跌看成



一次购买真实价值的机会,而不是恐慌。

说到恐怖主义对西方工业化国家构成的威胁,我们遇到过更为恐怖的敌人,而准备曾经更不充分。荣获普利策奖的历史学家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在《纽约时报》2001年10月28日的报道中提醒读者:1942年初,美国人民的希望似乎极为渺茫。在大西洋的彼岸,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已陷入了纳粹的魔掌。苏联即将沦陷,英国也是岌岌可危。在太平洋的彼岸,驻守新加坡的大批英军即将向日本人投降。美国的大西洋沿岸被德国潜艇团团包围,海上运输行将瓦解。在北美大陆的另一边,满目疮痍的珍珠港使加利福尼亚在日军先遣部队眼中不堪一击,以至于“玫瑰杯”美式足球赛的赛场向东推进了2500英里,来到了杜克大学的足球场。

“面对这些威胁,”肯尼迪写道,“美国孤立无援、毫无准备。国家只能蓄积有限的资源与敌军抗衡。而当时,美国的经济因为长达10年的大萧条一蹶不振;美国的海军自珍珠港一役形同枯槁;美国的陆军人数不足百万,装备陈旧、未经训练……当时凄凉而绝望的场面令人难以想像。然而,我们都知道故事最终的结局: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不到4年的时间,美国就彻底击败了仇敌。”

这段故事也就到此为止;而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竭力排除通过多种方式动摇社会的过度元素:股市中的过度评价、传媒的过度炒作使人们面临每一次新的临时转变,都会反应过度。自信的过度膨胀使人们以为:其他国家的问题不会在自己国家出现;企业规模的过度庞大使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数额惊人,使办公楼宇的规模自行扩张。

从某个层面上看,几乎所有人在事发之前都知道:负责监管飞机乘客及其手提行李的警卫们不该每小时只拿6美元的工资。联邦航空局知道监管存在不足。飞机驾驶员对此也深信不疑,因此只要有时间,他们就会站到驾驶舱外面,从乘客登机的一刻起就留意对方的举动。然而即便如此,仍有3000名美国人死于非命;故事告诉我们,制度有多么失当,我们让自身的安全体系变得多么松散。

我们还是要准确地报出这个数字——3000人死于那天清晨的袭击。1865年4月27日,当“苏丹娜”号蒸汽机船在密西西比河上爆炸时,约有2000名美国人丧生。当时,美国的人口还不到今天的八分之一。许多死者都是联邦政府的战俘,他们一个个瘦骨嶙峋,在经历了4年的美国内战后终于踏上了返乡的旅程,却因此命丧黄泉。总而言之,“苏丹娜号事件”

是一次石破天惊的灾难,因为如果计算死亡人数占美国人口总数的百分比,将近2 000的死亡人数就相当于今天的16 000人。而相形之下,爆炸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少关注,时至今日,它几乎已被人们所淡忘。至1865年4月,美国人已经目睹过太多的死亡;当时的人们企盼着重新开始生活。我们今天的美国人也将企盼重新开始生活;现在看似无法抵御的灾祸终将缩到某个角落,尘封在人们的记忆里。

你可以再一次对银行作出预测。一旦我们排除了过度元素,一旦我们有办法应对惊人的数额,一旦我们度过了社会动荡的岁月,某一种或某一类新的狂热必将再次席卷而来、再次萦绕于人们心间。因为群体最根本的属性是:群体希望获得引导,却常常忽略了方向。身为个体的我们能够期许自己作出的最佳选择便是:当周围场面失控时,学会站到一旁、保持自身的理智。

我们中有许多人在人生的初期便首次得到过群体行为带来的教训。也许我们曾经大着胆子从住宅区附近的商店里偷了一颗糖;也许我们看到别人都在吞云吐雾,而自己又想成为该团体的成员,于是就吸了第一口烟;也许我们曾经和伙伴一起在操场上嘲弄过弱小的同学。本能几乎毫无二致。当我们被逮住并被带到父母面前时,自己的第一句辩护词也几乎总是相同的:“其他孩子都这样做!”

我知道,当我因为某种类似的违规行为,被第一次拽到母亲面前接受惩罚时,就是这种反应。即便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仍能想起母亲当时的反应,她说:“如果你的朋友从桥上跳下去,你也跟着跳吗?”那时我真想大叫:“这是哪儿跟哪儿呀!”可是如果回到那时,我也许真的无法肯定是跳,还是不跳。

同伴压力就这样在孩提时代左右着我们,它本应随着我们的长大成人而消失。我们已经完成了大学课程,获得了军士军衔,在职场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我们在抵押单上填上了自己的姓名,现在随身揣着一只装满信用卡的钱包。毫无疑问,经历过所有这些,我们已经获得了独立。然而,同伴压力却并未消散;相反,它可能会进一步地扩展、加深。年少时想获得团队接纳的愿望曾经推动过我们;现在,它又成为获取事业成功和个人成功的原动力。而现在我们见到的已不是当初在教室里制定规范、惹人喜爱的孩童,而是一群强制实施者。

我们向自己并不真心喜欢的领导讨好卖乖,因为我们担心如果不那样



市场、 群体和暴乱

做就会处于劣势；我们在员工大会上缄默不语，因为我们害怕触怒上级而无法得到晋升；我们根据自己深知并不可信的股市秘闻开展行动，因为我们不希望秘闻一旦属实，自己落于人后。

许多时候，我们这些与内在自我的妥协不会造成有形的伤害。社群要求一定数量的成员通过合作和谐相处。然而，当我们为了集体的意愿和决断而牺牲个人的意愿和决断时（即当我们将各自微小的妥协转交给集体时），问题便出现了。群体越是庞大，左右群体的力量就越大，群体就越容易舍弃个人的意愿，我们各自妥协时所汇聚成的力量也就越大。

当我们伫立街角、凝神思考时，可能从未想过要抬头看看街对面建筑的屋顶。可是如果我们身旁的某个人正聚精会神地望着楼顶，那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往上看；并且，当其余 6 个人都跟着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几乎就不可能置身事外。当然，所有这些事都无伤大雅（假设群体里没有扒手），但相同的原理也可能引起更为凶险的行为。

从个人的角度讲，当有人硬是要把在街头开店的阿拉伯裔美国人与摧毁了世贸中心塔楼并袭击了五角大楼的恐怖分子扯上关系时，我们都会觉得可笑。这就好比 1941 年，当有人怀疑那些在公路外围养花护草的日裔美国人就是轰炸珍珠港的空军恐怖分子时，我们原本会觉得好笑；或者就像 1776 年，当有人将来自伦敦的新邻居说成是英国兵时，我们原本也会觉得好笑。然而，在群体中，个人的意愿势必减弱。原本可笑的事成了可能的事；可能的事又成了极有可能的事，而极有可能的事又成了肯定的事。受到群体思维的摆布，我们发现自己正在抵制穆斯林杂货店老板的商品，正在拥护将身为日裔的美国园丁及其妻儿拘禁起来的主张，正在要求将亲英分子拖到市镇广场上大卸八块。

个人常识说：将股票按照高于收益 200 倍的价格出售是不切实际的。群体意识却说：如果是 200 倍，怎么就不可能是 400 倍呢？那时，我们的投资就可以翻一番了。个人常识说：美国每天会收到超过 5 亿封来信，却不会因此危及任何一个收信人的安全。群体意识却说：一封涂有潜在致命炭疽孢子的邮件就会污染整个邮筒。个人常识告诉我们：美国的繁荣是由于我们构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它兼容并蓄了各种不同的种族与信仰。群体意识却说：“美国，要么爱它，要么离开它”，并开始火上浇油，而它也确实这样做了。

人们似乎总感觉现在的时光才是惟一的。过去已经不复存在，将来又

序
文

难以捉摸。“现在”是十字路口,是门槛……此外,未来在过去的循环往复中不断衍生。与 70 年前的股市相比,如今的股市有所不同。今天,货币风驰电掣一般绕行于世间。机构投资者更多地通过电脑而不是个人作出买卖决定。然而与经济大萧条之前的股市相比,或者与 4 个世纪以前的第一批股市相比,今天的股市却别无二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股权投资市场都会将人们聚集起来,共享风险与回报。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风险与回报因为失衡导致失败时,投资者也会找寻责任人。过去,股票分析家即便接受了过高的评价,却仍一直鼓吹因特网股票和通信业股票;其实,他们和他们所在的经纪行不配得到国民的任何赞誉。在太多的事例中,给予建议和收取佣金之间本应存在的商业防火墙消失了。而那些拿起听筒或者登录电子交易账户、安排订购单的人并不是股票分析家。体制是有缺陷,但正是那些臣服于群体规范的个体因地制宜地作出巩固疯狂的决定。经济大萧条之前的泡沫市场就曾表现出这样的特征;而当今预示着更少市场崩溃的泡沫市场也曾表现出这样的特征。

今天的新闻蒙蔽着我们的双眼,然而历史中大量的事例却表明:群体行为可能从未得到大多数群体成员单方面的支持。1964 年,当甲壳虫乐队乘坐的班机首次抵达美国时,长岛的爱德怀德机场挤满了想要一睹其风采的歌迷;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每当艾尔维斯·普莱斯利(Elvis Presley)登台亮相时,大批观众就开始尖声高呼“骨盆猫王”;在我们上一辈人生活的年代里,时尚少女们一想到新泽西那个形体瘦小的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就变得心醉神迷——这些事例都说明:个体的行为标准源于个体所在的群体,而非个体本身。治安维持会成员审判、私刑处决、大屠杀,甚至种族灭绝,同样都是极端的事例。自古以来,人们就对流行偶像展开集体崇拜,对置身群体规则之外的个体实施集体暴力。

传媒和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能够加速这些大众错觉的形成,而大众错觉又左右着群体。奥逊·韦尔斯(Orson Welles)于 1938 年,根据 H. G. 威尔斯(H. G. Wells)的《星际战争》改编的广播剧,时至今日仍堪称经典。尽管广播剧的播出前后争议不断,尽管剧情中存在明显的虚构,仍有许多人成功地劝服了自己,认为自己当时真的听见:火星人发布着将以善意方式入侵地球的消息。回首往事,大众当时的表现全无逻辑。但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假如你先是听到外面一阵骚动,接着又被亲友们的电话团团包围,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最后,当你打开无线电时,广播里正报道着相关讯息,你会有何感想呢?当防空警报、寝室传闻、电波嗡鸣交相辉映时,人们便开始相信电台编织的科幻故事。

电视在某些方面比广播更有效率。电视节目将声音与图像相互融合,并配以残暴的竞争背景,争先恐后地刺激着观众日益脆弱的神经。于是,即便最具格调的商业新闻的发布也会变得耸人听闻,它将原本普通的事件变成了恐惧的源头,而后者又引发出公众的恐慌。

说到制造错觉,互联网首当其冲。数以百计乃至千计的幻象奇景(这其中既描写了罗斯威尔、新墨西哥、天外来客,也阐述了各种错综复杂的阴谋理论;还告诉人们:购买连家具都没有的企业的股票能够发财致富)被具有高度自我判断能力的受众鲜活地存留在网际空间里。而由于受众仅以单线形式进行亲密的交流,因而缺乏辨识真伪的能力。

传媒与因特网对错觉的形成和大众的群体行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後者的出现却并不能归咎于前者。在个人电脑问世前的一个世纪,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在美国的追随者就变卖了他们平生的积蓄、群集于山顶、等着世界末日的到来(而世界末日从未降临)。1962年,北卡罗莱纳州的一名纺织厂工人声称自己被某种毒虫咬伤了。一周之内,他的同事中有62人也说自己被咬了,并出现了皮疹和包括恶心在内的其他症状。而接下来的事实却表明,所谓的毒虫纯属无稽之谈。人们之所以会产生各种反应,是因为口传带有暗示,并能将暗示转化为足以创造出自身真实的真理。

傻瓜?当然,我们现在知道:米勒追随者们所谓的世界末日,纺织工人所谓的毒虫都是子虚乌有。可是说到群体行为,冒那么一点儿傻气似乎再正常不过了。

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哪个能占上风(即人性中最美好还是最丑恶的一面会得到展示)部分取决于由谁来领导。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华盛顿广场面对25万民众,疾呼:“让自由之声响起吧,让自由之声响起吧”;而早在此前的30年,阿道夫·希特勒(Adolph Hitler)就激起过德国民族对于少数民众的仇恨。两者都把握住了群体的心智。不同的是,金呼吁听众拥有更美好的本能,而希特勒却煽动着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而两者肯定都知道:多数人总是跟随少数领导者的脚步。

难道每个在城市暴乱之后洗劫商店的人本身都是窃贼吗?答案是否

定的,然而,一旦少数领导者创建出一套新的社会行为规范,国民便会开始采用新的行为模式。难道每一个摧毁了敌人机枪掩体的人都是与生俱来的英雄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然而一旦天生的骁勇在他们战友的心中创建出规范,勇气必定会在士兵当中蔓延开来,这就像怯懦必定会在动用私刑的群氓中蔓延开来一样。同样,在极度混乱的市场环境中,每一个以接近峰值的价格购入股票或以接近谷值的价格卖出股票的人都不能被说成是十足的傻瓜,甚至是乌合之众。他们只是购入了一种集体逻辑,这种逻辑将人们从个人角度认定的明智之举统统打消。

常识与群体意识哪个能占上风,取决于我们谈论的是哪种群体。群体的许多形式(从心不在焉的群体,到示威团体、骚动的群氓,甚至更糟)都类似于发热症状的逐步升级。谣言和暗示影响着群体的心智并将其引向恐惧和惊慌。未受抑制的恐惧和惊慌化作暴力行为甚至形成治安维持会的政策。群体总是在煽动家的心中萦绕,后者想方设法地将群体的感情引向特定的目标;在今天这个相互联结的世界里,煽动家们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集结到受众。

电台脱口秀、电视上泛滥的演说者头部特写和因特网聊天室已经创造出本质上极为分散的群体,即已经具有自然群体所有特征与情绪的传媒群体。这既取决于如何利用这些群体,也取决于群体成员接受暗示的能力。而至于群体是真是假,群体本身是善是恶,这些最终都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我们是否要“通过合作,和谐相处”呢?我们的个体意识是否应当屈从于群体意识呢?我们是听从他人对事件的诠释呢,还是对自己深知的事实仍旧反复验证呢?

任何群体最危险的因素不在于群体的人数、群体的喧闹、群体的动机或是目标。最危险的因素在于群体产生的一个声音、一种冲动、一项主张;它在你的身旁发出最为强烈的振荡,你甚至以为是自己造就了它。这就是妈妈们知道的“同伴压力”——这是人性中,不安全感与被暗示性相互冲撞的结果。可无论如何描述,群体力量和我们抵抗群体力量的能力才是最终真正的决定因素。当个体逐个地集结时,群体便开始形成。当我们作出投资决策、面对受众溃逃时,当话题涉及品味、伦理时,当政治危机出现、时尚浪潮席卷时,重要的是阻隔你能感受到的外界压力,为你自己想想。

本书旨在告诉你如何摆脱群体,并告诉你陷落于群体中的后果。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紧张情绪会侵袭我们所有人,即便在我们撒手人寰的很长一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市场、 群氓和暴乱

段时间内也仍会如此。然而,那些在同伴们惊恐万分之时能够抵御压力的人——他们依照自我判断行事而不因群氓的多寡盲从——总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罗伯特·B. 门斯切
(Robert B. Menschel)

序
文

目 录

总序	1
译者序	1
前言	1
致谢	1
序文	1
第一章 繁荣、泡沫和衰败	1
引言	2
吞噬荷兰的泡沫：郁金香狂潮	7
繁荣和泡沫	11
新土地、新方案：南海公司和密西西比公司	13
恐慌和挤兑	18
崩溃：大萧条	20
他山之石	26

伯纳德·巴鲁克的基础数学和永恒真理	29
做戏:因特网和“新”经济	32
泡沫就是泡沫,万变不离其宗	37
当周围的人都丧失理智时,你需保持冷静	38

第二章 谣言和暗示	41
引言	42
小鸡里肯对于今天的启示	47
无中生有:暗示的炼金术	51
汤姆·沃尔夫笔下的甲壳虫乐队	56
等待戈多	62
新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奇诡之音	65
詹姆斯·瑟伯脑海中的决堤日	68
当周围的人都丧失理智时,你需保持冷静	73

第三章 恐惧和惊慌	75
引言	76
最蹩脚的剧本:火星来了	79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84
易洛魁剧院的大火:“他们已经疯了”	89
分化的机制	92
西贡的沦陷:“有时间的话,就为我们祈祷吧”	93
罗素·贝克:群体咆哮有限公司	95
哈利·杜鲁门之《耻辱的收获》:歇斯底里对我们的影响	99
当周围的人都丧失理智时,你需保持冷静	103

第四章 暴力行为和私刑处决	105
引言	106
洛杉矶,1992年4月29日~5月1日:毁灭之舞	109
是乌合之众,还是抵抗者	114
群体中的兽性	115
私自执法:想不可想之事	118



“尽在预料之中的”结果	120
马克·吐温：天底下最最可怜的是一群暴徒	124
“男人们一边叫嚣，一边投掷石块”	128
卢旺达：当暴民掌权时，恐惧变得平常	130
当周围的人都丧失理智时，你需保持冷静	134
 第五章 领导者和跟随者	 137
引言	138
元首：群氓的呼声	142
旅鼠的看法与做法	146
跟随领袖：非暴力的暴力	147
领导跟随者：火场中的怒火	149
砍下他们的脑袋	152
一知半解是一件危险的事	154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关于领导者和应声虫的故事	155
群氓心理：愚蠢与豪勇的蓄积	159
卢迪亚·吉卜林对领导与跟从的看法	162
当周围的人都丧失理智时，你需保持冷静	164
 文本的出处	 166
 插图与相片的出处	 170

市场、 群氓和暴乱

第一章 繁荣、泡沫和衰败



第一章
繁荣、泡沫和衰败

引言

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股市总在贪婪与恐惧之间不断涨跌,因为推动股市的决策者,本身就在贪婪与恐惧之间沉浮起落。

当市场挤兑到达顶峰时,贪婪造就了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谓的“非理性繁荣”——这等于相信:股市行情曲线会节节攀升;如果你现在还不登船,就会被永远地甩在后面。于是,货币涌向市场。泡沫不断膨胀,人们将以往的评判标准,连同近乎全部的实践意义,统统抛出窗外。而当人们终于凑齐最后一个傻瓜时,秋后算账的日子也就到了。恐惧对自身再度作出断言。非理性繁荣化作溃逃,溃逃化作恐慌,而恐慌又可能化作十足的灾难。泡沫里的空气越多,恐惧出现得就越快,市场下滑程度就越是剧烈。

所有的泡沫市场都有着相似的轨迹,但是通过本章的介绍,我们便会发现,它们又有着各自的特性。如果当初荷兰人没有创建股市,在17世纪前叶席卷荷兰的“郁金香狂潮”(这是现代泡沫市场的第一个版本,即使时间过去了将近400年,它仍旧是一则最为动人的故事)就不会出现。如果当初荷兰没有发觉:是突然如潮水般涌来的郁金香球茎,使自己成为了欧洲贸易业的领头羊,股市就不会出现繁荣。如果当初报界没有鼓吹郁金香的种种好处,也没有提醒读者:除他们以外的每个人都在变得富有,郁金香球茎价格就不会被哄抬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个球茎的价格相当于现在的110 000美元。

理论上讲,在18世纪早期出现的两次市场价格失控(即英格兰“南海泡沫”和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密西西比泡沫”),都是因为将股票公司的创建与爱国情绪融成一体。两者在铺设陷阱时,摆放的诱饵似乎都是:拥有去遥远地区探寻尚未开发资源的专项权力。两者至少在最初都产生过丰厚的回报。1720年1~8月间,南海公司的股票翻了七番,达到每股1 000英镑。而有时候,法国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在开市之后,每隔5~10小时就会翻一番。由于是泡沫市场,两者崩溃的速度和成长时一样迅猛。无论贫富贵贱,所有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遭受了打击。

与“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一样,20世纪20年代佛罗里达的土地繁荣也提供了一种尚未开发的资源:在一个国家里成片刚刚被圈定的土地。只



市场、 群氓和暴乱

第一章 繁荣、泡沫和暴跌

是在最近,随着铁路、大批新型汽车和高速公路的出现,人们才逐渐来到这里。土地繁荣还意味着尚未开发的就业机会——由“咆哮的 20 世纪 20 年代”飞涨的股市创造的票据财富。和所有的泡沫市场一样,在佛罗里达的案例中,不乏各种骗术专家和江湖术士;他们都准备向一群傻瓜出售楼盘;而这些楼盘其实是一片沼泽地,里面还住着短吻鳄、蛇和佛罗里达其他所有的爬行生物。

1929 年 10 月,第一个泡沫市场崩溃了,并就此引发了“经济大萧条”;它的出现本身与过度繁荣密不可分,后者将 20 世纪 20 年代变成了“魅力四射的十年”。当时人们充满了乐观的情绪,低息贷款和保证金账户随处可见。所有的泡沫市场都是咆哮着一路飙升,直至攀上悬崖绝壁,然后纵身跃下。

最近刚刚消亡的互联网市场本身就具备了泡沫市场的特征:一项似乎能够开创新模式的技术。它告诉人们,原有的实体企业将不复存在。从现在起,我们将对各行各业采取非物质化手段,从而能够使其迅速调整方向、轻装上阵。于是,每个人都自觉地加入了购股的行列。按照常理,金融公司本应充当股市的守门员;而当时,它们却每隔一小时就进行新股募集的宣传。有时,人们似乎根本就不会依照原有标准发行公司原始股。这样看来,市场崩溃时出现愤怒的情绪,也就不足为奇,因为支撑起泡沫的,几乎全是一堆空话。

和泡沫市场一样,尽管影响投资人的心理因素各有差异,但从根本上讲,它们往往都是相同的。你不妨回想一下自己在纳斯达克跌穿市底以前购买的最后一支高科技股。当时是怎样的信息或者冲动影响了你的行为?答案可能是:从消息灵通人士那里打听到的一条小道消息。但他又是从哪里得知这条消息的呢?如果消息源自一篇新闻报道,那么它的发行量有多少?如果消息源自朋友的经理人,那么这位经理人又向多少客户散播了相同的信息呢?内部消息只能在内部存留很短的时间。“内部消息”一旦泄露,瞬间就成了“外部消息”。

不久前的一天,我正在浏览“美国在线”的财经留言板,以了解大众目前的投资热点。当时“第三级通讯公司”的留言板上有 235 条记录,于是我决定顺便进去看看。作为华尔街的一代宠儿,“第三级通讯公司”曾被誉为美国光纤网络的缔造者。即便是面对 2000 年 4 月科技股暴跌的情况,其股价仍然维持在 50 美元以上;然而,截至 2001 年中秋,“第三级”已经从探底长达 52 周的 1.89 美元,回升并维持在 3.57 美元。2001 年第三季度的损失达 43 700 万美元,同 2000 年第三季度 35 100 万美元的损失相比,有了进一步的增加。因此我想:现在,人们会对这颗流星作何评价呢?于是,我

随便选了一张贴子,发现它的开头这样写道:

“我的一个朋友是医生。他原本就在‘第三级’投注了大量的资金;他在收听了关于‘公司第三季度收益’的电话会议之后,更是加大了投资力度。他已经对该公司及其股票几年来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并且坚信,公司不但能够经受住这次股市的震荡,而且还会成为电信业的领袖。”

“好吧,也许吧。”我想。然而,当你接到这种通过匿名方式(只用网名,不用真名)传递的二手消息,并将希望都拴在这根细细的茅草上时,就必须告诫自己:这个人也许是个蠢货,也许是个“托儿”,也许真是个诸葛亮。但问题在于:我们根本无从判断。

人们常说:“我们生活在信息的时代。”然而,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信息究竟是什么呢?在金融市场上,许多人都在追寻一个能够永远改变他们命运的奥秘——热门消息;于是,大家都沦为街头假货的牺牲品。我们可以根据星象学家或是茶叶的预示,玩数字游戏吗?绝对不行。但令我吃惊的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在不很了解的情况下,就玩起了炒股;他们受到同伴压力、忌妒和恐惧的影响,出于本能,非常感情用事地想要谋求一条捷径。

同样令我吃惊的是:当这些泡沫市场一如既往地崩溃时,传媒必定会从中找出某个突发事件:它就像一个小孔,开始将空气排出。这就好比孩子们在用积木搭一座宝塔。荒唐的故事就像积木,一个叠着一个,越堆越高,一个比一个不稳定,直至最后,整栋建筑的倒塌看似受到了一块小小积木的影响;然而,并不是某块积木引起了建筑的坍塌,也不是某件事或某支股票的崩溃引起了整个市场的崩溃,问题在于:形成市场的每个环节都不稳定。我们的眼光不应集中在塔顶,而是要观察建筑的基础结构能否支撑宝塔。

凭借 40 多年来自己投资和帮助客户投资的经验,我知道:投资行业里有许多聪明的,但是却没有成功的捷径、取巧的法子和免费的午餐。

在外行看来,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大约 1920 年,他那时以波士顿为基地的证交公司(当时,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尚未成立)就开始提出:通过利用“国际回信邮资代价券”的不同汇率,向投资者提供大量的回报。庞兹起初承诺 90 天里得到 40% 的回报;不久,他的公司发行了两种纸币:90 天 100% 回报率的纸币,45 天 50% 回报率的纸币。

消费者根本无法抗拒这种诱惑。当时,庞兹身边的员工都将纸币叠放在壁橱内;废纸篓里也塞满了美元纸币。然而,还是和往常一样,人们凑齐了最后一个傻瓜;这时,法律也明白了真相。庞兹逃往佛罗里达,在房地产

市场、 群氓和暴乱

第一章 繁荣、泡沫和衰败

市场上故伎重施;接着他又逃往里约热内卢,最后死在了当地的一家慈善机构里。他的名字在死前就被登入了犯罪年鉴。

毫无疑问,在今天看来,庞兹的做法似乎匪夷所思。当时,他利用了波士顿的移民社团,其阴谋显而易见。然而,查尔斯·庞兹的证交公司和里德·斯拉金(Reed Slatkin)(这位加利福尼亚的投资顾问,向包括好莱坞明星在内的800位富豪提供咨询服务,其受托金额将近6亿美元),真的全然不同吗?和庞兹的公司一样,斯拉金似乎也在制造巨额回报;事实上,据斯拉金本人供述:他制作的大多都是虚假收益报表。有时骗术也一样,不过是“老酒换新瓶”。

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初期,当时,塞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和他的“中西部公用事业”是在经济大萧条的洗礼中投资者仍能依靠的几家公司之一。“中西部”当时已经度过了市场崩溃最严重的时期,并且表现良好;英萨尔甚至还向芝加哥市拨出5000万美元,帮助支付当地教师和警察的工资。为了成为一名富于幻想、品德高尚的企业家,英萨尔提出了一个新点子:中央发电站应当夜以继日地工作,帮助抵消其高昂的成本。为了创造需求以满足增长后的供给,英萨尔推出了“全电式”家庭的理念,甚至为该理念的倡导,发明了一个新词组——“密集化生产”(massing production),后来它被简化成“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直到1934年,“中西部公用事业”突然破产。同时,人们发现,公司制作假账由来已久,许多子公司都隐瞒了债务。最后,一连串的股票欺诈使得数千名投资者倾家荡产。

如果用安然公司替代“中西部公用事业”,几乎就是对相同故事进行再现;它们都有着相同的故事元素:一种突破能源技术的手段,一位作出重大政治贡献却讨厌联邦法规的著名董事长,一张由子公司构成且为许多内部投资者所不知的复杂网络,一串公司员工与股东破灭的梦想。

当年“中西部公用事业”的倒闭惊动了政坛:国会在屡遭挫折的两年中,通过了《证券交易法案》、《公共事业持股公司法》、《联邦电力法案》。同样,安然的倒闭也惊动了华盛顿。国会成员在紧急召开的听证会上,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嘴脸,用愤怒的口气,公开辱骂安然的总裁肯尼斯·莱(Kenneth Lay)和其他执行官;而仅仅几个月前,他们还在向安然拉选票,并盛赞公司的创新精神。

在本节结束之际,我想推荐一些具体的投资策略。下面列出的这三条总则,可以帮助你未来避免选择“安然”一类的公司:

● 股票升得快,跌得也快。投资就像“龟兔赛跑”,缓慢而稳健才是制胜的法宝。

● 信息来得越容易,价值就越小。投资决策是一项辛苦的工作,需要一步步地实施来取得一次次的成果。

● 群体越肯定的事情,就越有可能出错。如果所有人都正确,也就无利可图了。

还有最后一条真理:无论社交还是投资——想要自由就得保持永远的警惕。

那么,我们能够依靠谁呢? 我们不能依靠其他人都阅读的报道,因为那都是给“其他人”看的。我们不能依靠那些报纸杂志(一份有着上百万发行量的杂志,想要为读者提供“内部消息”,实属可笑)。我们也不能不动脑筋地听从专家或是分析师的意见,因为你不可能知道这些人的议程。答案当然是:自己获取信息。尽可能去阅读。收听天才新秀的讲话。市场不断考验你的直觉,而最终的胜利,将只属于孤军奋战的你。人群永远都在喋喋不休;群体永远会冲着这边或是那边,发出吼叫;恐惧和贪婪永远想要抢占上风。但要记住最重要的一点:当其他所有人都在做某件事时,你不要做。

市场与群氓反映出人类的各种情感;市场与群氓会引火烧身,自取灭亡。

——欧文·D. 杨(Owen D. Young)



噢,真遗憾,就在5分钟前我接到一个经纪人的电话,于是委托给他300万美元。



吞噬荷兰的泡沫：郁金香狂潮

人类希望买卖的任何事物——股票和债券、现金、石油和天然气，甚至腌猪肉，都能构成市场。只要大家都想冒险发财，就能形成市场。依此类推，泡沫市场（在交易中，泡沫市场里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因为各种原因而发生震荡）也能由任何事物构成。在17世纪早期的荷兰，构成大型泡沫市场的第一个元素，是自然界中一种貌似无关的美丽事物：郁金香。

人们已经注意到这场风波的某些成因。荷兰人真正创建股市是在几十年之前；当时，远洋贸易的拓展帮助这个海运国家过渡为欧洲最大的经济引擎。那时，报纸也早早地把触手伸入荷兰；并且和现在一样，价值飙升的商品都是他们必定关注的新闻话题。致命的黑死病刚刚在1635年和1636年席卷了荷兰，“郁金香狂潮”就进入了高潮。

当时，荷兰的一位历史学家（他来自郁金香的核心市场——哈勒姆），在针对那次狂潮的事后分析中指出：在经历大规模死亡后，时常出现的“鬼才不在乎”的轻率态度，也可能起了作用。

“在整个这起悲剧事件中，我们的城市蒙受了苦难。人们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狂热，大家都产生了想要迅速发财的迫切愿望，并且都认为郁金香贸易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这听上去像20世纪90年代在网络市场泡沫里影响投资者的“特殊的狂热”，事情本来如此。起初，经济交易的范围不但非常狭窄，而且十分特殊，只是在博学多识的商人中间展开。但是很快，它的范围开始扩展，并将以前从未涉足股市的买卖双方都卷了进去。

人们勉强建立了一个期货市场。于是，这种商品本身被分成两类：价格高昂且非常独特的郁金香股票和价格低廉的普通球茎股票——17世纪早期的便士股票。并且，这个郁金香市场同样是在众人的怒吼声里消亡的。普维敦斯大学的经济学家彼得·嘉伯（Peter Garber）估计：“怀特·克鲁嫩”郁金香球茎在1637年1月间飙升了26倍，但却在2月的第一周下跌了95%。

在下面这篇文章里，摩根斯坦利添惠的首席全球战略师巴顿·比格斯（Barton Biggs）生动地描述了狂热既充满神秘又非常时髦的特质。



17 世纪 30 年代中期,郁金香球茎的价格在荷兰一路狂飙。然而,价格起伏最大的却是珍贵而美丽的“永远的奥古斯都”。在 1637 年初,就在郁金香球茎市场崩溃以前,3 个“永远的奥古斯都”球茎的报价就高达 30 000 弗罗林,其价值大约是一座雄伟的阿姆斯特丹运河屋的 3 倍。

“郁金香”得名于土耳其语,代表穆斯林男子用的头巾;1550 年左右,该词从土耳其传入西欧。郁金香通过精心的培育,美艳绝伦。然而,郁金香越是美艳,也就越是娇弱;因此,它的培育需要高超的技能和悉心的呵护。到了 17 世纪,郁金香已经成为贵族阶层(特别是在德国与荷兰)的时尚花卉。竞选最美丽球茎的奖金总额越升越高。竞选获胜的球茎会被出售,进行杂交繁育。

到了 1630 年,荷兰人开始对郁金香的培育和贸易产生浓厚的兴趣。业余种植者开始哄抬某些品种的价格;它们或是特别走俏,或是有夺奖的潜质。到了 1634 年,阿姆斯特丹证交所设立了一家分支机构,开展郁金香贸易。于是,郁金香的抢购狂潮,演变为“人人都花 100 000 弗罗林的巨资,



购买40个球茎”。不久，每个在后院拥有一亩三分地的人，都在种植球茎；并且在最初，由于球茎价格持续上扬，因此所有人都是赢家。“平头百姓通过培育珍稀球茎，一夜暴富”的故事比比皆是；人们辞掉了自己的工作，花更多的时间进行郁金香的培育和贸易。

由于新贵们扩大了货币供给，其余所有物品的价格也开始上扬。此外，随着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资金流入荷兰，荷兰人便天真地以为：郁金香狂潮将永无休止地持续下去；世界各地的富豪都会购买美艳绝伦的荷兰郁金香。在郁金香狂潮的初期，销售从6月底开始（此时的球茎被移出土壤），到9月份结束（此时的球茎接受移栽）。但是随着狂潮的升级，贸易全年无休，同时商贩保证在夏季交货。正如植物插图画家威尔里德·布朗恩特（Wilfrid Blunt）的这段描述：

于是，一位投机商往往为了自己从未得到也不想得到的球茎，支付巨额资金；而另一位投机商则销售自己从未拥有，或从未发送的球茎。贵族时常花费2 000弗罗林，从烟囱清扫工的手里买下郁金香，并在同时，转卖给农户；贵族、烟囱清扫工、农户都没有球茎，他们也不想拥有球茎。人们乘着郁金香的档期尚未结束，买卖更多的球茎；他们预定并承诺发送更多的球茎，这肯定超过了荷兰花园里郁金香的实际数量。

“郁金香狂潮”的高潮出现在1634~1637年。一等球茎的价格曾飙升到相当于现在110 000美元的价格。随着狂潮的蔓延，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农户为了筹集郁金香的投机资金，变卖了家畜牲口，抵押了房屋和地产。小偷不断光顾人们的花园；在《黑郁金香》的故事里，当人群变得狂躁时，就显露出贪婪与邪恶。某些种植者只在晚上共商大计，为的是不让竞争对手了解其股票。造访荷兰的游客都备感震惊。查尔斯·麦凯（Charles Mackay）——经典著作《异常大众错觉与群体狂热》的作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无辜的英国水手在游船抵临鹿特丹时，下船观光，误食了花园里的一颗郁金香球茎，他以为那是洋葱。而球茎主人却是一个动用私刑的暴民，于是水手被对方私自监禁了10年。到了1635年，狂潮已蔓延至法国与英国，但许多的贸易活动和疯狂的投机行为仍然集中在荷兰。

1636年，各界头脑冷静的人士发出了灾前预警信号，并努力恢复国家

的平衡。埃瓦尔·弗斯提尔斯(Evard Forstius)是莱顿的一位植物学教授,他每次都用手杖攻击看到的郁金香。最后,教授被判有罪并投入了地牢,罪名是他发表了反对郁金香的激进演说,并且对郁金香实施了攻击。其他一些知名人士也发出了警告,但却遭到人们的讽刺和挖苦。

由于郁金香的贸易操作变得过于集中和复杂,人们认为:必须创建一套由公证人、员工和经销商组成的完整体系。荷兰的许多城镇都出现了郁金香贸易。除郁金香之外,正常贸易和制造业均受到忽视。荷兰的出口额下滑。但只要价格保持坚挺,就没有任何影响;事实上,当时的荷兰人,空前富有。

然而,尽管 1635~1636 年的价格继续抬升,虚假的繁荣却不会一直延续。突然,在 1637 年初,破产来临……开始,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想要通过抛售将郁金香股票兑换为其他形式的财富。但却没有人想要购买。于是股价下跌了 25%,而更多的卖家进入市场。经销商和交易所借助虚假拍卖一类的手法,试图树立民众的信心,结果却徒劳无功;他们还宣称:会新推出一项更大的奖励,以为这样就能恢复股价。但是一切毫无起色;突然间,股价真的崩溃了,卖家都大惊失色。几周内,盛极一时的球茎(如“永远的奥古斯都”、“波尔将军”、“范·霍伦舰队司令”)的价值从 6 000 弗罗林,下跌至 400 或 500 弗罗林。人们意识到:自己拥有的是球茎,而不是真正的财产。正如麦凯的这段描述:

几个月前,数百个人就已经开始担心贫困会在荷兰出现;现在他们突然发现:即使售价降至进货价格的四分之一,还是没有人从他们手中购买球茎。大家怨声载道;每个人都责备自己的邻居。少数人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于是他们避开众人的耳目,将家财掩藏起来,并以英国资金或其他资金的形式,开展投资。许多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而摆脱贫贱身世的人,重又变得默默无闻。许多商人几乎沦为乞丐;许多贵族阶层的代表眼看着自己的家产毁于一旦。

最终,由于提请的诉讼过多,法院无法受理;于是,在 1637 年 4 月,荷兰法院竭力干预,以稳定荷兰的社会局势。然而,法院的繁文缛节却无济于事;财富和货币供应之间的剧烈矛盾,引发了一场长达数年的经济萧条。



群众的判断也不总是可靠的:

多数人犯错的几率与少数人相差无几。

——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



“市场崩溃之后,我离开了郁金香市场;可是现在,我又慢慢回来了,并对粉红色郁金香尤为痴迷。”

繁荣和泡沫

要成为泡沫股市中的一名玩家,你离不开钱,还要愿意购买标价过高的股票。要加入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人们在今天的萨

克拉曼,沿美洲河的“撒特的磨房”,发现了一些小金块),你就必须前往那里,而人们也确实曾经去过。

想要大发横财的人们蜂拥穿过了美洲大沙漠、洛基山脉和东部内华达山脉;他们经受了险要地势和恶劣天气的考验,更不要说满怀敌意的美洲土著居民了。他们也走水路。到1850年7月,圣弗朗西斯科海港挤满了幽灵船;之前,听说这块仍旧蛮荒遍野的土地上金河密布,船员便纷纷赶来,但现在他们都放弃了。

185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发现:加利福尼亚的居住人口不足100 000人。而到了1860年,其人口却增长了4倍。

淘金热兴起的一个半世纪以后,大多数的美国民众和当年的采矿供应商,都无法说出任何一位淘金者的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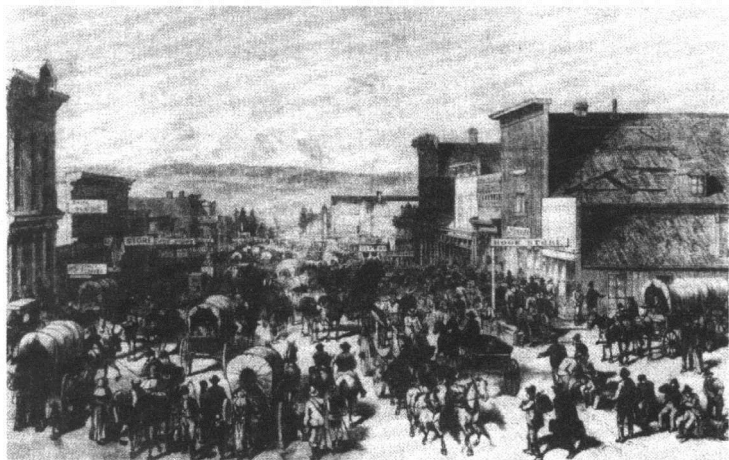
由于结实的服饰不会在粗糙的山地中开裂,忙碌的淘金者选择了莱维斯·斯特劳斯(Levis Strauss)。尽管莱维斯·斯特劳斯现在面临窘境,但是它却曾借助淘金热,开创了一个由此得名并延续至今的服饰王国。

当时,科利斯·亨廷顿(Collis Huntington)正准备给每位淘金者提供铲子、锄头和其他必备工具。亨廷顿曾是一名手推车销售商,他通过向1849年涌向加利福尼亚的淘金者提供装备而发家致富。但他并未裹足不前。同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马克·霍普金斯(Mark Hopkins)、查尔斯·克罗格(Charles Crocker)一样,他后来也成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重要投资人;“中央太平洋铁路”横贯半个北美大陆,最终将国家的各个地区永久地维系在一起。

之后,亨廷顿逐渐将触手伸进房地产、木材和煤矿。据说,他临死前的资产达7 000万美元;而这一切,都源于亨廷顿向淘金者出售的五金商品。故事饱含教益。

在繁荣时期,更可能的生财之道是提供支持性服务,而不是盲目追逐最初令人们兴奋的事物。当时,坐在交易桌上的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意识到:如果股市可以提供大量的机会,那么,做一名顶尖的市场数据提供商就能够提供更多的回报。于是,当其他人都在争抢“价格在线”、“双击公司”这些过气网络公司的高层头衔时,布隆伯格却在为坐进纽约市长的办公室筹集资金。





许多城镇只经历了一次繁荣期。而坐落于科罗拉多洛基山脉的里德维尔却经历了两次:继 1860 年的淘金热之后,人们在 1877 年发现了大量的白银,小小的里德维尔成为边境上的一片文化绿洲;哈里·胡迪尼(Harry Houdini)、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和其他一些人,曾在这里的一家歌剧院献演。这幅木版画源自 1879 年 4 月 12 日,弗兰克·莱斯利(Frank Leslie)在《插图画报》上的作品。

新土地、新方案:南海公司和密西西比公司

贪婪本身就足以促成股票购买的盛况;但当你将这股力量同厚颜无耻的社会名流、貌似国家政府的官方许可相互结合时,就能构建起大型的泡沫市场。18 世纪初,英吉利海峡两岸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伟大的“马尔伯勒公爵”领导了一系列的欧洲军事战斗,并最终于 1713 年成功签署了《乌德勒支和约》。战后的经济繁荣将公众的注意力由战争转向自己的账簿;在“南海公司”,人们似乎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既能表现爱国,又肥了个人腰包。今天我们会把这叫做:“堂堂正正做事,就会做得很好。”——这条呼吁人们精忠报国的高尚口号,对骗子也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在法国,巨额国债催生出“密西西比公司”,它就像一口混杂着贪婪与美好愿望的大锅。“南海”和“密西西比”都拥有在远方开展“专项贸易的权

利”；这些权利的实用价值不大，却仍能勾起公众对于无尽财富的遐想。两者似乎都许诺了某种形式的炼金术：它们在消除国债的同时，还能使每位投资者变得富有。（对于炼金术的信任，是这类市场的命脉！）又因为看似不可阻挡的繁荣，在两个实为邻邦、史上却长期为敌的国家中同时进行，于是，个人贪欲在泡沫市场的滋养下不断向临界点逼近，直到财富最后走向惟一的出路：直线下滑。

在此，理查德·E. 班德(Richard E. Band)在《反向投资》一书中旁征博引，通过两篇文章向我们展现了泡沫的形成方式；并且，文章还告诉我们：谁会最终为此付出代价。

“牛津伯爵”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于1711年创建了“南海公司”。新公司邀请所持英国政府公债达900万英镑的个人，将债券兑换成“南海公司”的股票。由于这项爱国服务能够回收部分国债，国王专门授予“南海公司”代表英国同南太平洋诸岛和南美洲开展贸易。

然而，结果表明：这种专营权始终没有达到伯爵当初设想的价值；因为当时统治南美洲大部分地区的西班牙不愿开放殖民地和英国进行任何的贸易往来。但是，与古往今来所有技法娴熟、欺骗企业的高手一样，哈利知道如何向愚蠢而贪婪的公众推销诱人的故事。1720年，“南海公司”向国会抛出一个难以抗拒的诱饵：公司将通过向持股人发行“南海股票”，吸收3100万英镑——这几乎是全部的国债。

以后成为英国第一任首相的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曾在下议院公开斥责该计划，并称：有人通过“激发、维持公众的痴迷情绪，并且承诺永远无法兑现的资金利息，从而人为抬高股价”。然而沃波尔的慷慨陈词在“牛津伯爵”成堆的谣言面前，显得势单力薄。

伯爵阵营的消息称：英国和西班牙正就允许英国在所有西班牙殖民地上开展自由贸易的协定进行磋商。来自新大陆的黄金、白银将汇入英国，使得“南海”商人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如果持股人之前投资了100英镑，那么，他将获得数百英镑的年回报。

议案通过，投机开始了。“南海”股票从1720年1月的每股128.5英镑，飙升至8月令人瞠目的1000英镑。

当时，举国上下似乎都成了股票批发商。每天，证交所被民众堵得水泄不通；由于马车过多，麦山(伦敦金融区的一条街道)无法通行。每个人都前来购股。

18 世纪的伯尼·科恩菲尔德(Bernie Cornfield)察觉到一个机遇。欺诈者们注意到“南海公司”股票正在迅速飙升,于是组建起数百家“泡沫公司”;它们除了兜售自己的股票,再没有其他更多的经营目的。有一家公司的成立是“为了开展头发贸易”;另一家公司在查封时,正在为生产一种永动机筹款 100 万美元;第三家公司的创建是“为了将水银转化为一种延展性良好的金属”。由于水银(或称汞),只要温度高于 -38.9°C 就呈现液态,因此,将它转化为固态金属就成了一项非凡成就。

最值得一提的骗局可能是:一家公司根本没有陈述自己的经营目的。计划书含糊地暗示:该公司的组建是“为了开展一桩大有好处的买卖,只是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创办者宣称:认购者每投入 2 英镑,就会获得 100 英镑的年息——50:1 的回报。尽管这项承诺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但在发行说明书颁布后的次日清晨,就有一大群人出现在该公司的门口。6 小时内,创办者就筹集到 2 000 英镑。

短短一天的功夫,这位创办者就狠狠地捞了一把。按查尔斯·麦凯的说法:“他很懂得见好就收。当晚他便启程前往欧洲大陆,从此便销声匿迹。”

当然,我们知道:今天的证监会会阻止这类不可靠的机构向公众售股。事情果真如此吗? 1983 年 6 月正值新股发售热的高峰阶段,一家 20 世纪的泡沫公司在证监会归档的上市通告头版上宣称:

这支上市股票是由一家没有任何操盘经验和操盘计划
的新设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公司在完成此次股票上市之前,
不参与任何业务。

在第五页,通告进一步透露:“该公司不清楚自身的业务内容,也没有操盘计划……”这种措辞与 1720 年一家泡沫公司的广告惊人地相似:“一桩大有好处的买卖,只是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这家现代泡沫公司居然以每股 5 美元的价格,筹款达 300 万美元。两个半世纪过去了,傻瓜仍旧层出不穷。

随后,包括董事长约翰·布朗恩特爵士(Sir John Blunt)在内的董事抛售了各自的股票,消息传出,“南海公司”泡沫最终在 1720 年 8 月破灭。公司内部人士这一缺乏信心的表决,引发了一场恐慌抛售,最终使“南海公司”的股价由 1 000 英镑的峰值跌至区区 315 英镑——下降了 68%。包括许多国会成员在内的数千户英国家庭面临财政崩溃,同时,一场大规模的

商业萧条也降临到这片土地上。

尽管稍逊一筹,然而当“南海公司”狂潮涌动的同时,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也在经历一场呼啸而至的投机繁荣。

约翰·罗(John Law)是导致法国惨败的始作俑者。这个举止轻浮的苏格兰人,在决斗中杀死了女友的情人后,逃往欧洲大陆。嗜赌成性的罗是制造史上最轰动的骗局之一——“密西西比公司”的理想人选。

1716年,罗说服法国摄政王(对方当时代表6岁的路易十五执政)准许自己开设银行。当时的法国负债累累;政府刚刚降低了铸币的金银含量,使得铸币贬值。罗的初衷很好。他的银行发行的纸币,完全受到贵重金属的支持;并且,与政府不同,罗保证:永远不改变每张纸币背后的金属含量。事实上,他宣称:如果银行家发行纸币时,手头没有足够的金银作为清偿,就应当被处死。

闻风而动的法国民众纷纷登门求见。一年内,罗以高于政府铸币15%的价格开展纸币的溢价交易。与此同时,不再受到支持的政府纸币,这种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发行的国家票据,其名义的金银价值下跌了20%。

不幸的是,罗的赌博本能占了上风。在摄政王的敦促下,他将自己的银行变成一所皇家(政府)机构。有了国家的庇护,罗开始在没有得到任何支持的情况下大量制造纸币。利率降低,行情好转。于是,出现了一场虚假的通货膨胀繁荣。

罗很快想到去利用自身营造的投机环境。1717年,他的密西西比公司取得了国王的独家授权,在当时法属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开展各项商品交易。为了吸引人们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罗承诺了40%的年息——一项根本无法兑现的回报。

不仅如此,为了帮助当时正在努力减少国债的投资者,罗告诉投资者:他们可以用政府几乎一文不值的国家票据进行捐赠。由于股息是通过真实货币支付的(金币或者银币),罗其实是在保证:持股人单单从股息中就能获得120%的投资年收益。

“公众热情,”查尔斯·麦凯写道,“当时一直长期升温,因而无法抵挡如此绚烂的景象。”公爵、侯爵、伯爵,协同自己的妻室,手拿认购申请表,将罗团团围住。即便罗将价格抬高了10倍,每次发行的新股也还是会脱销!当时,这位大人物将办公场所设在了巴黎的孔恩康波伊克斯街,那里挤满了买卖“密西西比公司”股票的投机商。



随着贸易高潮的掀起,股价有时在几小时里就能攀升 10%~20%——这番情景让人联想到:1929 年股市繁荣的后期,女仆和男佣将自己微薄的积蓄连本带利地投入股市,想要迅速致富。麦凯称:“许多出身贫寒的人,早上还一贫如洗,晚上却腰缠万贯。”

虚假繁荣受到法定货币的推动,从孔恩康波伊克斯街传遍了巴黎,又流入穷乡僻壤。通货膨胀疯狂地扩散,价格在数月间就飙升了 300%。由于成功的投机商将利润融入了硬性资产,奢侈品价格的上升尤为明显。

“国家的纺织机飞速运转,提供着花边、绸缎、阔幅布和大鹅绒。尽管其价格增长了 4 倍,人们还是用大量的纸币购买这些衣料……各处都是新修的房屋;虚华的繁荣映照在这片土地上,全民族的双眼都给蒙蔽了,没人注意到地平线上的那片乌云,它预示着暴风雨的不期而至。”

1720 年初,罗的宏伟建筑上开始出现第一道裂痕。当时,身为贵族领袖的狄康德王子,带着三辆满载纸币的马车来到罗的银行,要求偿付硬币或者金属;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摄政王威逼王子向银行归还了 2/3 的提款,但是这套把戏却被揭穿了。人们意识到银行纸币的购买力日渐衰退,于是赶忙将它们兑换成黄金和白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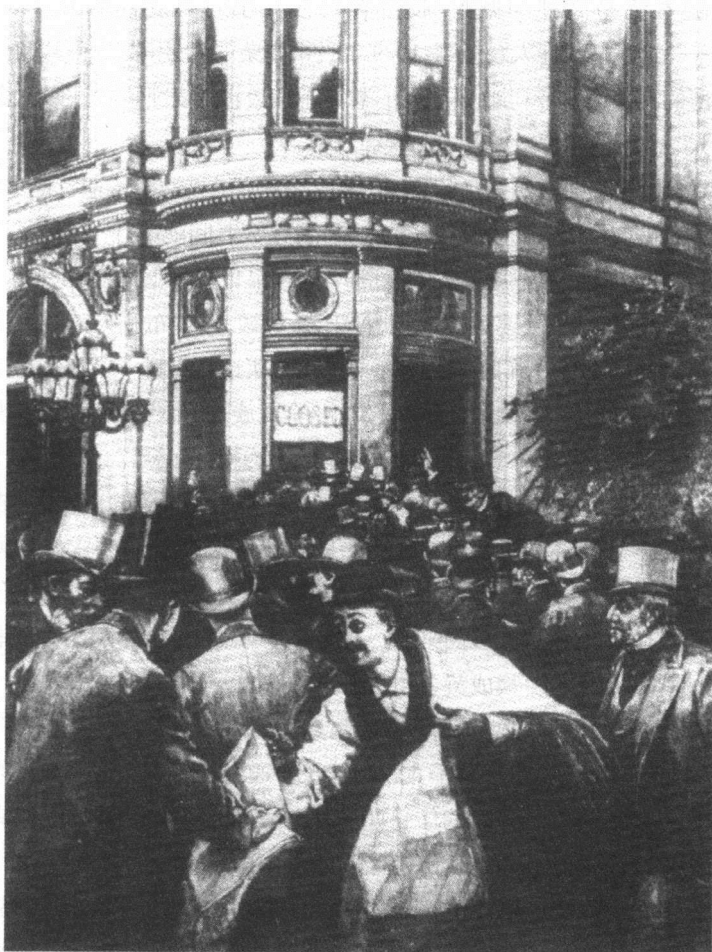
然而,罗的银行的硬币却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接着,银行出现挤兑,“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一落千丈。尽管政府通过贬低金银相对纸币的价值,力图挽回公众对于货币的信心,但却没有人上当。作为最后的权宜之计,暴戾的摄政王禁止百姓私自持有任何的金银。

为了支持“密西西比公司”股票,为了做最后的一搏,罗请求政府从巴黎街头征募 6 000 名顽童,前往可能富含金矿的路易斯安那做工。罗领着这群弃儿,提锄扛铲地穿过巴黎的大街小巷;结果一些天真的投资人开始相信:罗的方案并非一无是处。

股价迅速反弹——真希望反弹能够一直持续下去。然而,在此之后,随着罗公关声势的减弱,行情再度开始下滑。1720 年,曾经从 1716 年的每股 500 里弗赫蹿升至 20 000 里弗赫的“密西西比公司”股票,仅用了几个月,就跌至区区 200 里弗赫,损失率高达 99%! 罗遭遇了灭顶之灾;法国的经济也几乎一蹶不振。

哗众取宠简单而庸俗,惊扰暴民并非难事。

——查尔斯·克拉博·考尔顿(Charles Caleb Colton)



银行挤兑——引自《哈波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 (1890 年 2 月版)。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注意到:19 世纪的美国人大约每 20 年就会经受一次银行恐慌——正好是他们忘却上次恐慌的时长。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恐慌和挤兑

从某种角度看,股市崩溃残酷无情。一支股票仅代表发行机构中零星的所有权。股票价值可以是人们为了获取股票所付出的代价;而当发行机构

不再以上市公司的形式存在时,它又代表了利息的份额。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股票的货币价值都只是第三方而已。银行崩溃与个人的关系更为紧密,因为银行保管着我们的现款。当银行开始关门停业时,真正的恐慌来临,挤兑出现。在一个泡沫不断的市场上,最后购股的傻瓜往往蒙受最大的损失。在银行恐慌中,人群中最后的傻瓜则是最不可能回收资产的个体。

19 世纪的两个著名案例证明:当银行机构起伏不时,歇斯底里就会出现。美国内战结束后,获胜的北方在经济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而 1873 年的恐慌却打断了这一进程。20 年后,仿佛往事重现,1893 年的恐慌使储户纷纷奔向银行大门。

在第一个案例中,随着费城一家优秀银行和“杰·库克公司”的倒闭,人们产生了恐慌;于是,大家开始担心其他公司会像多米诺骨牌那样纷纷落马。1893 年的恐慌更为直观。起初智囊团坚称:为了保证用黄金清偿政府债务,国库储备需要维持在 1 亿美元。但在 1893 年 4 月 21 日,该数字跌破 1 亿美元;智囊团突然宣布:末日临近。在两个案例中,由于缺乏任何真正的中央银行监管,恐慌被夸大;由于当时的存款不像今天这样接受联邦保险,又增添了恐慌的紧迫感。

尽管美国当时缺少一个央行系统,但它却拥有一位中央银行家——J. 皮尔蓬·摩根(J. Pierpont Morgan)。他出生时,正值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被“美国银行”罢黜的 1837 年;辞世时,又恰逢“联邦储备体系”创建的 1913 年。1873 年,摩根是债券发行创举的核心推动者;债券的发行填补了大量亏空的联邦资金,并使民众重拾信心,银行重整旗鼓。20 年后,摩根在查看联邦资产负债表时,发现国库资金竟比 1 亿美元的标准少了 6 200 万美元;于是,他就拨给政府价值 6 200 万美元的黄金——当然,在两个案例中,都没有人对他提出异议。

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在自己的《美国》三部曲中写道:“当证券交易、破产、战时公债引发的战争与恐慌纷至沓来时,‘摩根财团’却茁壮成长。”于是,成功总是属于那些在看似金融风暴的时期里,保持理智、管好钱袋的人。

恐慌并非一无是处。它们的耐性往往不长,然而情绪却能在人们心中迅速滋长,并且难以根除。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1948年,准备由中国大陆逃往中国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所有个人用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一种新币——金圆券。数月后,国民党对该项政策做了180°的调整。这张由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拍摄的照片反映了: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时期,上海居民排队购买黄金的场景。

崩溃:大萧条

如果股市的泡沫破灭,就会造成价值数十亿,乃至数万亿的纸币损失。如果银行倒闭,实际财产就会消失;即使在存款获得保障的今天,实际财产的兑现也起码会遭到拖延。若两者同时出现,加之在全球范围内多次反复,就会引发“大萧条”。

历史课本告诉我们:在1929年10月24日的“黑色星期四”,股市曾经出现崩溃。其实,光是那天就消失了40亿美元的纸币;许多账户和持有账户的投资商被洗劫一空,从此一蹶不振。然而,任何事情的复杂程度都不会像“大萧条”这样,一石激起千层浪。

早在1927年春,英格兰银行就曾为了支持摇摇欲坠的英国产业降低过利率。顺理成章,黄金很快开始从英国流向美国,以期获得更丰厚的回报。为了减缓资金外流的速度,“英格兰银行”行长还说服“联邦储备委员

会”降低了美国的利率；于是，一轮通货膨胀循环就此拉开了序幕，这直接导致了一场疯狂的股票投机。“道一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由 1927 年区区的 153 点飙升至 1929 年 10 月的 381 点——不到两年时间，股指就攀升了将近 250%。

事件中，民众的秉性与大规模的支持态度都没有受到伤害。1929 年，一个经济委员会[其中包括即将接任总统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受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的委派，对外界宣称：“我们似乎还有许多潜能等待开发。”共和党并不孤独；人称“欢乐斗士”、担任纽约市市长的民主党成员——阿尔·史密斯(Al Smith)在 1928 年的竞选中，曾是胡佛的手下败将，但他也总是说：“美国人民从来不带雨伞，他们准备一辈子都在阳光下漫步。”1929 年 8 月，由阿摩司·戴斯(Amos Dice)撰写的《股市新水平》就代表了这种态度：

我们的整部历史将使我们成为乐天派。我们已经见证了：国家人口的飞速增长；国家财富的飞速累积；国民对于实现美好愿望的迫切期待。每一代人都因为在有生之年体验到这种快速的发展而欢欣鼓舞。空气中弥漫着乐观的情绪。

1929 年 10 月 24 日，所有这些力量都和“股价再次与价值完全脱离”的现实遭遇。而这一次，全世界仍未从十年前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安定下来。正是由于投资者的地位尊贵，他们才过度地暴露在危险中。在 20 世纪 20 年代泡沫市场消亡时期出现的这项伟大发明，一直发挥着强大的功效。当投机商用最低利率借款时，保证金账户便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今天，投资者必须追加 50% 的保证金，才能获得保证金贷款；而当时的投资者只需追加 5% 就足够了。事实上，即便是小本商人也有自己的打算。然而随着“黑色星期四”的如期而至，人们最终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代价。

经济崩溃的 5 天后，《纽约时报》发表了以下社论；尽管只是马后炮，却说得没错：

在股市里，不必讲什么大道理。股市述说着自己的故事，传授着自己的经验教训。两年来，高层人士一直操纵着金融、经济和财富领域中浮华幻境的沉浮起落。但他们却碍于地位，很少为自己的态度表示过歉意。现在谈论这些

都已于事无补。这些奇思怪想也随着“华尔街风暴”一同消亡了。

下文中,艾略特·V. 贝尔(Elliot V. Bell)以第一人称介绍了“黑色星期四”;它选自1938年一部题为《亲睹》的文集。经济崩溃时,贝尔是《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之后,他成了《商业周刊》的编辑兼发行商。

1929年10月24日,在股市大崩溃的历史中算不上空前绝后。但这却是我在华尔街所经历的最恐怖且最难以置信的一天;它构筑起一座重要的金融里程碑,因为这一天标志着华尔街国内业务的声誉和权威一落千丈。

那天阴云密布,寒气逼人。一阵西北风轻轻吹入华尔街街头;当时气温不足10℃,走在上班路上的银行家和经纪人裹紧了外套。10点钟,交易开始;在经纪人的行情室里,成群的市场交易商,既紧张又满怀希望。大家都以为最糟的日子过去了。之前,许多投机商鲁莽地在市场滑坡时将股票抛售一空;现在,他们正为自己以极低的价格买回了股票而暗自庆幸。小型交易商很少采纳更为高明或者更为一致的建议。

开市情况稳定;尽管刚开始出现了20 000~25 000股的大宗股票,但与前一日相比,价格仅呈现出小幅波动。然而股价马上在开市后的半小时里迅速下跌;11点左右,股市洪流爆发。

股市洪流的速度和凶猛程度,令人瞠目。市场跌穿谷底。全国各地的卖出委托如潮水般地涌向证交所的席位;然而那里却并没有与之相配的买进委托。在销售往来中,代表活跃股票的报价(如钢铁业的“美国钢铁”,电信业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以及“安那康达公司”)开始下跌2点、3点、5点,乃至10点。不活跃的股票更是不值一提。一会儿功夫,自动收报机的声音就令人绝望地消失了;此后,人们便对事态的发展一无所知。到了13:30,股票行情记录带延误了将近2小时。到了14:30,股票行情记录带延误了147分钟。最后,报价直到下午15:08½(闭市后的4小时8.5分钟)才被打印在股票行情记录带上。此时的华尔街已经经历了一场极为可怕的噩梦。

通过灾难新闻发布的奇特方式,市场崩溃的消息传遍全城。到了中午,大批民众集中在宽街和华尔街的街角;那里,大街一角的证交所与摩根公司隔街相望。摩根公司对面,一群新闻摄影师和新闻影片工作者站在“美国财政分局大厦”的台阶上。由于过度拥挤,金融区街道的交通受阻。

在这种极端混乱的状况下,银行业的领袖冲入摩根公司的会议间,但



一切为时已晚。中午刚过不久,查尔斯·E. 米切尔(Charles E. Mitchell)先生就离开“国家城市银行”,沿华尔街向西,前往摩根公司。他前脚刚刚跨进去,阿尔伯特·H. 维京(Albert H. Wiggin)就从一街之隔的“大通国家银行”,由北向南,奔向摩根公司。紧随其后的是“保证信托银行”的首脑威廉·C. 波特(William C. Potter),他身后跟着“美国信孚银行”的苏厄德·普罗瑟(Seward Prosser)。接着,“第一国家”的乔治·F. 贝克(George F. Baker),也加入了队伍。

银行家集会的消息,迅速传遍大街小巷以及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股票开始集中——但对许多人而言,这已经太迟了。从 11:00~12:00 的短短 1 个钟头里,大大小小数千名交易商纷纷“落水”。对美国金融领袖与政治领袖的信心,对“良好”经济条件的信心,被击得粉碎。于是,恐慌出现。

在摩根公司,6 家银行的领导人组成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也就是人们熟知的:1929 年 10 月设立的银行家共同资金。每位银行家各自抵押 2.4 亿美元或 0.4 亿美元,为下滑的市场提供一个购买力的“缓冲垫”。此外,包括“詹姆士·施佩耶尔公司”和“古根海姆兄弟公司”在内的其他一些金融机构,主动向摩根公司提供共计 1 亿美元的资金。银行家联合资金不仅第一次真正出现在股市中;而且,它还在股市上集结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联合资金购买力——但当面对恐慌时,这却显得微不足道。

银行家会晤之后,摩根公司的合伙人——托马斯·W. 拉蒙脱(Thomas W. Lamont)刚一出来,就径直向银行休息室的一大帮新闻记者走去。他那欲盖弥彰的言辞成为了华尔街日后的一段代表性言论,他说:“市面上的销售似乎受到了一些干扰。”

也是在那场会议上,“拉蒙脱先生”为金融界增添了一个新词——“气囊”,它用来形容:股市中,不按规则投标,完全胡乱出价的情况。[拉蒙脱先生说,他的“气囊”来自合作伙伴乔治·惠特尼(George Whitney);而后者说,是某位经纪人将“气囊”带给了自己。]

会后,拉蒙脱先生穿过宽街,来到证交所与那里的官员们见面。交易期间,他们就被悄悄召集起来;现在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又在“股票结算公司”的房间里召开了会议。拉蒙脱先生坐在桌角,向大家讲解了共同资金。然后,他说:“先生们,仅靠某个个人或是团体购入美国人民抛售的所有股票,是绝不可能的。”

现在,这句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但是对于当时在证交所的官员来说,它却犹如晴天霹雳。这意味着,这位美国最具威信银行里的最精明的成员,正在明确地告诉他们:即便人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动用华尔街汇集到的资源,也无法消除这场恐慌。

事实上,银行家的共同资金终究难逃令人扼腕的惨败。毫无疑问,若非共同资金的出现,证交所早已被迫关闭。当市场出现恐慌与混乱时,人们无法通过其他形式投标,而共同资金的确向所谓的“关键性股票”提供了某种价位的投标。这种手段取得了些许成绩,却根本无法阻止全国各地的抛售风潮。股市已经过于庞大。回首往事,之后几天的情形已不再清晰。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华尔街成为一场梦魇。

交易活跃时期,华尔街外的人们能清楚地听到证交所席位上传来野兽般的吼叫;现在,这种声音越来越大,变得既痛苦又可怕。街头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苦闷的小型投资商们,在门外漫无目的地徘徊,不敢面对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和保证金交易员;将股票抛售一空的交易商,受到病态心理的驱使,前来见证自己的惨况;好奇的个体和旅行家们,注视着证交所和各大银行外部的情况,想要更清楚地了解美国经历的这场大劫难;挤兑者发疯似的拨开无所事事又满怀好奇的人群,试图向交易中的证交所席位,投放数量空前的债券。

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的声音令人绝望地消失了;由于比实际交易滞后了几个小时,一切变得毫无意义。入夜时分,透过窗户望去,高高的办公楼常常整夜灯火通明;那里,保证金交易员和簿记员拼命赶在第二天以前清算出当天的业务。他们晕倒在桌上;挤兑者精疲力竭地倒在银行大理石地板上,沉沉睡去。然而,在短短几个月里,他们就会有大把的时间用做休息。因为那时,他们当中数以千计的人将被解雇。

痛苦充斥着一间间经纪人的客户室。在那里,短短几天前还做着发财梦的交易者发现: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化作泡影;崩溃的惊人程度,远远超过他们内心最深的恐惧,让人难以置信。为了从灾难中挽回一点损失,他们要求“在市场上”抛售股票,然而事与愿违,许多人不仅因此倾家荡产,还欠了经纪人一屁股的债。接着,局势便出现了讽刺性的扭转:随着数小时后市场的疯狂转变,价格上扬;人们原本可以在这时抛售股票,获取丰厚的结余。在那些日子里,你的任何举动都会导致错误。当时的市场就像一只生性残暴的野兽,对那些想要驾驭它的人,发起野蛮而无情的



市场、 群氓和暴乱

第一章 繁荣、泡沫和衰退

报复。



1929年10月24日,20世纪20年代后期不断发展壮大的泡沫市场终于破灭,从而引发了“大萧条”。该图表现的是:当蒙受了数百万纸币的损失时,痛苦的股民涌至纽约证交所的门前。(©贝特曼/考比斯)

在华尔街,民众既激动又害怕,就像坐在沉船上的一群人。一种同志般的友爱,一种绝望的欢乐,迅速滋长。这位华尔街记者发现:所有的门都敞开着;每个人都抓着他,探听最新的消息和各种风言风语。比如:谁有麻烦啦?谁又刚破产了?这种日子何时才能熬到头儿?

记得当时我碰上一位在某家大银行里任职的副总裁。他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好吧,艾略特,”他说,“几天前,我还以为自己是百万富翁——现在却发现自己拿倒了望远镜。”

他笑了笑;然后说:“我们要抓住干这些勾当的狗杂种。”

许多情况下,我们受到他人的欺骗。而1929年秋天,人类则第一次成功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自愚。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

他山之石

在市场狂热期,小型投资商获取可靠信息的难度有多大呢?对于网络哄抬,读者都会有各自的记忆;然而,当投资者看着这些源自《纽约时报》的标题集锦时,他们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1929年的大萧条时期。有几个标题所提到的那位永远乐天的“费希尔”就是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他既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当代杰出的市场评论员,同时也是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

(星期三,1929年7月3日,第31页)

发现表明:股价上升合情合理

穆迪称:利润水平与产业活动一致

(星期五,1929年9月6日,第12页)

巴布森预言股市“崩盘”

巴布森称:明智的投资者应清偿贷款,并且规避保证金交易

(星期日,1929年10月6日,第1页)

迅速反弹的股价阻止了股市的长期下滑;股价飙升

(星期日,1929年10月13日,第2章,第7页)

俄亥俄的经济学家称:未来几年,股价将维持在高水平

(星期三,1929年10月16日,第8页)

费希尔认为股价将永久维持在高水平

这位耶鲁的经济学家告诉采购代理:利润增长证明了股价上扬

(第41页)

米切尔坚称:股市状况良好

这位来自欧洲的银行家称：没有发现华尔街萧条的迹象

(星期日,1929年10月20日,第1页)

售股浪潮淹没股市,股价下挫

(星期二,1929年10月22日,第24页)

费希尔谈及股价偏低

他宣称：报价单尚未达到实际价值

华盛顿认为经济态势良好

官员们坚称：股价下挫不会对商业造成实质影响

(星期三,1929年10月23日,第1页)

股价飙升,于收盘前转跌

股价以上升为主,多宗股票呈现净增长

市场低迷好转

在银行支持、银根放松和米切尔乐观声明的帮助下,股价回升

(星期四,1929年10月24日,第1页)

清偿巨额债款时,股价崩溃;巨额账面损失达40亿美元

260万股股票在股市历史性下挫的最后一刻被抛售

(第2页)

据称：股市萧条只是暂时的

费希尔教授告诉资本银行家：战争得到证实,股市应出现攀升

引用经济原理

“公众投机热,”他宣称,至少是股价膨胀的重要成因

(星期五,1929年10月25日,第1页)

银行阻止股市出现最严重的崩溃；

当日成交量达 12 894 650 股；

领导者一致认为：经济态势良好

经历风雨飘摇，华尔街依旧乐观；

行政单位明日将强行放假

(星期六,1929 年 10 月 26 日,第 1 页)

股价上扬,股市稳固；

银行家宣称：将继续提供支持；

胡佛称：商业基础良好

(星期二,1929 年 10 月 29 日,第 1 页)

全民抛售股票致使市值下跌 140 亿美元；

银行家目前仍将支持市场

(星期三,1929 年 10 月 30 日,第 1 页)

股市崩盘,当日成交量达 16 410 030 股；

股价在收盘前回升,经纪人欢欣鼓舞；

银行家态度乐观,将继续提供支持

收盘时,价格急剧回升

(星期五,1929 年 11 月 1 日,第 3 页)

西森谴责通货膨胀

股市崩盘被归咎于小型投资者缺乏经验

(星期四,1929 年 12 月 19 日,第 36 页)

股市崩盘被归咎于群氓心理

W. W. 普赖斯称：只要投机机制存在,就会出现市场崩溃



伯纳德·巴鲁克的基础数学和永恒真理

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通过投资股票发家;他利用这些家产和丰富的智慧,当上了总统顾问,成为一名公众人物,其职务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时经济委员会”主席以及战后凡尔赛和谈的“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

20世纪30年代刚刚来临,巴鲁克就已对股票投机技巧和大众心理了如指掌。他自己出资,对郁金香市场崩溃后曾在荷兰风靡的一本手册进行重新印刷、发放;他告诫投资者不要盲目跟风,并且建议他们选择更为可靠的公司与商品。(在郁金香狂潮中,曾有一些因收益低下而被忽视的公司花钱购买过这种手册。)伯纳德还将下面这段介绍写入了查尔斯·麦凯的《异常大众错觉与群体狂热》(1934年版);该书于1841年首次出版。

本质上,所有经济活动都受到群众心理^①的推动。我们通过不断摸索,创建出图表和商业比率,试图在当前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找寻出指引自身行动的可靠规则。然而,我从未发现任何出色的经济理论对问题作

^① 群众心理又称为“大众心理”,是指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支配和调节群众行为并被掩藏在这些行为背后的群众所共有的内部心理状态。——译者注

出过阐述;经济理论就像是描述价格运动的几何法则和数学公式,很难在人们心中打下烙印。我脑海中时常浮现的是席勒的格言或是拿破仑的座右铭。前者说:“任何人以个体存在时还算明智和理性——但当他成为群体的一员时,就立刻沦为笨蛋。”后者认为:“战争中,精神对物质之比是3:1。”如果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对群体思维(它往往像是群体狂热)缺乏起码的认识,就不值得褒奖。群体思维完全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可能与分析、指导的关联不大,但是我们必须通过了解它对正在发生的事件作出正确判断。

最近,一位大规模有组织运动的倡导者,试图通过下面这段话合情合理地大众心理作出判断:

风和日丽的时候,你是否在某片树林里看见过一群飞虫?它们盘旋在阳光下,看似静止不动。……没错吧?……好的,你是否发现这整群的飞虫(每只小虫之间都保持着明显的距离)突然转变了方向?比如,它们突然上升了3英尺。没错,那么它们怎么会这样呢?是由于风的关系吗?之前我可说了,现在没有风。可是,再好好地回忆回忆,你是否发现飞虫的位置又原封不动地变了回来?没错,那么它们怎么会这样呢?人类很了不起;伟大的人类的集体运动开始时进程更为缓慢,但却更有效果。

昆虫学家也许能够解答这个飞虫方面的问题,并且告诉我们:是什么力量促使成千上万的个体步调如此一致地行动;然而,我却从未找出答案。某类鸟儿的迁徙、整个海洋鲸群不可思议的集体表演、由中亚迅速扩张的史前部族、十字军东征、对中世纪舞蹈的狂热;不然,就离经济学再近一些:“密西西比泡沫”和“南海泡沫”、“郁金香狂潮”(是不是太近了?)、佛罗里达繁荣、1929年美国的市场疯狂及其在1930~1931年间造成的后果。所有这些都是在冲动和控制的作用下,表现出的群体行为;人们无法找出科学的解释。对于所有的静态条件和所谓的“正常趋势”,它们的作用不可限量。正因为这样,当善于思考的学生考虑全球经济状况时,总会想到它们。

尽管没有任何的科学解释,但是我们也许能够从各种原始且不为人知(因此也很诡异)的符咒中,找到强效的咒语。我一直在想:面对凄风苦雨的“新经济”时代(它于1929年告终),甚至面对疯狂飙升的价格,我们如果不断念动“二加二还是四”的口号,就能够避免许多灾难。同样,当许多人

开始觉得股价会不停下跌时,他们应该念道:“向来如此。”

疯狂的程度越是激烈,屈从于疯狂的智力级别就越高。

——本杰明·安德森(Benjamin Anderson),《经济学和公共福利》

《杜尼斯伯里》(Doonesbury)

加里·特鲁多(Garry Trudeau) 著



Doonesbury © 1998 by G. B. Trudeau.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 All rights reserved.

英语里,最宝贵的四个字是:“时过境迁。”

——约翰·坦伯顿(John Templeton)

做戏：因特网和“新”经济

无论是郁金香狂潮、“独家”经营权，还是激起公众遐想的“非物质化”商业，所有的股市泡沫都有着共同的来源——金钱；它突然从天而降，每个人都能轻易获取财富。发财成为一场游戏！20世纪20年代充满传奇，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在《岁月的童话》中，对1929年经济大崩溃前几个月的场面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位富翁的司机，一路上竖起耳朵听着“伯利恒钢铁”公司下一步的行动；他个人在20点的保证金上持有50股。经纪人办公室的擦窗工人停下手中的活，看着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打算将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兑换成西蒙斯公司的几支股票。[记者]艾德温·勒菲佛(Edwin Lefevre)不断报道着奇迹：一位经纪人的贴身男仆在市场上赚得将近25万美元；一位训练有素、深受爱戴的护士听了顾客提供的消息，足足捞了3万美金；在怀俄明，一位家宅距最近的铁路有30英里的牛场主，每天买进卖出上千股……数千人投机、获利，却又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公司一无所知。

60年后，自诩为“资本家工具”的《福布斯》杂志，讲述着另一个市场大同小异的故事。它也受到人们“花费最少努力，获取最大收益”思想的支配。1999年1月25日版的《福布斯》杂志写道：

一天500万线上投资者的强大阵容证明着：在选股方面，强权即是公理。在投资者的世界里，你所了解的关于理性标价的任何内容——收益、账面价值，甚至收入，都毫无意义。别总想着长期获利。交易是临时性的。应该好好捞上一票。嘿，聊天室里的其他所有人似乎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呢。

一位处理人身伤害案件的律师告诉《福布斯》：“早上，我迫不及待地起床，开展交易。现在，这是世上最令我兴奋的事儿。我的原则是：先以高价买入，再以更高的价格抛出，不怕担风险。我从来不用研究工具或者研究



软件;只是上网瞅瞅留言板,看看成交量。”

我们也都知道这段故事的结局。借助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未来刚刚发生》,我们还知道:那位新泽西少年将留言板和聊天室操纵于股掌,并将数十万美元的资金据为己有。“证交会”最终还是顺藤摸瓜,找到了这个男孩儿,却因此给他带来了荣誉。因为,尽管他还只是一名中学生,却已深谙贪欲和群氓的心理。

以下部分是从美国《首页》杂志(这是一份网络杂志,或称非物质化杂志,它和许多同类刊物的涌现,满足了因特网的繁荣)上,度身剪裁的内容。杂志作者罗伯特·洛克(Robert Locke),在繁荣的鼎盛时期,曾是某家电脑公司的执行官。该作写于高科技股股价跌穿谷底一年后的2001年4月;然而时至今日,洛克对当时的情形和痛楚仍历历在目,也仍会感到愤怒与焦躁。

正是在愚蠢资金的作用下,愚蠢思想相互强化,勾画出新经济的幻景。愚蠢资金是那些没有通过艰苦奋斗而获得的资金。在这样的股市投机中,赤字是惟一的问题。如果人们为了发财,将钱投入“花生奶油三明治网络公司”,而不考虑公司正面临破产的事实时,就会造成不幸的结果,从而证实人们所有愚蠢的投资理念。在繁荣的鼎盛期,如果你怀疑“我们正在亲历名副其实的新的经济的出现”,就会遭到这样的奚落:“你说的没错,可我却能发财。”然而,十分讽刺的是:许多网络公司的主要盈利与投资者的收入毫无关联。当然,渐渐地,这个论调承认:自己背离了基本的经济逻辑。但它却满不在乎,可怕的是,它也无需在乎。可是,基础原理当然从未与之失去关联;也正是它的存在,让股市中的每个人觉得自己像是长期灾难的组上肉。

在英语里,最危险的一句话就是:“时过境迁。”股市的投机繁荣无法像改变公司赚钱方法那样,改变商业的基本原理,但它却能铤而走险,让人们以为自己改变了商业的基本原理。我们经历过投机繁荣,其中许多为人熟知的事件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投机繁荣对“科技如何改变一切”也给予了合理解释。20世纪20年代的热门技术有:无线电、汽车和航空。但这些热门技术仍旧走到了尽头……

近代繁荣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能够贿赂自身。在理想资本主义中,公司就像理性的经济参与者那样,根据价格中蕴含的经济信号作出反应。可问题在于:他们不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参与者;如此强大的社会工具由人类驾驭,难免出错。那么,如果管理层的利益与他们运作的公司利益违背时,会怎样呢?好吧,将股票的观点融入管理中,我们就能找出答案。因

为这就意味着:抬高股价成为管理层的最高目标。同时,与赚取实际利润相比,口头赋予公司“新经济股票”的称谓,能够更轻易地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在广义的股市繁荣中,所有经营公司的傻瓜看上去都像是英雄……

要让所有人明白:作为商业工具的因特网和相关技术本身毫无过失。它们能帮助我们完成许多事情。它们比老办法更好,不难发现,许多人通过它们获得了大笔的财富。可是不知为何,它们的出现却引发出这样的概念:“网络”改变一切。”从根本上看,人们相信这个概念并不是因为他们误解了任何特定的事实;而是因为他们从情感上希望相信这个概念。这有三个原因:

- 如果我们看到其他人都在发财,又听说:如果我们和最初发迹的那些人完全一样,相信同样的事情,就也能发财;想想看,这时我们会怎么做?

- 反文化的浪潮侵袭了“硅谷”。婴儿潮一代不可遏制地希望:自己一成不变的生活能够得到天翻地覆的改变。从那时起,他们还懂得了玩味财富所带来的喜悦。“因特网形成变革”的思潮使他们一石二鸟。反文化还使得科技成为时尚。回顾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上一轮科技繁荣。当时,科技备受推崇,却从未在文化上流行过。但这一次却不同。这一次,那些从未想过赶时髦的人们觉得很开心;但是这也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人们根本无法客观地看待技术。

- 全球主义者曾抡起因特网的文化大棒,试图证明全球主义不可避免。过去(现在也一样),他们的口头禅是:高科技就代表着全球化;所有人都对此无能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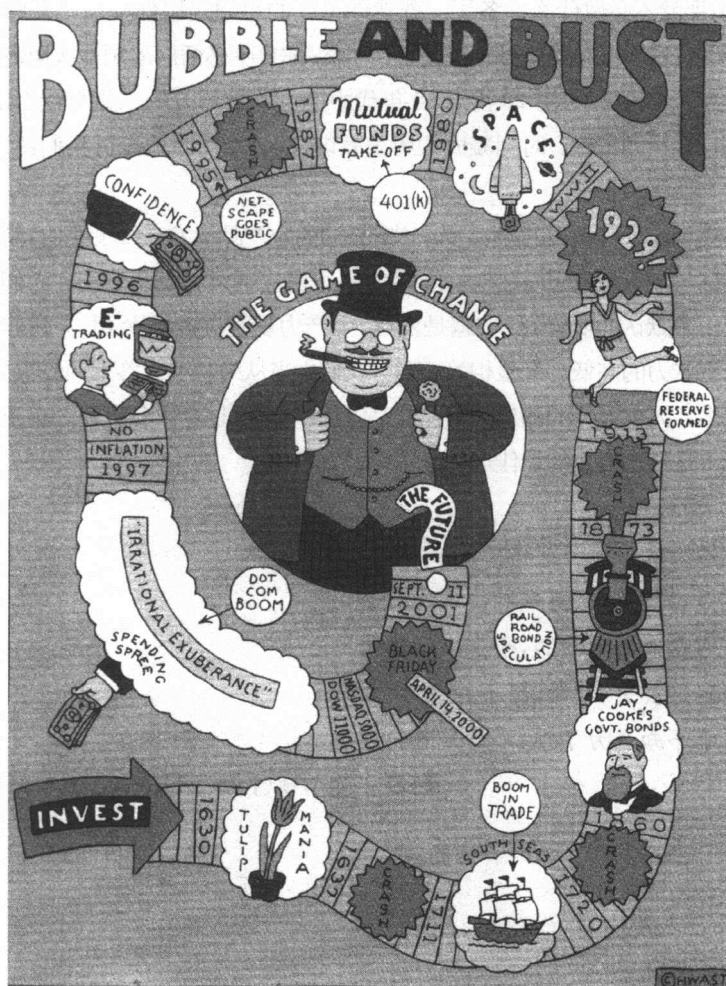
全球主义者首先申明(纯属无稽之谈):“网络”隔绝了有形世界。不言而喻:国家疆界成为历史。尔后,全球主义者又展现出一张未来世界模糊而绚烂的图景;其中的每件事物都与现实迥然不同,所有的传统观念都成为历史。科技人员对政治抱着极为天真的态度,只要工作赋予其神圣的使命感,他们就会沉醉其间,奉献一切。全球主义空想家(其实,许多人对技术都一知半解)全是傻瓜,他们对科技在未来的作用,进行最为荒谬的推测;因此,他们之间相互作用,彻底暴露出各自最丑恶的一面。

文化争论的真正危险之处在于:当争论明朗时,就变成了这样的理念——不相信梦想的人,“就不能理解梦想”;因此,即使他们说得有道理,都不值得采信。这种理念非常怪诞,它就好比某个宗派将批评者的所有意见统统理解为:这些人无药可救。在这种理念的作用下,虚幻的繁荣与批评的声音相抗衡。这群人毕竟与世隔绝地生活了很久;尽管外人无法理解其自诩为明

市场、 群氓和暴乱

日英雄的想法,但他们自己却沉醉其中。对此,他们又怎能抗拒呢?

企业家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式英雄;网络崩溃也暴露出他们的弱点。企业家的根本问题在于:对他们来说,公司不仅是个人产业,还是生活创造力的主要体现,于是他们很难客观地审视问题。盲目相信一个好点子却不为世人所认可,也许不是件坏事;然而企业家还会盲目相信馊主意。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公司的化身。企业家还想利用他人的钱,成为空想家;其动机令人怀疑。许多成功的企业家根本不是空想家,他们只是普普通通、富有竞争力的商人。但在繁荣时期,人们都希望企业家能成为空想家,怀抱激进的商业观点,为了自身的命运,展开一段虚无缥缈的恋情……



第一章 繁荣、泡沫和衰败

可悲的是:许多原来不会倒闭的网络公司,在繁荣环境的推动下,表现出傲慢愚蠢的态度,从而错失良机。例如:某家购买农产品的网络公司曾试图创建一家网上批发式农产品交易所。当初,公司想的只是:网络能够有效地将全球各地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于是觉得这是个只赚不赔的好点子。可是,当他们让批发商签合约时,却遇上了大麻烦。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由于设计的缘故,他们的系统只能消除农产品交易所中被取消的订单,而无法令其实现其他的功能。并且,不同的蔬菜批发商用不同的代码对应各种颜色,而系统对此同样束手无策!现在,如果他们做了必要的准备,掌握这些要求有多难呢?不算太难。但如果你坚持“网络改变一切”的原则,那就不必做什么准备了。既然你英明的思想足以保证自己获得财富,那么,操作细节也就微不足道了。当然,你也不必循规蹈矩地按照老办法做事。相反,你会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价值数百万的产业全盘否定,直到自己重蹈覆辙。时间凝成的历史教训,再一次明白地告诉我们:骄兵必败。

更具有启迪作用的是,最终,这家公司的农产品批发商终于明白:简陋的电话与传真机就可以让他们应有尽有,而且无需支付交易费用。人们心中有一条默认的概念:科技越是发达,生产力就越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生产力的高低与经验相关;因此,我们应当从经验里找答案,而不是凭空想像。人们蠢钝的脑瓜刚刚知道:高科技并不总是意味着更好。直升机可能不是运送食品的最佳选择。

但民众是什么?往往是些乌合之众,
杂沓纷纭,只对鄙野的事物喝彩,
常受高压而附和,很少出于真诚。
他们赞美、欣羡,但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知道为了谁,不过是随和罢了。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复乐园》^①

^① 译文引自朱维之译:《复乐园》,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年版。——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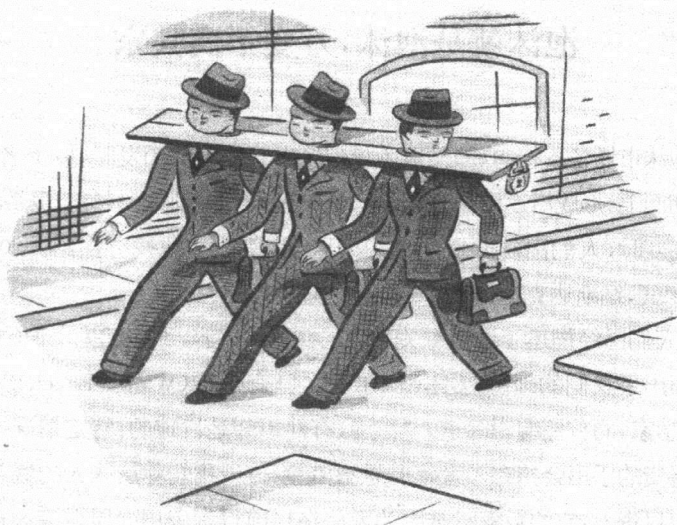
泡沫就是泡沫，万变不离其宗

泡沫市场各不相同，却又极为相似。当一切蓄势而发时，投资者便开始一拥而上，形成沿途横扫一切的群氓心理；当群氓心理最终上升到某个未知高度时，人们出现恐慌，大家又开始急急忙忙地找寻出路。2000～2002年间，纳斯达克指数下降的幅度超过70%。

“人们已经描述了许多有关恐慌与疯狂的内容，许多远见卓识的思想甚至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沃尔特·巴奇霍特(Walter Bagehat)——《经济学家》的首任编辑写道。“然而，有件事却是肯定的：特定情况下，一大帮蠢货的手里会持有一大笔的愚蠢资金……我们称这些人的钱为：国家的盲目资本，它的数额时常因为无法在目前得到应用而显得庞大；盲目资本巴望着某人能将其一口吞下，形成‘资金过剩’；而一旦盲目资本找到目标，‘投机’就会出现；盲目资本遭到吞噬，‘恐慌’便出现了。”

繁荣和衰败

	牛市期上升 率(%)	牛市期的 长度(月)	从波峰至波谷 的下降率(%)	熊市期的 长度(月)
郁金香(1634～1637年) 荷兰	+5 900%	36	-93%	10
密西西比股票 法国(1719～1721年)	+6 200%	13	-99%	13
南海股票 英国(1719～1721年)	+1 000%	18	-84%	6
美国股票 美国(1923～1932年)	+345%	71	-87%	33
墨西哥股票 墨西哥(1978～1981年)	+785%	30	-73%	18
银城股票 美国(1979～1982年)	+710%	12	-88%	24
海湾股票 科威特(1978～1986年)	+7 000%	36	-98%	30
香港股票 中国香港(1970～1974年)	+1 200%	28	-92%	20
台湾股票 中国台湾(1986～1990年)	+1 168%	40	-80%	12



日本经济一路狂飙时,分析家们称赞日本的政府、企业和金融领袖
紧密配合、万众一心。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的“奇迹”不复存在,
评论员却又嘲笑日本人步调一致、行动迟缓、思维教条而僵化。

正如我们在前面改编自《摩根斯坦利研究》的表格中所看到的:盲目资
本说何种语言并不重要。因为无论用哪种语言表达,愚蠢资金就是愚蠢资
金。

当周围的人都丧失理智时,你需保持冷静

当疯狂的牛市或咆哮的熊市出现时,你如何在躁动的人群中保持冷静
呢? 答案并不简单。因为无论人群向何方涌动,都没有人甘愿落后。然
而,通过 40 多年照管自己和他人的经验,我总结出一些原则;无论股
票被带向何方,这些原则都让我受益匪浅。这里是我竭力遵循的 14 条法
则:

- 记住:股市总是在贪婪与恐惧之间交替转换。在极度贪婪时,根本
就没有好买卖,无论我们怎么努力,人们也不相信事实。在极度恐惧时,所
有多余的成分都已被挤出市场,到处都是好买卖。

● 还要记住:无论影响股市的事件有多可怕,股市终将复苏。恐惧平息;内在价值胜出。在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遇刺后的三年间,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上扬了近 21%。在 1993 年“世贸中心”被炸后的三年间,该指数上扬了近 57%。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珍珠港遭袭后的三年间,标准普尔 500 指数的上扬超过了 81%。

● 确定你要玩的沙盒。每次,我总会将排名前 20~25 位的公司列在一张清单上,上面还记录着:公司一贯的销售和收入表现,应用于某项明确战略的管理模式,以及受到高度重视的强大特许经营权。只有当这些升值公司以合理的倍数售股时,我才进行认购;并且,在我出售手头最弱势的股票以前,不会在清单里添加新的公司。

● 确定购买战略;坚持贯彻。我从不对某项单价明确表态,因为我在市场上吃过太多这种苦头。相反,当我对一家公司的价格产生了兴趣,想要持有其股票时,就会开始按部就班地实施购买:今天实现预期持股的 25%;当市场挥发性驱使价格再度下跌时,购入 25%;依此类推……预留订单使你面对市场的风云突变也能处乱不惊。的确,我十有八九会错过绝对谷底;但说到底,那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 坚持自己所知道的。我总是高度关注:优秀的折让和房屋改进零售企业,与日用消费品、制药、包裹投递、软饮料、啤酒制造以及金融服务相关的公司;它们都在各自的领域独占鳌头。我之所以将那些公司纳入投资范畴,是因为我能够通过亲身体验,对它们的产品和服务不断开展实地检验。

● 坚持自我。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无论你是在为自己还是客户购股,都要记住:“太冒险”或是“太谨慎”都是十分主观的评价。当个性和资产组合不一致时,错误的决定随之而来。

● 同时,也要相信那些了解自身的公司。我只向那些集中精力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拥有强大特许经营权的公司投资。我避免技术类公司,因为快速的产业变革,使大多数的公司都变成缺乏持久特许权的商品行业。

● 总是保持应有的勤勉。因为这是你的钱,也关乎你和你家庭未来的安定。明确地投入资金;此前,一定要充分地学习。正是错误影响着你的投资表现。从正负两方面评估风险,没有谁是常胜将军。

● 永远不要在你经纪人的办公室或者交易室作出买卖决定。它们太

接近群体的呼声。我总是等到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是在刮脸或是洗澡的时候)作决定。这样我就避免了卷入狂流;没有像其他投资者选择安然、易安信、环球电讯、艾德尔菲、泰科电子、世通和其他许多同类公司。

● 长线购买。如果你明天即将离世,那么这是一支你想让自己继承人持有的股票吗?这听起来有些变态,但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测试。即使我们活不到它们那么久,股票也应该能维持几代人。

● 接受生活中的一点枯燥。贪婪的管理者总想着:通过高价收购,占据头版头条;而有着骄人管理团队和团队文化的优秀企业,则通过生产品质优良、实用实惠的产品获利。寻找那些预期肯定会有收益的公司;它们以合理的倍数售股,通常比率不超过收益增长率的 50%或 60%。我要的公司,无论它销售哪种产品或服务,都应该最好地满足顾客的需求和欲望。如果一家公司要提升自身收益线上的市场份额,就必须持续而有意义地增加自身收益。那些枯燥的成功手段,会使你远离躁动的人群。

● 还要记住这一点:一支股票价值上扬得越快,它可能也下降得越快。几乎没有几家公司可以在不引起竞争的情况下,使收益安全地以每年超过 15%~20%的速度增长。

● 起决定作用的是小事,而非大事。在全球比赛中,打出本垒打的球手全神贯注。相比之下,投资更简单:中速击球;需绕过寥寥数人就够了。这场比赛的最终胜利属于确定而非敏捷;属于乌龟而非野兔。避免损失。制定一项真正的长期战略,并始终贯彻,这样你就能笑到最后。

● 永远不要忘记组合创造的奇迹。我的目标是:每五年的平均综合年收益率至少为 15%。这样坚持 30 年,你的钱就会增加 66 倍。这够快了!

群体永远达不到自己最优秀成员的水平;相反,它却能将自身降到最蹩脚的程度。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第二章 谣言和暗示



引言

为此书作序的比尔·萨菲尔(Bill Safire)和我自高中时代就成了朋友。比尔从小便在纽约长大,因此不会轻易上当。他的一生都在和政治打交道,后来他开始执笔描写政治事件和政坛人物。这使他更能凭借本能,以审视的眼光洞悉拙劣的主张。但即便是我们中间最睿智的伙伴偶尔也会沦为群体狂热的牺牲品。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几十年前的一个晚上,酒过三巡之后,我和比尔促膝而坐。他告诉我:自己正准备购入一支不容错过的铀股票。

“铀?”我万分惊奇地问道。“这么多好公司,都有着骄人的业界记录和坚挺的收益线。你到底为什么要购入铀股票呢?即便铀公司信誉可靠、为数众多,我们都无法预测出它们的收益——如果它们有收益的话。”

好么,这下比尔搬出了一大筐理由。他说:自己曾在一次宴会上碰到一个人。对方推荐他购买某支铀股票;碰巧,当时的比尔又打探到一条散布于华盛顿政界的传闻:政府正打算以公开支持的形式,增加铀的使用量和产量。在比尔看来,机会就在眼前,而且恰逢其时。

我据理力争,但是比尔仍旧固执己见。当时,他圈子里的所有人都在谈论铀,大家说的都是利好消息:铀的用场越来越大,铀能带来丰厚的收益;但没有人想过:如何从任何一个与铀相关的产业中,赚到实实在在的一个子儿。最后,我作出让步。

“那是你的钱,”我对他说。

果不其然,就在比尔点烟的功夫(当时的社会仍能容许吸烟),整个火柴盒都在他手中烧了起来。

“燃烧的荆棘!”^①当我们望着在烟灰缸里化作灰烬的火柴盒时,比尔满眼迷惑地对我说,“这是上帝的启示。他要对我说什么呢?”

“他说,别去买那该死的铀股票,”我答道。比尔果真没有去买。有时谣言和暗示就是通过神的介入蛊惑民心。

^① 语出《圣经》。上帝从一个燃烧的荆棘中和摩西说话。上帝答应将以色列民族从埃及拯救出来,就像他从前承诺的。此处意指:人们能够通过偶然的体验,意识到上帝的存在。——译者注

防范这类小把戏并不那么困难。谣言只是黑暗中的一阵耳语。暗示的背后也缺乏命令的支持。对于两者,我们常常不屑一顾。然而,谣言就像雪球:起初很小,可是当它一路滚下山时,却越变越大、越滚越快。最后,原本一块静默的石子却以一场声势浩大的雪崩收场。

曾经有人率先宣称,自己在回放甲壳虫乐队的《革命之9》时,发现聚乙烯唱片的纹路中隐伏着这样一条神秘的消息:“让我兴奋,死鬼!”如今,他的名字已经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最先从《永远的草莓地》结尾的拍子里,卜测出“我埋葬了保罗”这句话。然而,这些凌乱的奇思怪想却使年轻人极为困惑,以至于当头号“甲壳虫”真的在1980年离世时[约翰·列农(John Lennon)被一名曼哈顿的疯狂歌迷谋杀],预言似乎大都应验了。

人们甚至可以采用追溯的方法,利用事实和一点点的可信度,为谣言增光添彩。谣言就像野草一样,只有在最适合生长的条件下才会生根发芽。另一位流行歌手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一身怪癖、光怪陆离。他接受了皮肤漂白、脸部整形,还罹患幼稚症;他彻头彻尾就是一间滋养谣言的温室。

如果流言蜚语来势凶猛,那么即使它同事实存在明显出入,谣言的内核还是难以动摇。“第二名持枪者”的理论在约翰·F. 肯尼迪(John F. Kennedy)谋杀案发生后,一直流传于世,动摇着“华伦委员会”和其他一流探员本已出具的结论。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愿相信:单单一个枪手就能造成众多希望与梦想的破灭。许多美国黑人仍然认为:美国白人通过一项秘密“计划”使他们居于从属地位。因为在这项被断言的计划中,至少有某个成分(通过嗑服海洛因,散播毒瘾)确实在黑人社区引发了巨大灾难。

自1974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一直在努力破除这样一条谣言:现代无神论者马德琳·默里·奥黑尔(Madalyn Murray O' Hair)曾经联名上书,要求电台与电视台停止播放一切涉及宗教方面的内容。1995年,奥黑尔辞世;然而谣言仍在继续。6年后,委员会每月仍能收到约100封由民众发出的书信和电子邮件。惊恐的人们借此发表着各种意见并进行着询问。

网络同样是流言蜚语的完美载体:人们在网络的世界里销声匿迹,信息在网络的世界里成倍增长;网络还模糊了新闻、诽谤与凭空臆测之

间的界限。当我们发现一则动听的谣言时,总会出于本能地添油加醋一番,并且听信那些极端事例。小小的误会或诽谤几乎在电光火石之间就成了重大的恶性事件。通过因特网,忠实的信徒们还能建立网上社区。在那里,他们就像隐没在硫磺岛山区中的日本士兵一样,能够坚持几个月甚至几年,即使战争早已结束,其他人早已回家,他们还是坚持着。

谣言有着一条故事脉络,暗示却不同,无论其结构多么松散,都离不开听众的感受。当有人提出“牛奶有没有变酸”的问题时,我们所有人都已来到厨房。当怀疑的小种子被洒下后——无论牛奶究竟有多新鲜,我们的眼睛都几乎肯定地告诉我们:牛奶正在凝固;而我们的舌头也几乎肯定地告诉我们:牛奶正在变酸。

打哈欠也是一种暗示;即便我们异常清醒,也仍旧很难抵御它。与最具威力的暗示一样,打哈欠是会传染的。哈欠始于熙熙攘攘的地铁,然后你会发现:它穿过车辆,甚至是窗户,从一辆车来到另一辆车,从车厢里的乘客来到在月台上等候另一班列车的人群。

一位朋友讲述了自己 在 1954 年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的经历。在一天午休时,铺位间突然传出消息:某种导致瘫痪的可怕疾病可能是由于人们吃了太靠近瓜皮处的瓜瓤引起的。于是,那年夏天爆发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小儿麻痹恐惧症。其实,即便是大孩子们,也不懂什么是流行病学;但那天的午饭却上了西瓜。和往常一样,许多男孩儿觉得口干舌燥,他们几乎把头埋到瓜皮里,去舔最后一滴汁液。不用说,晚餐以前,营员几乎全都感觉四肢僵直,大伙儿脑子想的都是:后半生和人工呼吸器相伴的惨状。

这就是暗示呼风唤雨的惯用伎俩:暗示成倍增长、扩散;最后,数十,有时数百,甚至成千上万的人同时认为某件事举足轻重、正确无比。而那些“举足轻重”的事情其实一文不值,那些“正确无比”的事情也缺乏事实依据。狂热不过是大规模传染的迅速滋长,而热衷的对象既可以是非要不可的最新款礼物(呼拉圈、甘蓝菜小子、豆豆娃、折叠式踏板车),也可以是非见不可的最新娱乐人物[从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到布兰妮·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

不是所有的疯狂都能在“玩具反斗城”或“撞坑”游戏里善始善终。疯狂强大的推动力开始模糊幻想和真实的边界,并且将虚幻世界的可能与现

实世界的事实、规范混为一谈。不只一名 6 岁的儿童因为看过《超人》的连环画和 20 世纪 50 年代由乔治·李维斯(George Reeves)主演的电视剧,将毛巾系在脖子上,试图从车库顶棚飞身而起,有时还造成了严重后果。令人如醉如痴(且往往极端暴力)的“哥特帝国”网络游戏,已涉嫌多起谋杀和故意伤害案件,其中的涉案人员无法将网络虚拟的现实和每天纷繁的事物区分开来。

很明显,疯狂使得情绪升温;而情绪升温时,行为往往变得无法预测。两个多世纪前,约翰·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在成名作——《少年维特的烦恼》中,将年轻人带有自杀渴望且不计回报的爱刻画得入木三分,以至于许多为情所困的德国青年在轻生时,手里还攥着这本歌德巨著。(但歌德似乎只想通过编写此书,度过自己最伤感的一段日子。)

所幸,谣言和暗示的力量及其激发出的集体本能也能向积极的方向引导。一项研究发现:大学生之所以酗酒过量,是因为他们时常高估自己同学的酒量。为扭转趋势,北伊利诺伊大学于 1990 年掀起了一场广告宣传,并告诉学生:与谣传相反,许多参加聚会的同学,喝不过 5 杯。10 年后,《纽约时报》杂志宣称:该校酗酒率下降了 40% 以上。

有时,谣言和暗示交汇形成的强大威力也能捏造出事实。下面的这场法庭对话就是一例佐证。1692 年,著名的“赛林”女巫审判的事发地就好比斯大林时期的法庭。清教徒牧师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负责庭审记录。接受审讯的玛丽·莱西(Mary Lacey)被控施用巫术。

地方法官:你现在承认自己是一名女巫吗?

玛丽·莱西:我承认。

地方法官:你做女巫多久了?

莱西:一周不到。

地方法官:魔鬼曾在你面前出现过吗?

莱西:出现过。

地方法官:以何种形式出现?

莱西:一匹马。

地方法官:他对你说了什么?

莱西:他告诉我什么都别怕,他会带我出去;但从一开始,他就没有说实话。

地方法官:他是否让你崇拜他?

莱西:是的;他还让我把痛苦带给别人。

地方法官:魔鬼让你把痛苦带给谁呢?

莱西:蒂莫西·斯万(Timothy Swan)。理查德·开利(Richard Carrier)经常在晚上来,他命令我把痛苦带给大家。

地方法官:过去你总是骑在手杖或棒子上吗?

莱西:是的。

地方法官:飞得多高呢?

莱西:有时在树顶上穿行。

在马萨诸塞殖民官废止此类审判以前,赛林地区处死过 20 名女巫,而玛丽·莱西却幸免于难。由于莱西接受了调查者的暗示,并在他的指引下观察世界,终于捡回一条性命。



1678 年苏格兰对“女巫”的绞刑。在 1450 年后的大约 250 年里,欧洲至少有 10 000 名妇女被控施展巫术;许多人接受酷刑折磨以求“忏悔”,被绞死倒成了一件幸事。(格兰杰集团,纽约)



小鸡里肯对于今天的启示

与其他领域相比,商界在推进自身的同时似乎更易走向极端:股市不是飙升,就是暴跌;不是牛市上扬,就是熊市出现。人们一面梦想着发财,一面又担心蒙受巨额损失,于是,暗示在电光火石间化为谣言;而谣言又在复杂曲线图及分析的支持下,迅速成为“事实”。

有时,一则优秀的儿童故事就能告诉我们:大众轻易就会随波逐流;而主题既能是下跌的股价,也能是坍塌的天空。事实上,在《小鸡里肯》这则传统寓言中——选自《沃兰编选献给乖宝宝们经典故事》(哈佛大学出版社),我们几乎能够发现群众心理的全部构成元素。对于后者,爱德华·奥渥斯·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曾在1919年的传世之作——《社会心理学》中进行了描述。

“情绪升温时,”罗斯写道,“人们就会丧失理智。通常,强烈的情感会阻碍思考的进行。情况突变时,一个‘尚未丧失理智’的‘理性’人,照常理能够作出明智之举。而此时却受到群体的影响。之后,随着情绪的逐步升温并达到高潮,人们无法思考,一时晕头转向。毫无疑问,与单独状态相比,由于群体思维的影响,人们总显得缺乏理智与判断。”

“满足了这些条件(即暗示增强、情绪产生、思维遭受禁锢),群体一旦冲动(无论冲动源自场景、事件,还是领导),就会产生三种现象。”

- 蔓延。它单凭情绪的安装,就能影响冷漠的人……
- 强化。当个体发现有这么多人和自己感觉相同时,会产生更为强烈的感受。因此,当群体产生自我认知时,就会被重复和加强。
- 癖性。人们从相同的感受中找到了共通点,这样下次更加容易产生同样的反应。

小鸡里肯(Chicken Licken)、母鸡佩妮(Henny Penny)、露西鹅(Goosey Loosey)和其他角色还通过可笑的集体行为告诉我们:当天塌下来时,你可以跑但不要躲,至少不能和狐狸沃克西(Foxy Woxy)在一起。

一天,小鸡里肯在树叶里找吃的。一颗橡子从树上落下,砸在她的尾巴上。“哎呀,”小鸡里肯叫道,“天塌了!我要告诉国王去。”

于是她走呀走呀,遇见了母鸡佩妮。

“早上好,小鸡里肯,你这是上哪儿去呀?”母鸡佩妮问。

“哎呀,母鸡佩妮,天塌了,我要告诉国王去!”

“你咋知道天塌了?”母鸡佩妮问。

“是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有一片天还砸了我的尾巴呢!”小鸡里肯说。“那我也跟你去,”母鸡佩妮说。

于是她们走呀走呀,遇见了公鸡洛奇(Cocky Locky)。

“早上好,小鸡里肯、母鸡佩妮,”公鸡洛奇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

“哎呀,公鸡洛奇,天塌了,我们告诉国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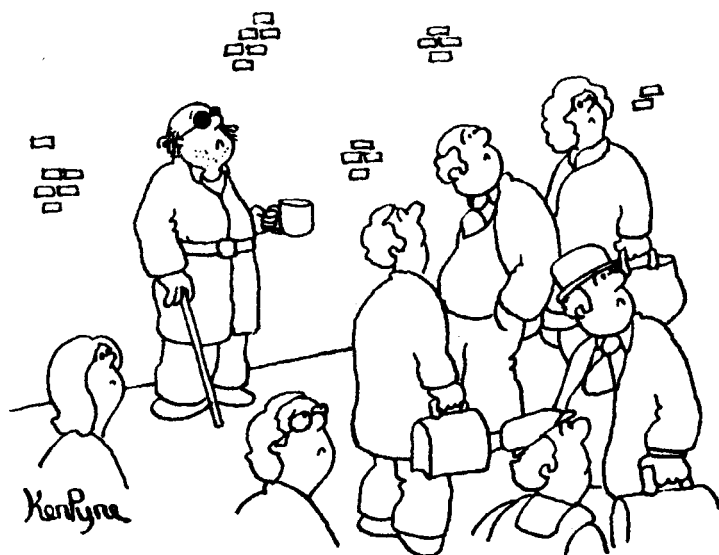
“你们咋知道天塌了?”公鸡洛奇问。

“是小鸡里肯告诉我的,”母鸡佩妮说。

“是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有一片天还砸了我的尾巴呢!”小鸡里肯说。

“那我也跟你们去,”公鸡洛奇说,“我们告诉国王去。”

于是他们走呀走呀,遇见了鸭子达多斯(Ducky Daddles)。



“早上好,小鸡里肯、母鸡佩妮、公鸡洛奇,”鸭子达多斯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

“哎呀,鸭子达多斯,天塌了,我们告诉国王去!”

“你们咋知道天塌了?”鸭子达多斯问。

“是母鸡佩妮告诉我的,”公鸡洛奇说。

“是小鸡里肯告诉我的，”母鸡佩妮说。

“是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有一片天还砸了我的尾巴呢！”小鸡里肯说。

“那我也跟你们去，”鸭子达多斯说，“我们告诉国王去。”

于是他们走呀走呀，遇见了露西鹅。

“早上好，小鸡里肯、母鸡佩妮、公鸡洛奇、鸭子达多斯，”露西鹅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

“哎呀，露西鹅，天塌了，我们告诉国王去！”

“你们咋知道天塌了？”露西鹅问。

“是公鸡洛奇告诉我的，”鸭子达多斯说。

“是母鸡佩妮告诉我的，”公鸡洛奇说。

“是小鸡里肯告诉我的，”母鸡佩妮说。

“是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有一片天还砸了我的尾巴呢！”小鸡里肯说。

“那我也跟你们去，”露西鹅说，“我们告诉国王去。”

于是他们走呀走呀，遇见了火鸡陆奇(Turkey Lurkey)。

“早上好，小鸡里肯、母鸡佩妮、公鸡洛奇、鸭子达多斯、露西鹅，”火鸡陆奇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

“哎呀，火鸡陆奇，天塌了，我们告诉国王去！”

“你们咋知道天塌了？”火鸡陆奇问。

“是鸭子达多斯告诉我的，”露西鹅说。

“是公鸡洛奇告诉我的，”鸭子达多斯说。

“是母鸡佩妮告诉我的，”公鸡洛奇说。

“是小鸡里肯告诉我的，”母鸡佩妮说。

“是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有一片天还砸了我的尾巴呢！”小鸡里肯说。

“那我也跟你们去，”火鸡陆奇说，“我们告诉国王去。”

于是他们走呀走呀，遇见了狐狸沃克西。

“早上好，小鸡里肯、母鸡佩妮、公鸡洛奇、鸭子达多斯、露西鹅、火鸡陆奇，”狐狸洛克西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

“哎呀，狐狸沃克西，天塌了，我们告诉国王去！”

“你们咋知道天塌了？”狐狸沃克西问。

“是露西鹅告诉我的，”火鸡陆奇说。

“是鸭子达多斯告诉我的，”露西鹅说。

“是公鸡洛奇告诉我的，”鸭子达多斯说。

“是母鸡佩妮告诉我的，”公鸡洛奇说。

“是小鸡里肯告诉我的，”母鸡佩妮说。

“是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有一片天还砸了我的尾巴呢！”小鸡里肯说。

“那么就跑吧，大家先到我的洞里去，”狐狸沃克西说，“我来告诉国王。”

于是大家都跑进狐狸沃克西的洞里，而国王从未听说天塌了的消息。

谣言是一支凭着推测、猜疑和臆度吹响的笛子……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亨利四世》



乔治·贝鲁兹(George Bellows),《人群》(1923)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无中生有:暗示的炼金术

在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隐晦言论的作用下,市场往往东摇西摆。置身其间的所有人都深知:谣言与暗示威力强大,它们不仅出现在童话王国里,而且还对现实世界产生着影响。政府代理机构会利用诉讼暗中威胁实力强大的跨国企业,并且还会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对企业开展调查。其真正的目的则是为了榨取对方的短期收益。如果你的财政决定建立在这些“天塌了”的构想上,你就会像“小鸡里肯”一样因精疲力竭而落入圈套,而你也不会变得更为富有。

记录表明:暗示在 1212 年首次飞升成为恐怖事件。当时,法国凡登镇附近的农家男孩史蒂芬(Stephen)和来自科隆的德国男孩尼古拉斯(Nicholas)领导了这场“童工圣战运动”。那时的一位编年史家对场景作了如下描述:

这一年出了一件大事儿。由于事件史无前例,因而人们觉得异常惊奇。临近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时,没有一个人宣传教义或是提出要求,然而在某种我所不知道的精神的驱使下,数千名年龄在六岁到完全成年之间的男孩扔下了正在拉的犁具或是正在赶的马车,丢下了正在放的牲畜,放下了手中的其他活计。尽管父母亲友使出浑身解数,想让他们回心转意,突然间,孩子们一个个都跑去加入了十字军。于是,大家组成了 20、50 或是 100 人的队伍,举起旗帜,开始向耶路撒冷进发。

尽管孩子们的数量最终增加到了 50 000 人,他们的目标却从未实现过。大家本想着从马赛或是其他港口出发,乘船前往圣地;结果却事与愿违,在这些地区,许多女孩被迫沦落风尘,而男孩则被卖给了埃及的奴隶贩子。“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位编年史家写道,“在数千名离家出走者中,回来的人寥寥无几。”

1974 年 5 月,在迈阿密“海滩湾港小学”上课的孩子们对声势浩大的十字军东征毫无概念。然而,正如这段伯顿·卢谢(Berton Roueche)在

1978年8月21日版《纽约人》文摘中描述的那样,那天的事态朝着人们都始料未及的方向发展;而暗示对群体行为的推动力正是事件的症结所在。

“公共卫生部”在佛罗里达的戴得县设立了“消费者保护办公室”,约耳·L. 尼兹金医生(Joel L. Nitzkin)担任办公室主任。在迈阿密市区的“城市中心”大楼里,身高6英尺9英寸的约耳医生蹲坐在自己的桌子旁,手里搅着一杯秘书刚刚拿进来的咖啡。当时的时间是1974年5月13日,星期一10:30左右。那是五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电话铃响了,他放下手中的咖啡,接起电话,听筒里传来了同事玛莎·桑德雷格(Martha Sonderegger)的声音,玛莎是该部门的副护士长。桑德雷格小姐报告说,她的“迈阿密海滩小组”刚接到一个从“湾港小学”打来的求助电话,对方希望得到一支公共卫生医护队的援助。在电话中,桑德雷格小姐得知:由于管道破裂或是某种渗漏问题,学校被一股毒气所笼罩。许多孩子生了病,有些孩子已经被市区消防局的救援小组送到了附近的一家医院。尼兹金医生一边听,一边思考。

他问:“你怎么看,玛莎?”

“这听上去有些蹊跷。”

“我觉得也是。”

“但我还是派了一支医护队。”

“对,”约耳医生说,“这是当然的。而且,我想我最好开车到学校去亲自看看。”

他谢过玛莎,挂断电话,然后又拿起听筒,迅速联系了“环境卫生局”的工业卫生学家卡尔·迪萨尔沃(Carl Disalvo)和“疾病控制室”的内科医生马利亚姆·安立奎(Myriam Enriquez)。他约安立奎医生马上去自己的车里碰头;而迪萨尔沃先生当时已经在赶往学校的路上。尼兹金医生站起身,大步流星地迈出办公室。而桌上的咖啡还没喝就被晾在一边,余温已散尽。

尼兹金医生现已不在“戴得县公共卫生部”任职。随着升迁,他的办公地点也移到了纽约的罗彻斯特。他目前是“门罗县卫生部”的主任。一年冬天,就在那里,我和尼兹金医生谈起了当年大家接到求助,齐集于“湾港小学”的事件。对他而言,往事历历在目。

“我记得那天天气炎热。”和我说话时,他站在办公室的窗边,望着窗外光秃秃的枫树和昨晚的积雪,慢慢开启了记忆的大门。“就是暖和——暖和得让我觉得学校的‘毒气’可能和空调系统有关。现在回想起来,当我第



一次看到学校时,那里乱成了一锅粥,就像经历着一场劫难。由于学校停车场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卡车、货车和轿车——每条路上都停满了车,我们隔着半个街区就得停下车。救护车、消防车、警车开着警示灯全体出动。同时,媒体(报社记者和摄影师、手持麦克风的电台人员、来自四个地方电视台的摄像师)也蜂拥而至。甚至还有——天呀!——地方权贵(戴得县校董事会成员、湾港镇委员会成员)。邻居、路人和家长四处乱闯。以前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但我必须查出原因。然而问题的解答再也简单不过:学校给消防局打过电话,消防局又通知了救援小组——所有媒体都监听消防局的无线电频率。而此时的孩子们却成为一片绿洲,镇定而有序。他们以消防演习的队列快步走出了大楼,并在离校区远一些的树阴下静静地排好队。当时孩子很多,看上去有几百人。之后,这一点被再度证实。当时我的感觉是:无论问题出在哪儿,学校里的许多人都受到了影响。我和安立奎医生在人群中寻找着负责人。结果发现校长到某处开会去了。于是我们便四处询问打探,终于见到了校长秘书。她是学校的名义负责人,但却不能控制住局面。没有谁能控制住局面。”

“我、安立奎和她在大楼的入口处谈了一会儿。大楼采用了当时佛罗里达学校的设计。前厅折回到一条通往教室的十字走廊。学校的其他教学设施均远离前厅。办公室、医务室和图书馆在右手方向。左边是教师休息室、兼作礼堂的自助餐厅、厨房。兼作礼堂的自助餐厅既是礼堂也是自助餐厅,空间扩大了一倍。校长秘书将她所知道的统统告诉了我们。她认为事发原因是某种气体的泄漏。这条原因是她听来的。但她却亲眼见过第一名受害者——一个上五年级的11岁女孩儿。我就叫她桑迪吧。桑迪参加了一支175人左右的合唱队;9:00,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和音乐老师集中在兼作礼堂的自助餐厅里,参加全校音乐节目的彩排。排演进行到一半——这在后来得到了证实——桑迪开始觉得恶心。有些学生看见她拖着步子走出兼作礼堂的自助餐厅,老师却没有发现。她穿过大厅走向医务室,走着走着就倒在了地上。当时没有值班的医务人员,这位校长秘书却刚好瞧见了她,于是便走上前去,结果发现她躺在那里没了知觉。她曾试着让桑迪醒过来——用嗅盐!”

“我母亲过去就随身带着嗅盐,”我说。

“是呀。味道挺甜的。但无论如何,桑迪就是没有反应,校长秘书很自然地警觉起来。于是她很自然地打电话求助。她拨通了消防局。救火小

组赶到时,桑迪仍处于昏迷中;救火小组连忙将桑迪抬上担架,送往医院——北岸医院。接着,孩子们一个个都觉得恶心。我们的医护小组就是在那时接到了电话。在桑迪走后,还有7个孩子也因病情严重被送往医院。其余近25人因病情不重被护送回家。学校打电话给家长,接走了孩子。另外近40人在校内就地接受治疗。”尼兹金医生扬了扬眉毛。“校长秘书是这么说的——在兼作礼堂的自助餐厅里!我和马里亚姆·安立奎交换了一个眼神。我问,桑迪生病的地方不就是在兼作礼堂的自助餐厅吗?毒气到底最先出现在哪里呢?校长秘书看上去一头雾水。她说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她第一次见到桑迪是在医务室门口。她只知道:生病且仍旧在校的孩子们正在兼作礼堂的自助餐厅里接受治疗。”

“我们离开校长秘书,来到了学校。我想当时两个人的心里都不痛快。”

“和玛莎·桑德雷格预料的一样,事情确实蹊跷。现场还有一股怪味。我们刚走进大厅就闻到了;那是一种并不难闻但却浓烈的味道,我们无法用语言去描述。没错,卡尔·迪萨尔沃就是冲着这个来的。他肯定能够找出答案。尽管我还没有见到他,却肯定他就在这幢大楼里的某个地方。我们径直来到兼作礼堂的自助餐厅,那里人声嘈杂,听起来就像在举行一个盛大的鸡尾酒会。走进一个大房间,里面全是穿制服的人——护士、警察、穿着白色工装裤的救火队员。还有许多其他人——病怏怏的孩子们横七竖八地躺着。这里,我仍能闻到那股怪味儿,但味道却淡了——淡了许多。我和安立奎分头行事。她要开展临床试验。而我是流行病学家。我绕着房间巡视了一番,和某些孩子进行了交流。医务室里,场面极为怪异。孩子们表现出各种奇特的症状:头痛、头晕、战栗、腹痛、气短、乏力。我发现有两个孩子明显属于换气过度,他们的呼吸急促而深沉。这是个有趣的现象。”

“我站着想了一会儿,渐渐发现了端倪。我穿过大厅来到一间办公室,找了一部电话,打给北岸医院急诊室,向那里的当班护士询问情况。他对湾港学校孩子们的情况非常了解,还说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令人满意,大家现在似乎都感觉好些了。尽管他尚未得到所有的化验结果,但就目前的结果看来都很正常。事情的端倪依旧在闪现,我开始折回兼作礼堂的自助餐厅,正巧遇上一直在找我的迪萨尔沃。他对大楼的物理环境做过一次快速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实际致病因素——毒气、烟或是过敏原。当我提到那股可笑的味道时,他笑了起来。他已经查出:学校为了加固图书馆里的一块新地毯,使用了某种黏合剂,味道就来自那里。而黏合剂根本没有毒。

总之，地毯两周前就放在那里了。迪萨尔沃对自己的前期发现非常满意，但他还是要平静下来，照例完成全面的综合调查。我也很满意并且非常希望排除有关毒气的设想。此前我从未真正相信过。还有一点也令我满意：我们排除了细菌或病毒致病的可能，因为潜伏期（从感染到发病的时间间隔）太短了，症状也不对。”

“离开了迪萨尔沃，我回到兼作礼堂的自助餐厅。我记得当时表上的时间是 11:30；在学校还不到 20 分钟，我感觉却像呆了一辈子。但之后，事情突然有了新的进展。这回，我从屋内厨房尽头的边门进入兼作礼堂的自助餐厅；一个女人站在那里——她像是一名厨工，但也有可能是一位营养学家。总之是一个爱发号施令的女人。她把我喊了过去。我不知道当时自己眼里是否流露出某种神情。而她却说：‘你不是医生吗？’我承认了。‘好，’她说，‘那你为什么不做些工作，不向大家解释清楚呢？整件事儿真是太可笑了。你我都知道这些孩子根本就没有问题。叫他们自己起来！离开这里！他们都挡在道儿上！我得开始准备午饭了。’”

“当时我一定是愣愣地站在那里，张口结舌地望着她。我觉得一阵好笑——整件事从开始我就怀有一种深深的出自本能的疑惑，觉得有些不对劲。当发现那两个孩子换气过度时，我就瞧出了端倪，因为换气过度是身心焦虑的典型反映。现在真相终于水落石出了。一件往事涌上心头。我明白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就在一年前，在阿拉巴马贝瑞小镇的一所小学校园里也曾发生过极为类似的事件。那位营养学家的话也对也不对。说她对是因为孩子们根本就没有问题；说她不对是因为她觉得所有那些疼痛、难受、恶心都是假象。然而这些反应都是真实的。这确实是一场流行疫情。这是一场集体歇斯底里的流行疫情。”

卢谢写道：在确诊为集体歇斯底里后，尼兹金医生先从当时似乎是最难的工作着手。他利用媒体对其各项言论的关注，告诉焦急的家长、老师：只有学校情况恢复正常，才能控制混乱局面。他提议：清理兼作礼堂的自助餐厅，让厨工准备中饭；让孩子们回到课堂。出乎意料（其实并非真的那么出乎意料），这项举措奏效了。

最后，作为了解这次突发事件的部分工作，尼兹金医生和他的团队从 450 名学生（后者报告自己至少出现过某些症状）中选出 73 人，以学生问卷的方式对其展开了一次临床研究。我们从故事中摘取了以下内容：

“问卷传递出一些十分有趣的信息。而那天早上报告感到恶心的一些

孩子也通过问卷,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些内容大多对应着这样一个问题:‘当你觉得恶心时,是否知道其他孩子也觉得恶心?’我给你念念一些回答。一个女孩回答:‘是的,因为桑迪晕倒了。’另一个孩子写道:‘是的,许多孩子都这样。我是在音乐课和语言艺术课的间隙开始感到恶心的,于是他们把我领到了外面。’另一个女孩回答:‘我只知道一个男孩吐了。’她惟一的症状是反胃。还有一个女孩写道:‘是的——桑迪病了。’一个男孩(为数不多的男孩儿)写道:‘是的,桑迪病倒后,我们组织了一次消防演习。就在大伙儿走出大楼时,我觉得有点头疼。’好啦,你现在大概都明白了。我们还和桑迪谈过话。她和想像中一样可爱。我是说:她是个好女孩,富有魅力、品学兼优、超凡脱俗。并且她十分惹人喜爱、备受尊敬。”

“她是一位领导者喽?”我问,“是她起的头?”

“没错,”他说,“我想你可以这么说。”

“但她怎么样?”我问,“是什么让她觉得恶心?”

尼兹金医生看着我。“噢,”他说,“桑迪真的病了。她感染了某种病毒。平常站唱的姿势在当时却超出了她的负荷。她去世了。”

汤姆·沃尔夫笔下的甲壳虫乐队

集体歇斯底里既容易形成大规模的欲望和需求,也容易引发大规模的苦痛。当个体的意愿交汇时,少数领导者——集体的“桑迪们”——的愿望迅速成为整个集体的愿望。无论政坛还是商界,我们总能见到这种现象。网络市场繁荣时,高科技股迅速升温产生出强烈的歇斯底里情绪,即便是经验丰富的风险资本家也争先恐后地把钱投给毫无经验的企业家,而后者只有一份用于推销的华而不实的商业计划。

正如营销者熟知的那样,集体歇斯底里对年轻人有着极强的推动力。他们急于得到同伴的认可又无法确定自身的定位,于是就像蚂蚁冲向野营午餐一样,冲向新产品。流行音乐便是最明显的例证。歌曲、专辑、单个的艺人、团体,野火般横扫年轻人的文化天地。舞台和运动场上演着最为著名的节目;那些 16 岁的孩子们平日处处与父母针锋相对,这时却突然变得万众一心。

音乐电视这类大众音乐的提供者势必推动了观众集体表决“谁红;谁



市场、 群氓和暴乱

不红”的趋势,然而早在有线电视出现之前,大众对于乐坛艺人的歇斯底里就一直延续着。20 世纪 40 年代,弗兰克·西纳特拉成为时尚少女们的梦中情人。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性解放序幕的拉开,艾尔维斯·普莱斯利在让家长震惊的同时,却令孩子们激动万分。之后的 20 世纪 60 年代,迎来了一场规模最大的演出——当时盛况空前,乐团的一名成员曾半开玩笑地说,这支乐团比耶稣基督还受欢迎。



当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于 1942 年从汤姆·多尔西乐队单飞时,就已是星途坦荡。两年后,当他在纽约的派拉蒙戏院展开一系列的演出时,10 000 名歌迷挤在售票窗前,比挤进时代广场的人还多两倍。如图所示,在电影院里,西纳特拉令所有的女孩倾倒,而家长和社会评论家却再一次对他的强大人气感到费解。(美联社/大千世界相片库)

当甲壳虫乐队首次踏上美国国土时,身为小说家兼社会评论家的汤姆·沃尔夫(Tom Wolfe)还只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现已停刊)的一名记者。他在 1964 年 2 月 7 日的“甲壳虫日”撰写了以下这篇电讯。

早上 6:30,从新泽西州的南橘县到希弗德(长岛),一半的孩子已经起床收听晶体管收音机里的广播了。这就像民防网络一类的东西,几乎在任何地方,打开任何电台(“WMCA 广播电台”、“WCBS 广播电台”、“WINS 广播电台”),你就能听到这样的报道:“今天是甲壳虫日! 早上 6:30! 甲壳虫在 30 分钟前离开了伦敦! 他们已经在大西洋的上空飞行了 30 分钟! 他们正朝着纽约飞来!”



1956年,当弗兰克·西纳特拉在纽约掀起的狂潮过去十几年后,艾尔维斯·普莱斯利(Elvis Presley)借助电视热播节目“苏利文剧场”中的《猎犬》、《别如此无情》,一路巡回,取得了同样的反响。那年夏天,艾尔维斯回到自己的故乡——密西西比的突佩罗,在“密西西比—阿拉巴马州庆典”上,当着图中的数千名观众进行表演。“猫王”的桂冠由此而来。(©贝特曼/考比斯)

下午 13:00,近4 000个孩子逃出校门,他们蹦跳着、叫嚷着进入了“肯尼迪机场”的国际大楼。110名警察疏导着人群。至下午 13:20,甲壳虫乐队乘坐的喷气式飞机抵达纽约。

甲壳虫乐队走出机舱去接受海关检查;所有人都是第一次亲眼见到甲壳虫的发型:蓬乱的头发遮住了前额、耳朵的一部分以及颈后的大部分区域。为了看得更清楚,孩子们跳下监测台;一些人已经拿出梳子,一边跑,一边把头发梳下来遮住前额。当时在可以俯瞰海关部门的厚玻璃窗周围挤满了人,大家步调一致地踩着地板,有些人用手击打着窗户打拍子。

市场、 群氓和暴乱



甲壳虫狂潮曾经席卷大西洋两岸。当甲壳虫在第一次美国之旅中入住纽约城高雅的“广场酒店”时,歌迷闯入了酒店的救生梯。图中,由于著名乐队“披头四”(Fab Four)的突然造访,英国的歌迷试图冲击白金汉宫,他们检验着英国警察堪称传奇的涵养。(赫尔顿—德意志集团/考比斯)

“甲壳虫”——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20岁;约翰·列农(John Lennon),23岁;林格·斯塔(Ringo Starr),23岁;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21岁——是一群来自利物浦、矮小细瘦的小伙子。他们的外套上缝着四颗纽扣,裤子的形状像是烟囱,拖着古巴式后跟的黑色靴子没及脚踝,脸上还带着滑稽的表情。他们乐队的名称跟“beat”这个单词开了个玩笑。^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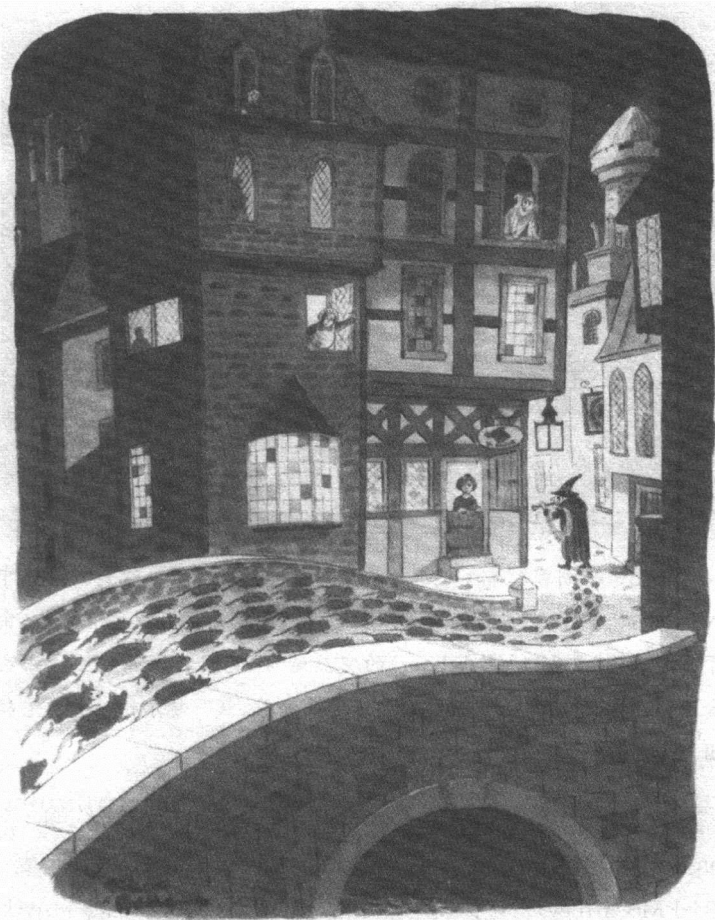
当他们走进一个小房间参加记者招待会时,一些女孩儿试图翻墙而入。

有人提起了外面尖叫的人群,并问:“对所有这些疯狂行为,你们不觉得尴尬吗?”

“是的,”约翰·列农说,“是很疯狂。”

“你们怎么看待贝多芬?”

^① 甲壳虫乐队并不在乎自己是否遵循了“正确”的路线,故意将英文单词“Beetles”拼作“Beatles”,并用它来为乐队命名,取其“beat music”(节拍音乐)的含义。——译者注



“无论此人是谁，他已拥有了号召力。”

“他很疯狂，”列农说，“尤其是在诗歌方面，他是一位可爱的作家。”

两年里，甲壳虫乐队从利物浦的一支摇滚乐组合晋升为唱片界最炙手可热的艺人，因此他们对于这种疯狂早已司空见惯。真正吸引他们的是美国青少年发起的汽车突击战。

几乎就在四位“甲壳虫”搭乘着各自的“凯迪拉克”牌豪华轿车离开机场，前往曼哈顿的“广场酒店”时，第一轮突袭便立刻上演了。五个孩子乘坐一辆深蓝色“福特”，越过了高速公路上的车队；其中有个家伙每经过一位甲壳虫，就探出后窗，手里还晃着一条红毛毯。

接着登场的是一辆白色敞篷汽车。烟尘中，涂在车身两侧的“BEE-

TLES”大字清晰可见。一辆警车紧随其后，警察还打开了警灯和警笛。但这群孩子（一个女孩负责开车，两个男孩坐在后座）却熟视无睹地向每位“甲壳虫”挥着手臂，直到警察示意他们把车开到路口。

在第二辆豪华轿车里，甲壳虫的宣传代理布莱恩·爱泼斯坦（Brian Epstein）问乐队成员之一的乔治·哈里森：“你都看见了吧，乔治？”

哈里森看着烟尘中这辆带有乐队标识的敞篷汽车，说：“他们把Beatles拼错了。”

第三轮突袭则是全程追击。一位褐发妙龄女郎自称是卡罗琳·雷诺兹（Caroline Reynolds），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新迦拿，就读于韦尔兹利大学。她还说自己付给出租车司机10美元，要一路跟着车队进城。卡罗琳带着淡淡的微笑经过了每位甲壳虫，终于在第三大道和第63街的一个红绿灯口赶上了乔治·哈里森的豪华轿车。

“怎样和一位甲壳虫开始约会呢？”她对着窗外说。

“她会说你好。”哈里森对着窗外回答。

“你好！”她说，“至少还有九个人会从韦尔兹利赶来。”红绿灯变了，车队再度离去。

“广场酒店”坐落于中央公园南面，和第五大道毗邻。它本是纽约最静谧的一家旅馆，而现在四周却全是警察，酒店因此感到震惊。“甲壳虫”在数月前就预定了“广场酒店”，而当时酒店却不知道这是一支引起年轻人骚乱的摇滚乐队。

约有500名年轻人出现在“广场酒店”，其中许多都是女孩。警察在酒店与大道之间的广场上设下路障，并将多数人疏散到路障之后。酒店的各个入口都被保卫起来。第一辆豪华轿车刚一出现，就有人开始尖叫。

甲壳虫乐队在第五大道迅速跳出车门。这时，青少年们被统统拦住。当甲壳虫跑上楼梯时，老妇人们跑上前去碰他们的手臂和后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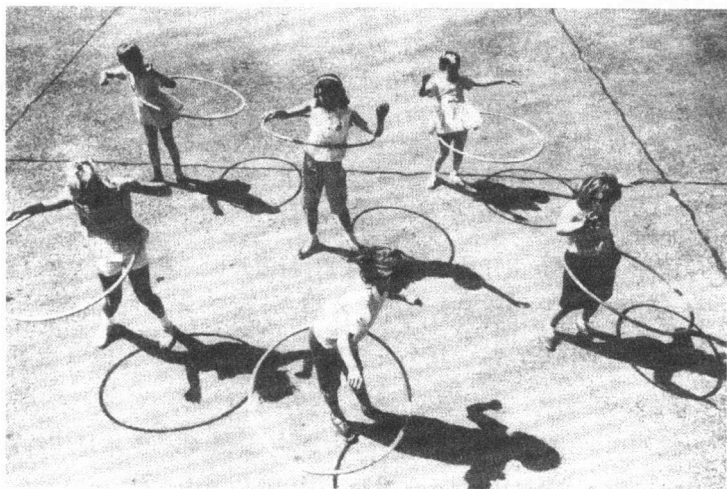
来到“广场酒店”后的“甲壳虫”养精蓄锐，等着电视出境（苏利文剧场，星期日）、录音（Capitol唱片公司）、音乐会（卡耐基大厅，星期三）和一次旅行（华盛顿、迈阿密）的轮番上阵。在他们进入酒店数小时之后，孩子们依旧围着“广场酒店”。一群女孩向每个走出酒店的人打听：“你见过甲壳虫吗？你摸过他们吗？”

这时一名警员走了过来，一个女孩高喊：“他摸过甲壳虫！我见到过他！”于是，女孩们纷纷扑向这名警员的手臂和后背。可这算不上是群氓攻

击,姑娘们的脸上都带着痴痴的微笑。

当许多人的衣着打扮、饮食起居、言谈内容全部一模一样时,上帝眷顾那些没有迷失在群氓里,有自己想法、过自己生活的人。

——汉密尔顿·赖特·麦拜(Hamilton Wright Mabie)



每只呼拉圈的制造成本只要几美分,而售价却达 1.98 美元,它很好地体现出消费者行为作用于自身的方式。隔壁的女孩有了一只呼拉圈,所以你的女儿也得有一只。你的女儿有了一只,那么现在两个女孩都有了,于是四个以上的女孩也得人手一只;并且无论翻版的品牌有多么逼真,她们都只要正版货。奇怪的是,当狂潮影响到关键性群体时,就变得非常明确。照片上六只转动的呼拉圈是在纽约地区的运动场上拍摄的,它们来自 1958 年(那一年呼拉圈进入市场)“威摩玩具制造公司”出售的 1 亿只产品。

等待戈多

谣言和暗示之所以威力强大,是因为无论情况本身如何,人类天生就倾向于最好或是最坏的可能。假如一位天气预报员说明天会下几英寸的



雪,超市就会挤满心情焦虑的顾客,大家都为度过百年一遇的暴风雪前来购买足够的给养。人们觉得:如果是几英寸的雪,怎么就不可能是几英尺呢?如果是几英尺,怎么就不可能是几码的雪呢?

同样,当一名出色的商业分析师宣布某家公司股票的好坏时,该公司的股票曲线可能会远远超过它的收益曲线。在投资者看来,“光景好”就是遍地黄金;“光景差”就是多灾多难。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倾向于集体行动,而这只会愈发夸大现实。这就是我们为人性付出的代价:我们具有想像力。

尽管焦虑引起了许多苦难,积雪还是消融了(至少在下游的 48 个州);钱也只是钱。当永生受到明显挑战时,人们就更加倾向于集体的心智,极端事件出现的几率也越高。1978 年,在南美洲密林深处的琼斯镇发生了难以想像的集体自杀事件:900 多名吉姆·琼斯(Jim Jones)的追随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件事的诱因很多:由于接受了彻底的洗脑,吉姆的信徒定期排练集体自杀;一位到圭亚那调查琼斯及其“人民圣殿”的美国国会议员遭到谋杀;琼斯自身扭曲的心理。无论归咎于谁,事实就是如此简单:数以百计的民众为了追求永生,抛弃了个人的理智,在集体观念的统一支配下作出了怪异的举动。从这个角度看,早在“琼斯镇”之前美国就发生过许多类似的历史事件。

1831 年,纽约的一位非神职布道者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宣称,当他阅读《圣经》时发现:世界将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初的“最终审判日”^①灭亡。最后,米勒将这一时间设定在了 1844 年 10 月 22 日。此时他的追随者(就是今天耶稣复临论者活动的先驱)已近 100 万人。尽管没有“琼斯镇”事件那么恐怖,米勒预言的最后几天却也令人惊惧。这篇匿名描述摘自 1884 年出版的一段费城历史。

兴奋的情绪在费城已经持续了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1844 年夏,人们的兴奋更是得难以形容。“米勒尔教堂”坐落在伍德和卡罗惠尔之间的朱丽安娜街区,米勒的追随者们在那里日夜集会,他们望着星星和太阳,祈祷并且警告冥顽不灵的人:“‘审判日’近在眼前。”

许多信徒开始以极低的价格变卖房屋;其他人放弃了各自的奋斗,关

^① 据《圣经》记载,在最终审判日,耶稣将对世间各个民族的所有人作出审判。就像牧羊人将绵羊与山羊区分开来一样,耶稣将人们分成善恶两类。善人将在耶稣的右手边,获得永生,而恶人则站在耶稣的左手边,接受永世的惩罚。——译者注

门歇业,或是搬出了自己的寓所。切斯耐特大街以北,第五大街的一家店铺贴着这样一张告示:

“关闭本店是为了迎接即将于10月20日出现的‘万王之王’。叫上身边的朋友为我主加冕吧。”……人们在这种兴奋情绪的支配下走向疯狂。

某天夜里,一帮年轻人包围在一所会堂的窗户四周,在信号发出后,用明亮的手电筒将原本阴暗的房间照得透亮,空气中还传来爆竹的嘶吼。屋内的“圣徒们”怕得要命,以为是可怕的飓风来了。

世界末日到来前的那个周日可谓多事之秋。“朱丽安娜街区小教堂”里挤满了人。马路上,一伙不相信预言的人用石头砸碎窗户,对着信徒们发出怪叫。莫顿·麦克迈克尔(Morton McMichael)率领“北自由街”、“春园街”的警力以及州内的民防团,准备平息暴乱。许多会众赶回家后随即丢下了家具,门窗大敞着,开始向城郊地区挺进。许多人来到新泽西,而他们的核心团体则集中在离“市场街”大桥3.5英里开外、“达秘路”上的伊萨克·约孔田间。这里,随着一阵飓风的到来更加坚定了米勒派的信念,原本怯懦的灵魂更为惊恐。飓风席卷了城市,破坏了运输,摧毁了房屋。

人们集中在“达秘路”的两个帐篷里。而由于人数众多,孩子们连续两天被迫在田野里跑步,接受风暴的无情洗礼。他们对着父母苦苦哀号;而家长却穿着白色升天礼袍,个个饿得几乎筋疲力尽,他们躺在又冷又湿的地上,一面祈祷一面唱着圣歌,还不时地发出呻吟。

22日中午,“新郎”^①即将驾临;一场大雨即将从天而降;圣徒们即将在旋风中集结。在十月那个夜色迷离的晚上,他们就站在那里,身体因寒冷和恐惧而颤抖着——他们仰面朝天,眼睛紧盯着天空,试图捕捉到一缕穿透云层的可怕光线。

然而,随着破晓的来临,幻想中止。人们怀着沮丧的心情四散离去,静静地、灰溜溜地回到自己的房子。

你可以使一群乌合之众相信任何事情。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芝麻和百合》

^① 基督教将耶稣基督视为“新郎”,所有基督徒都是由“新郎”选定的伴侣——“新娘”。“新郎”对“新娘”付出无与伦比的爱。基督教认为:夫妻关系是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也是最需要建立和营造的关系。





你说了算!

新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 奇诡之音

谣言能取得最好的效果是因为多数人事先就接受了既定的前提。例如:对于生物科技的所谓憧憬引起了针对生物科技行业及其股票的投资与大宗购买,因为我们许多人都愿意相信生物和科技的结合能够解决困扰了人类几个世纪的医学难题。

出于同样的原因,当生物科技没有兑现承诺时,潜在的对于基因疗法的憧憬就取而代之。而这一次憧憬的夸大完全是因为加入了科学的夺目光辉。

从长远角度看,基因疗法几乎肯定能够兑现承诺;而生物科技也是一样。与此同时,人们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却收效甚微。

在新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关于飞碟陨落和捕获外星生命形式的谣言可能正对了听众的口味。拥有50 000人口的罗斯威尔坐落在新墨西哥州东部宛若月球表面的平原上。

20 世纪 20 年代,罗伯特·豪达德(Robert Goddard)最先在这里开展了一些火箭方面的先期试验。又过了差不多 20 年,曾将世上惟一两枚原子弹投放于战场的飞行队就曾驻扎在“罗斯威尔空军基地”。“怀特·桑德斯导弹试验场”和“三位一体”(第一颗爆炸的原子弹)试验基地,距此均只有近 1 小时的路程。

总之,这里的居民都习惯于留心天空中的状况,就像约瑟夫·法尔考(Joseph Falco)在《网络西部》杂志中所写的:“如果你是一个定期造访人类社会的外星人,而且侦测到了文明社会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你就会前往罗斯威尔这片土地。”

然而,诱因只是导致罗斯威尔发生变化的部分原因。由于拥有了两座博物馆——“不明飞行物博物馆”和“国际不明飞行物博物馆及研究中心”,罗斯威尔已经成为媒体(一系列令人咋舌的图书、B 级电影、粗制滥造的电视剧和难以计数的网络帖子)竞相演绎的主题。它们都宣称太空船就是在那里坠毁的,还说外星生命形式仍被保存在政府的某个秘密实验室里。为了将这种诱因转变为一则举国皆知的笑话和一尊神龛,罗斯威尔还需要一次重大事件。于是在 1947 年 7 月 8 日,一篇刊登在《罗斯威尔每日纪事》头版的文章就出现了。



1954 年,探寻不明飞行物的热潮席卷欧洲。图中,伦敦的一位报摊主利用公众的歇斯底里出售一期《画报》,其中配有一则外星人入侵地球的图文小说。(超景图片库/华盖创意图像)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帮助谣言成为现实的经典元素；在这则蒙骗了头脑冷静人士的案例中，有一位讲述细节的志愿者，有权威的认可，以及一则被《华盛顿邮报》前任编辑本·布莱德里(Ben Bradlee)称为“令人惊叹”的故事。

罗斯威尔空军部队在罗斯威尔地区的大牧场捕获了飞碟

没有透露飞碟的细节

罗斯威尔的五金商人及其夫人声称见过飞碟

“罗斯威尔空军基地 509 轰炸队”的情报处于今天中午宣布：该基地已拥有一架飞碟。

据情报处长 J. A. 马塞尔(J. A. Marcel)少校主管部门传来的报告，某位未确认身份的农场主首先报告榭力夫·乔治·韦尔考克斯(Sheriff Geo. Wilcox)，说自己在农场里发现了飞碟；而后，人们在罗斯威尔附近的牧场上发现了该装置。

据称，马塞尔少校从自己部门带了一支小分队来到牧场，找出了飞碟。

飞碟经这里的情报处长检查后，交给了“高层指挥部”。

情报处称：目前尚未得知关于飞碟结构或是飞碟外观的任何细节。

丹·威尔默特(Dan Wilmot)先生及其夫人显然是罗斯威尔惟一见过所谓飞碟的人。

上周二晚上 21:50 左右，这对夫妇坐在南宾夕法尼亚 105 号寓所的走廊上。这时，一个又大又亮的物体从东南方的天空掠过，急速向西北方向飞去。

威尔默特的叫声引起了妻子的注意，两人跑到楼下的院子里观看。威尔默特估计当时飞碟出现不到 1 分钟，可能只有四五十秒。

威尔默特说：飞碟出现在近 1 500 英尺的高空，行动迅速。他估计时速在 400~500 英里。

它的表面呈椭圆形，就像两个嘴对嘴倒放着的碟子或者老式洗脸盆。飞碟通体发光，光线好像是从里边透出来的；假如光线是从底下发出的，绝不会是这个样子。

威尔默特说：从他站的位置看，该物体宽约 5 英尺，尽管这只是猜测，考虑到它离镇子的距离，威尔默特认为其实际直径在 15~20 英尺。

威尔默特说他没有听到声音,威尔默特夫人却说她在很短的时间里听见了“嗖”的一声。

这个物体从东南方而来,消失在六英里山附近的树梢上空。

威尔默特是镇里一位备受尊崇与信赖的居民。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而是希望其他人能够站出来说曾经见过一架飞碟,但是今天他终于决定站出来,讲述自己看见飞碟的经过。他刚刚决定将看到的细节公之于众,就传来了罗斯威尔空军部队捕获飞碟的消息。

在群体中,每种情感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人随时准备为集体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詹姆斯·瑟伯脑海中的决堤日

有时,谣言和暗示总会有意无意地通过激情燃烧的方式,相互交织。执政者、企业公关部和顾问编造故事的艺术几乎就是平衡谣言与暗示的艺术。他们以这种方法把控全局;同时,将大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指定的目标上。他们既能够向人们展现当权领袖的天分或仁慈;也能够将批评者和领袖敌人的言行归结为愚蠢和诽谤。

在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卸任前的几年里,欺瞒意味着:恰到好处地让莫尼卡·莱文斯基(Monica Lewinsky)与总统的桃色绯闻变得含混不清,从而使人们无法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在微软和司法部的法庭拉锯战中,比尔·盖茨(Bill Gates)手下那帮捕风捉影的能工巧匠们利用了许多相同的战术,试图模糊事件的概要。在惠普公司与康柏公司的兼并战中,漫天飞舞的流言让人们觉得天旋地转。

然而,就像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在回忆录——《我的生活和艰苦岁月》中描述的精彩时刻,有时谣言与暗示的交织只会让人觉得可笑。当时瑟伯生活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家乡,那里发生了堤坝“决口”,于是,可笑的事情便出现了。

我真希望自己能够忘记全家在 1913 年俄亥俄州洪灾中的经历。我们既承受过苦难,也经历了动荡与困惑;尽管如此,我对这个州和这座城市的感情却始终未变。我现在过得不错,真希望哥伦布市就在这里。然而,在 1913 年的那个中午,当堤坝决口时,更准确地说,当镇上的所有居民都以为堤坝决口时,人们惊悚地发现:整座城市变为了地狱。即使我们在事件中表现出了高尚的品格,却仍感到心情沮丧。尽管爷爷完全误解了当时的状况[他以为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Nathan Bedford Forrest)的骑兵是我们面临的威胁],但是他面对危险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却在我心中烙下了永久的印记。当时我们惟一可能的逃生方式就是逃出门,而爷爷却坚决表示反对,他手中还舞着一把旧式军刀。“让孩子们——过来!”他咆哮着。与此同时,几百人惊恐万状地从我们的门前涌过,嘴里喊着:“往东跑!往东跑!”无奈,我们只得拿起烫衣板将爷爷打晕,抬着他逃命。其实在最初的半英里路上,由于这位老先生身体僵直(爷爷的身高超过 6 英尺,体重将近 170 磅),城里其他人都跑在了我们前头。如果不是爷爷在帕森斯大街和汤恩大街的拐角处苏醒的话,我们肯定已经被呼啸的洪水赶上并包围了——我是说,如果那里真有呼啸的洪水的话。因为随后惊便消散了,人们也羞愧难当地回到各自的房间和办公室;大家竭力掩饰着自己实际跑出的距离,并为奔逃寻找着各式各样的理由。城市工程师指出:即便堤坝当时决口,“西区”水位也不过上涨 2 英寸多一些。当时,水位不到 30 英尺的“西区”笼罩在决堤的惊恐情绪里;在 20 年前的那场春季大洪灾中,俄亥俄所有的河边小镇也曾被这种情绪所笼罩。“东区”(那里是我们的生活区,也是所有奔逃的发生地)当时根本就没有危险。只有水位到达 95 英尺,洪水才会越过高街(这条通路将小镇分为东西两区),包围“东区”。

然而,“我们就像厨灶下的小猫一样安全”的事实却丝毫没有消除人们极度的绝望和莫名的失落;相反,当决堤的呼喊像草原上的火焰一般蔓延时,绝望与失落充塞了“东区”居民的心房。城中的一些人平时举止高雅、处变不惊、愤世嫉俗、头脑冷静,这时他们却丢下自己的妻子与速记员,离开了家庭和办公室,往东跑去。世上比“堤坝决口了!”更让人可怕的警告为数不多。当号角声在耳畔响起时,就连那些住在堤坝 500 英里外的人们也很少能够停下来仔细思考。

据我回忆,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有关决堤的谣言大概始于 1913 年 3 月 12 日的中午。由于高街是一条主要的商业街道,买卖双方在这里平静地

讨价还价,商人们不动声色地争吵、算计、哄骗、报价、拒绝、妥协。当时,中西部公司律师界的元老——达瑞尔斯·康宁威(Darius Conningway)正借用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的话告诉“公用事业委员会”,他的地位就像北极星那样无法动摇。其他人一边吹牛,一边偷偷做着手势。突然有人跑了起来。可能他只是突然想起和妻子还有约会,而现在已经迟到很久了。总之,他沿着布罗德大街向东跑去(也许他是向“马拉马餐厅”跑去,那里是夫妻约会常去的地方)。另一个人也跑了起来,他或许是一个兴高采烈的报童。一位大腹便便、韵事缠身的绅士也开始一路小跑。10分钟里,从“联合仓库”到“法院”,高街的每个人都在奔跑。原本大声的咕哝逐渐变成“堤坝”——这个可怕的字眼儿。“决堤了!”——将恐惧融入这句话的,可能是电车里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太太,可能是一位交警,也可能是一个小男孩。没人知道是谁喊的;现在这都不重要了。两千多人都突然狂奔起来。“往东跑!”的呼声响了起来——往东跑就能远离河水,往东跑就能脱离危险。“往东跑!往东跑!往东跑!”

黑压压的人流沿着各条街道向东面涌去;人群中的主要成员来自干货店、写字楼、马具商店、电影院,所经之处,家庭妇女、小孩、残疾人、仆人、猫狗也叫喊着冲出房门,加入了队伍。人们跑出家门时,火还烧着,食物还煮着,门还大开着。而我却记得母亲当时熄灭了所有的火,还拿了一打鸡蛋和两条面包。她打算去只有两街之隔的“纪念馆”的楼顶避难,那儿的一间布满灰尘的屋子是战后老兵聚会的场所,里面还放着战旗和舞台布景。然而沸腾的人群却喊着“往东跑!”的口号,把她和家里其余的人拖了回去。跑到帕森斯大街时,爷爷完全清醒了,他嘲笑着溃逃中的人群,就像一位满腹怨毒的先知;同时,他又忠告人们要有先有后,还要躲开瑞贝尔犬。可是到最后,他也听说了堤坝决口的消息,于是高喊了一声“往东跑!”便一手搂着一个孩子,一手抓着一位弱不禁风、年纪在42岁左右的神职人员,向前追去。我们渐渐赶上了前头的人。

穿着制服的消防员、警察和部队官员(镇子北部的福特·海斯曾进行过一场检阅)也四散奔逃着,加入了浩浩荡荡的人流之中。一位步兵团的陆军中校正在门廊上打着瞌睡,一个小女孩儿扯起嗓子喊着“往东跑!”从他面前跑过。以往的训练使指挥官具有了当机立断和立刻服从命令的本事,于是他跳下门廊,开始全速奔跑,并很快超过了那个孩子;他一边跑,一边喊着“往东跑!”小街上的人听到他们二人的呼喊都奔出了房子。“怎么

了？怎么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胖男人拦住中校问道。于是，落在后面的军官问小孩儿怎么了。“决堤了！”小女孩儿气喘吁吁地说。“决堤了！”中校吼道。“往东跑！往东跑！”很快便有 300 人从起居室、商铺、车库、后院和地下室赶来，大家围在中校的身旁。而他则搂着那个精疲力竭的孩子，领着这群人，一路狂奔。

受恐慌情绪的影响，迄今为止也没有人能够准确计算出 1913 年参与大溃逃的实际人数。这次溃逃从最南端的温斯洛·波特琳工厂开始，向北延伸了 6 英里，到克林顿维尔结束。事情的结局和开始时一样可笑；无论是身穿晚礼服的绅士、普通百姓，还是披着天鹅绒的妇女，所有人都溜回了家，空荡荡的街头一片祥和的气氛。不到两小时，尖叫声、哭喊声以及乱哄哄的人群就从城市里消失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向东一口气跑到了 12 英里外的雷诺兹伯格；起码有 50 个人跑到了 8 英里外的“乡村俱乐部”；而大多数人都疲惫地放弃了，有些人干脆爬到了 4 英里外“富兰克林公园”的树上。最后，民兵们开着卡车四处游走，并且通过扩音器高喊：“堤坝没有决口！”于是秩序得到了恢复，恐惧也化为乌有。然而，在一开始，这种宣讲只是平添了人们心中的困惑，使其更为惊慌，许多惊慌逃窜的人错把民兵们的话听成了：“堤坝已经决口了！”而这无疑是为灾难下了定论。

当时太阳一直静静地照耀着大地，根本就没有要发大水的迹象。要是一名飞机上的旅客碰巧看见下方散乱而激动的人群，他将很难猜透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这位观察者看来：无论原因如何，它都引起了一种莫名的恐惧，这就像是被遗弃在海上的“玛莉·塞利斯特号”。当时舰上的大火默默燃烧着，甲板在阳光下静静地闪着光。

事发时，我的一个阿姨——伊迪丝·泰勒(Edith Taylor)正在高街一家影院里看电影。这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声音越来越响，渐渐盖过了正厅后排的钢琴声[当时正在放映 W. S. 哈特(W. S. Hart)的影片]。脚步声中还不时有叫声传来。坐在我阿姨身旁的一位老头儿嘴里嘟哝着离开了座位，一路小跑地上了过道。这让所有人都觉得恐慌。观众立刻挤在了过道上。“起火了！”一个女人叫道，她总是盼着自己被影院的大火烧死。而这时，外面传来了更为响亮而一致的呼喊。有人大叫：“决堤了！”在我阿姨前面的一个小个子女人叫到：“往东跑！”于是人们向东逃去，大家乱哄哄地奔上了街头。影院的银屏上，比尔·哈特(Bill Hart)平静地诉说着暴徒的虚张声势，勇敢的女孩在钢琴前纵情弹奏着《划桨！划桨！划桨！》，

接着又是一曲《闺怨》。影院外面，人们正拥挤着穿过州府的院子，其他人则攀在树上，一个女人成功爬上了“俄亥俄七杰”的塑像^①，而铜像上的雪曼(Sherman)、斯坦顿(Stanton)、格兰特(Grant)和谢里登(Sheridan)则冷冷地望着这座即将土崩瓦解的都城。

“我先是向南跑，到了州府大街再向东，跑到第三街后再向南，来到了汤恩大街便往东一路奔去，”我的阿姨伊迪丝写信对我说，“有个女人超过我，跑到了街道当中。她个子瘦高，眼神很严厉，长着一个坚毅的下巴。尽管所有人都在喊叫，我却仍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那个女人年近 60，尽管如此，她跑步的姿势却显得轻松而优雅，并且她的状态也不错，于是我费了些功夫才赶上她。‘出了什么事？’我气喘吁吁地问。她瞥了我一眼，便又面向前方，还稍稍加快了脚步。‘不要问我，问上帝去！’她说。”

“等我跑到葛兰特大道时，已经筋疲力尽。马洛里(H. R. Mallory)医生——还记得马洛里吗？就是那个长着白胡子，看着像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男人。马洛里医生，我曾在第五大街和汤恩大街的街角甩掉过他，现在他又超过了我，嘴里还喊着：‘它追上我们了！’；我觉得那个‘它’肯定与我们有关，你也知道马洛里医生的话总是让人信服。尽管当时我还不明白他的意思，但不一会儿就找到了答案。马洛里身后是一个蹬着溜冰鞋的男孩，前者却将冰鞋的摩擦当成了激流的声响。最后，他来到帕森斯大街和汤恩大街交界的‘哥伦布女校’，整个人已完全崩溃，只等着塞欧托河冰冷且泛着泡沫的河水将自己吞没。而当男孩盘旋着经过马洛里身边时，他才第一次明白了自己躲的究竟是什么。他回头望向街道，根本没有水的影子；尽管如此，休息了一分钟，他又向东跑去。在俄亥俄大道，他又赶了上来，并和我在那里一块儿休息。我估计，大约有 700 人从我们的身旁经过。滑稽的是，所有人都在徒步奔跑。似乎没有人敢停下来去开车；我想起来了，那时的汽车都是曲柄发动的，这也许就是原因所在。”

第二天，城里的人还是若无其事地做着买卖，但却没人开玩笑。过了起码 20 年，人们才敢以轻松的方式谈论这次决堤事件。然而，即便是 20 年后的今天，当你提起那次“午后大奔逃”时，马洛里医生等少数人还是会像蛤蜊一样关上话匣。

^① 由利瓦伊·斯科菲尔德(Levi Scofield)于 1894 年创建，以纪念俄亥俄州孕育的七位在美国发展进程中起到重大作用的俊杰。——译者注





“我是一个跟随集体活动的傻瓜。”

当周围的人都丧失理智时，你需保持冷静

谣言和暗示总是与我们如影随形，施展着煽动群体的威力。然而，身为个体的每一个人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当群体开始达成一致并且采取行动时，我们也不能不论情况、简单地反其道而行之。毕竟某些谣言与暗示最终成为了事实。牛奶可能真的酸了。在国际通货市场上，公司与价格可能真的遭受重创。我们忽略了所有这些危及自身的可能性。当然，群体也不总是能将我们带往理想的彼岸。答案从来就介于两者之间，这意味着我们要做必要的努力。

下面是一些需要铭记于心的条例。这些条例由行业专家精选而成，并经过了我在实践中的反复验证。

根据谣言和暗示的自身价值，而非传播它们的权威级别，对两者进行评价。美国西北大学宗教学教授——理查德·基克希弗(Richard Kieckhefer)和上世纪中叶政治迫害运动中一位杰出研究者都在提醒我们：“当你意识到开展政治迫害的人在许多事件里都是社会里那些恪守道德、充满睿智的领导者时，便会发现有趣的历史性难题。”

谨防科技力量。它会加速流言的传播，务必证实科技成果。帕翠西娅·A. 特纳(Patricia A. Turner)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民间传说课程的教授，在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遇袭之后，她马上在《高等教育

纪事报》发表了评论：“人们大都更相信新兴科技。我们通过电子邮件获取东西，电子邮件的来源似乎出奇得可靠，于是人们对其深信不疑并且认为有必要将它转发给别人。”

我们还要提防满足一己私欲的天性，它会使你成为流言的散布者。“我们在传播谣言时会感受到一种愉悦，”特纳教授补充道。“当你还是一个小孩儿的时候，传播谣言就能使你获得更多的力量。记住这句嘲讽之词：‘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就是这么回事。”

永远不要忘记“奥卡姆剃刀”^①，我们的先人用它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如果一条极为复杂与偶然的传闻里还充塞着各种奇思妙想，那么一旦你揭开它的面纱，就会发现其实里面空无一物。如果情况相反，那么传闻的核心部分则值得一听。

最后，记住这七条由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奥渥斯·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总结出的“狂热法则”。

- 狂热的升温需要时间。
- 狂热肆虐的范围越广，被它虏获的智力形态也就越高。
- 人们越是狂热，信奉的主张、表现的行为就越是可笑。
- 人们越是狂热，反应就越是激烈。
- 狂热总是一浪接着一浪，激起不同个体的情感。
- 与循规蹈矩的社会相比，富有活力的社会更容易受到狂热的摆布。
- 道德同质性和心理同质性为狂热的发展推波助澜。

人们在传播谣言时，只会愈发地夸大其词。

——理查德·威拉德·亚摩(Richard Willard Armour)

^① 公元14世纪，一名叫威廉的英国人对当时无休无止的关于“共相”、“本质”之类的争吵感到厌倦，于是著书立说，宣传唯名论，只承认确实存在的东西，认为那些空洞无物的普遍性要领都是无用的累赘，应当被无情地“剃除”。他所主张的“思维经济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因为他是英国奥卡姆人，人们就把这句话称为“奥卡姆剃刀”。

第三章 恐惧和惊慌



引言

有时,我们会发现恐惧和惊慌几乎从天而降。战争期间,考文垂、广岛、位于阿富汗境内托拉博拉的塔利班山,成为军事打击的目标,不足为奇。惟一的问题是:轰炸机何时到来,数量有多少,会引起怎样的骚乱。早在给养管道被实际破坏之前,中东的政治巨变就已经导致美国驾车人士的油价骚乱。在金融舞台上,投资者往往在自己脑海中武断地设定数量:在1893年的金融恐慌中,人们将美国黄金储备设定为1亿美元;在最近网络市场的恐慌里,人们则将纳斯达克平均指数设定为2 000。在这些标准尚未达到以前,恐惧和惊慌通常不会显露出来;而标准一旦突破,即便是许多经验老到的投资者也会感到非常恐慌。

还有一些时候,尽管我们通过反复推敲使得事情水落石出,但当恐惧和惊慌真的爆发时,我们仍会感到惊讶。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为了登上总统宝座,曾经掀起一场平民主义的战争。他保证要将华盛顿的权贵统统拉下马去,建立一个真正“民主、民权、民生”的政府。1829年3月11日,这棵“北美山上的大胡桃树”终于如愿以偿,而曾经为之倾倒的民众则来到了华盛顿,参加他的就任典礼和之后在总统府邸举行的庆祝仪式。当时在场的玛格丽特·贝阿德·史密斯(Margaret Bayard Smith)描绘出以下这幅“两万民众闹白宫”的场景。

未经任何安排,也没有值班警卫,整个白宫被一群乌合之众所淹没。我们来得太迟了。确切地说,那些渴望与“北美山上的大胡桃树”握手的人险些把总统挤死、闷死、撕成碎片。现在,总统已经从后门或是南门撤离,逃回了自己在加德斯比的寓所。

争抢点心的人群打碎了总价达数千美元的雕花玻璃和瓷器……晕倒的女人,鼻子上沾满鲜血的男人,难以描述的混乱景象——那些进来的人再也无法走出门去,于是只得爬出窗外。

后来,宴请民众并准备撤离的总统被挤到了墙边。有

市场、 群氓和暴乱

第三章 恐惧和惊慌

好几次,许多绅士都围上去,用身体组成一堵人墙,这才将总统解救出来。由于压力巨大,一位叫庞福德的上校(他也加入了护驾的行列)说:当时他一直担心人墙会被挤垮或是压在总统身上。就在这时,窗户被推开,人群找到了出口,否则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恐惧和惊慌往往取材于我们周围的环境。前一刻我们还安然无恙,下一刻却有着性命之虞。2001年9月11日,去“曼哈顿下城”或是“五角大楼”工作的人绝对不会想到:整个世界即将天翻地覆。当恐怖事件突然发生时,我们平常恪守的标准被彻底颠覆。当时,一位华盛顿妇女怀孕已近



1883年5月30日:一大帮民众簇拥着参加了布鲁克林大桥的落成仪式。这时,人群中不知是谁胡乱嚷道,桥要塌了。恐慌出现,有12名行人被活活踩死。

8个月,而且还是头一胎。她说:在“五角大楼”遇袭的几分钟里,她逃出自己在“杜邦环岛”的办公室,步行了将近10英里地,回到在弗吉尼亚城郊的家中——如果乘地铁,这段路来回还不到30分钟,但她却徒步走了近4个小时。在袭击发生后的几小时内,人们神情迷惘、漫无目的地在纽约城中游荡。他们并没有在“世贸中心”塔楼的袭击中受伤,却还是被恐惧和惊慌完全笼罩。

有时候,那些突如其来的事情甚至并不真实。谣言和暗示的力量一旦影响了某个关键性群体,群体的本能便立刻被唤醒,内部警报被拉响。我们仿佛已经看到:当演出进行到一半时,剧院舞台发生了火灾。

20世纪80年代后期,宾夕法尼亚海兹顿的一名中学生没有留下绝笔便自杀了。警方在事件调查中,也未能发现任何的线索。然而,随着调查的进行,学生中却传出一条谣言:死去的男孩曾是一名邪教徒,他的死仅仅是该组织行动的第一步。谣言在最终的版本里声称:邪教会在即将举行的春季舞会上再次出击。邪教徒们可能会在酒里下毒,也可能会向同学或者他们自己开火——这是他们为了完成黑暗王子的某项秘密指令,而开展的一次集体自杀。毫无疑问,随着舞会之夜的临近,谣言化作恐惧和惊慌,最终成为了海兹顿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比尔·埃利斯(Bill Ellis)所说的“谣言恐慌”。

所幸的是,故事到此为止。海兹顿的舞会波澜不惊,随着离奇死亡的结束,学校的紧张气氛得到了缓解。和形成时一样,恐慌随即消散。然而,一旦谣言和暗示的力量自行演变为某种更为强大的事物,后果便会难以预料。

1789年,恐惧的阴云悄悄笼罩了法国各地的小镇和乡村。除了时间和细节上的差异,它与宾夕法尼亚中学事件的内容出奇地相似。

“7月和8月可以算作‘大恐慌’的月份,”H. 莫尔斯·斯蒂芬斯(H. Morse Stephens)在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时写道,“镇上的人和村里的人都感到莫名的恐惧。”

斯蒂芬斯回忆:到了7月底,传出一条谣言——国王正在雇佣强盗打家劫舍(由于当时巴黎和其他大城市正在闹革命,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它却没有任何的已知事实作为佐证),于是人们变得恐惧起来。然而,此时的影响已经一发不可收拾。

“7月28日,蒂埃里城堡接到消息:2500名‘佩带短枪的骑兵’或称‘强盗’,正沿着苏瓦松路挺进,”斯蒂芬斯写道,“警钟响起,资本家们出城迎敌。路上,一位磨坊主告诉他们:‘强盗’们刚刚洗劫了布雷吉治,那里已是

一片火海。但当队伍赶到那里时，却发现‘火海’不过是太阳照在屋顶上引起的反光。接着有人说：‘强盗’正在穿越埃松美的马恩；然而，当疲惫的人们赶到那里时，却发现所谓的‘强盗新团伙’其实是埃松美的妇女。妇女们被出现的队伍吓了个半死，反倒以为对方才是真正的强盗。”

其实，恐惧早已占据了法国人的心灵，并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侵蚀着他们。

我们对恐惧和惊慌都有切身的体验：此时我们的情绪突然失控，产生了一不顾一切想要逃离的念头。血液涌向最需要它的头部与心脏。肌肉开始紧张。在极端情况下（长时间的水下停留、浓烟所导致的呼吸困难），身体开始停止工作或是出现调轨，因为这样就能蓄积能量，维持主要器官的活跃。

大约 40 年以前，我的同事曾在弗吉尼亚大学上过一堂介绍心理学的课程。当时，教授走进讲堂，将手伸进公文包，从里面掏出一把没有上膛的发令枪，连开了六枪。

“不许动！”他吼道；而此刻，最后那声枪响仍在讲堂的墙垣上回荡。“看看你们自己！这就是惊恐时出现的典型反应。”

事实的确如此：每个人都双眼圆睁、瞳孔放大、嘴巴张开以吸入更多的氧气、下颚前伸。大家都在各自座椅的边缘平衡着身体，随时准备逃跑或是战斗。当“永不沉没”的邮轮——“泰坦尼克号”在首航途中第一次撞上冰山时，船上的富豪大概出现过相同的反应。无论是你的宠物猫，还是非洲大草原上的长颈鹿，当它们猛然听到一声巨响时，都会产生与此相同的反应。在整个动物王国里，恐惧和惊慌是强效的均衡器。

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孟子，《尽心上》

最蹩脚的剧本：火星来了

1938 年 10 月 30 日深夜，突然爆发了一场席卷全美的恐慌。从表面看，事件的发生毫无道理。仅仅因为广播剧里播出了《星际战争》[这是 H. G. 威尔斯(H. G. Wells)在 1898 年撰写的一本有关宇宙入侵的惊悚小

说],数千人就被吓得魂不附体;大家坚信:“奥森·韦尔斯(Orson Welles)的空中水银剧场”演播的所谓火星攻击事件确实存在。

1938年11月7日版的《时代》周刊报道:在新泽西的纽华克,20多户居民用湿毛巾捂住脸,准备对抗火星即将发动的毒气进攻;仅圣·迈克尔医院就收治了15名受到惊吓的患者。在田纳西,《孟菲斯新闻弯刀》召回了麾下的编辑,开始准备一期有关芝加哥爆炸和圣·路易斯爆炸事件的专刊。据说《孟菲斯》还曾因此遭到威胁。在匹兹堡,一名妇女在服毒时高喊:“我宁可服毒自尽,也不愿选择那种死法!”好在她的丈夫及时加以了阻止。与此同时,在俄亥俄的代顿市,一名恪守时间的男子打电话给《纽约时报》,询问世界毁灭的准确时间。

“水银剧场”的《星际战争》在播出前后都曾受到指责。不仅如此,万圣节的到来使得气氛异常紧张。(韦尔斯在播出结束时曾告诉听众:这只是剧院“自己披着条被单……装神弄鬼!”)然而听众似乎觉得这一切不够可怕,他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转动收音机的旋钮,想要听听其他电台是否已经毫无顾虑地将这则世纪故事一笔略去。他们的行为使得《时代》周刊坚信:群体的简单和愚蠢也要为此承担部分责任。

尽管如此,1938年10月却并不寻常。10月3日,在英、法两国将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实际割让给希特勒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德军就进入了苏台德地区。21日,日军部队占领了中国的广东。就在“水银剧场”广播的前两天,纳粹开始驱逐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后者被送往波兰,迎接未知的命运。11天以后,发生了“水晶之夜”——当晚,纳粹对犹太人的商店和教堂发动了袭击。奥森·韦尔斯还在电波里津津有味地讲述着外星人来犯的虚假故事,而此时,整个世界却已危在旦夕。一场真正的善恶对决迫在眉睫。当你还在做最坏的打算时,最坏的情况却可能从各处袭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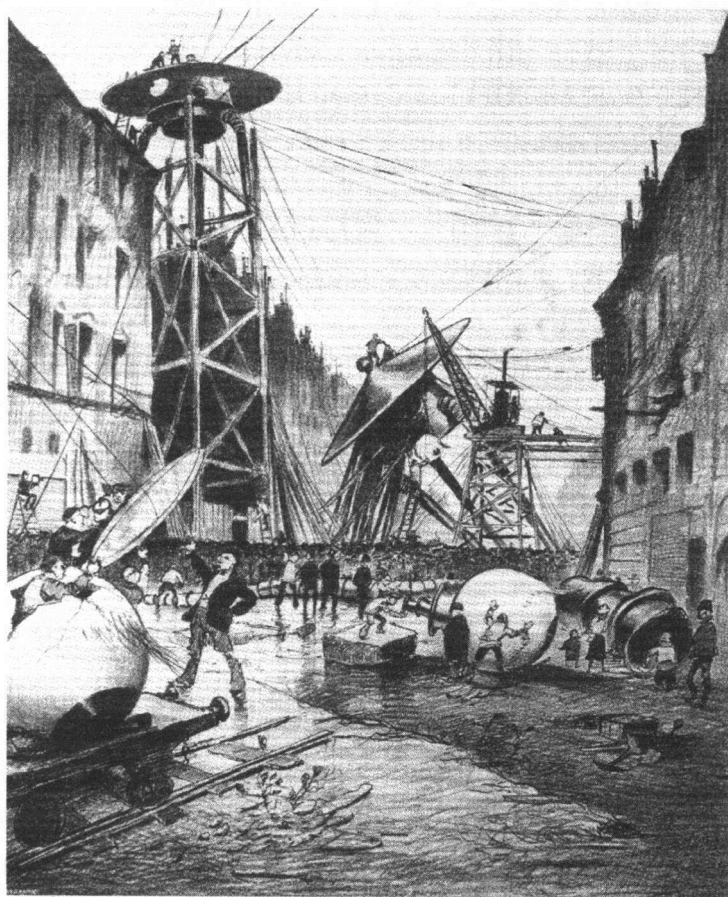
已故演员约翰·豪斯曼(John Houseman)曾和奥森·韦尔斯共同合作过,他和“水银剧场”的其他成员在以下内容中,讲述了《星际战争》广播剧的诞生、播出及其产生的后果。

节目播出的前五天,撰稿人霍华德·科克(Howard Koch)神情沮丧地打来电话。他对H.G. 威尔斯的这篇科幻小说下了三天的苦功,现在准备放弃;他说:对于现在的美国人而言,这段故事再怎么改编也不会变得有趣或是令人信服。这次,科克不再像往常那样危言耸听了。为证实他的担心,我们的秘书——安妮接过电话。这个女孩毕业于史密斯学院,她言辞



尖刻、性情爽直，一头金黄的秀发上带着春花凋零时的芬芳。“你根本办不到！”她抱怨着，“那些老掉牙的外星人简直就是一堆垃圾。真是蠢到家了！我们这是在糊弄自己！十足的蠢货！”

出于某种原因（现在我记不清了），那一周我们惟一能用的备选节目是阴郁的《洛纳·杜恩》……由于找不到韦尔斯，我便把科克叫了回来。当时我对他自暴自弃的做法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这让他很不好受。但最后我还是答应过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上图图为阿尔文·克莱克(Alvin Corredo)于1906年，为H.G. 威尔斯的小小说《星际战争》所做的插图。通过它，伦敦人近距离见识了火星侵略军使用的致命机器和武器。32年后，奥森·韦尔斯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广播剧引起了全美国的恐惧。

第二天凌晨 2:00 左右,当我赶到那里时,事情已经有了转机。科克开始兴致勃勃地写起了新泽西州的残破景象。安妮也不再咬牙切齿了。我们通宵达旦地工作,终于在周三黄昏,完成了剧本。

周四,与往常一样,保尔·斯特怀特(Paul Stewart)在做完节目排演后试录了一次。我们之前在圣·里吉斯——奥森的家呆了一整夜,现在大家坐在地板上(因为椅子上全都是散乱的线圈和未经剪辑的胶卷),心情沉重地听完了录音。大家都觉得:这档节目平淡乏味,而成功的惟一可能则是强调它的新闻广播形式——同时发生且身临其境的效果。

整个晚上,我们一直在往剧本里添加内容翔实的典故和真实可信的细节。周五下午,剧本被拿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接受“电台”的审查。结果,对方要求我们替换掉剧本里的某些称谓。尽管我们满腹委屈,却还是作出了调整:“比尔蒂摩酒店”换成了了虚乌有的“丽园华庭酒店”,“全美酒店”换成了“洲际酒店”,“哥伦比亚广播大楼”换成了“广播大楼”。之后,剧本被送去油印,我们也都睡觉去了。大家都已竭尽所能。说到底,这不过是一档节目而已……

我们在 6:00 左右离开了演播室。几分钟以后,奥森从剧院打来电话,询问事情的进展。当时碰巧有一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调音师留下来收拾设备,他在电话里告诉奥森:这次的节目不是我们的上乘之作。事实上,他认为节目不会取得成功……

10 月 30 日,周日,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晚上 20:00。演播室里,咖啡盒和三明治的包装纸扔了一地。奥森喝下了第二罐菠萝汁,然后戴上耳麦,用细长而洁白的手指调出“水银剧场”的主题曲——柴可夫斯基的《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当晚,他对节奏的把握分毫不差。当故事中忽然传出圆柱形飞行物着陆的消息时(此事发生在这部穷极无聊的节目开场后大约 15 分钟),他在保持基调稳定的同时,突然加快节奏,使得表演变得狂放不羁。所有内容[火星出现、火星首次实施危险行动、卡尔·菲利普斯(Carl Phillips)死去、国民自卫队赶来、瓦苍山战斗、新泽西覆灭]都被压缩在短短的 12 分钟里,从而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听众在感情上的信赖。当时的广播本身具有真实性——听众从情感上能够真切体会到时间与空间的存在……

我记得,当我们演绎最后的主题时,控制室里的电话突然响起,接过电话,话筒中传来了一个刺耳的声音。对方自称是中西部地区某市(还是一



市场、 群氓和暴乱

第三章 恐惧和惊慌

座大城市)的市长。他吵嚷着要找韦尔斯,并且怒气冲冲地说:听了我们的节目,城里的人都涌上街头,妇女和儿童在教堂里挤作一团,还发生了抢劫与暴力事件。现在,他如果发现整件事情不过是一个拙劣的玩笑,也许会单枪匹马地奔到纽约,对准编剧的鼻子就是一拳!奥森迅速挂断电话。现在演播结束,演播室的门被猛地推开。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成了一场噩梦。民众和穿深蓝色制服的警察忽然挤满了大楼。我们奔出演播室,跑下楼,钻进一间后勤办公室。由于不允许与外界接触,我们就坐在那里;同时,电台工作人员正忙着整理、销毁、封存这次广播的所有剧本和录音。以后,媒体惟恐天下不乱地对我们大肆报道。他们的问题五花八门:你们知道的死亡人数有多少?(暗指:他们知道有上千人因此丧命。)你们对泽西某座礼堂里发生的致命骚乱了解多少?(暗示:骚乱事件多如牛毛。)你们知道有多少人死于交通事故吗?(尸体肯定填满了沟渠。)你们知道自杀事件吗?(你们还没有听说河边大道上发生了自杀吧?)尽管记忆已随着时间淡去,但印象中的整件事仍旧十分可怕。

几个小时过去了,警察不仅没有逮捕我们,反而让我们从后门溜走……我们连续两天停留在报刊头版上。慕尼黑危机期间,报界只能将广播作为新闻来源;当时他们一心只想揭发这个新型媒体不负责任的危险行为。于是,奥森成了他们的替罪羊,受到他们的盘问与纠缠。我们的剪报局将那些充满非难的社论统统丢进了垃圾筐里。有一段时间,人们甚至将其同犯罪相提并论。

事情过去了大约两周,激情逐渐退却。那时人们发现:与最初设想的不同,伤亡人数不多而事情也并不严重。一名年轻女子只是在跑下楼梯时,摔断了手臂……

针对我们的起诉(人们以引起损坏、伤害、流产、不幸等各项理由提出索赔,索赔总额超过了75万美元),要么缺乏事实依据,要么得不到合法证明。但是,对于其中的一起诉讼,我们却违背律师的忠告,进行了理赔。这是一件感人至深的事情,一名马萨诸塞州的男子在信中写到:

“我认为离开是最好的选择。于是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3美元25美分,买了一张票。走了60英里,我才意识到这只是一档节目。而现在,当初我省下来准备买鞋子的钱都花完了。劳烦你们托人寄给我一双英式9号的黑鞋吧!”

我们真的把鞋子寄给了他。

大众为冲动所左右,而不受信条的约束。

——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奥森·韦尔斯演播《星际战争》所引起的反响说明: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距离既可以像峡谷一样的宽广,也可以像刀刃一样的狭窄。电影编剧、小说家乃至宣传员,就是要让各自的对象充分地感受到恐惧和惊慌(受到惊吓的反应、或战或逃的感受、剧烈的心跳与脉搏),但又不会真的丢下作品或是砸烂剧场。然而,受众却并不容易驾驭。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著名的公式表明:受众一旦消除怀疑,就可能违背礼数,甚至轻贱人类的生命。以下两篇节选的内容,一虚一实;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恐惧和惊慌相互交织化作惊逃时所产生的后果。

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25岁左右便在好莱坞一炮而红;1926年8月,年仅31岁的他却因腹膜炎在曼哈顿去世。然而,他的银幕形象却依然充斥着浪漫的气息;一位妇女在得知他的死讯后,由于无法面对缺少了银幕爱侣的生活而开枪自杀。人们安排了瓦伦蒂诺的葬礼,以强调他的影坛地位:他的遗体首先在纽约市(这里不仅是全美人口的集中地,而且还是许多权威性新闻媒体的摇篮)接受吊唁,之后又被转运到好莱坞;在那里,人们举行了一个意料之中的豪华葬礼。但人类的本性却介入这次活动的计划与执行之间。以下叙述源自J. P. 卓别林(J. P. Chaplin)的《谣言、恐惧和大众疯狂》。

1926年8月24日,在第66大街附近的百老汇,爆发了纽约市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骚乱。6万~8万人参与了骚乱,其中几百人受伤。医生不得不在骚乱现场设立急救医院,照料那些被脚踩伤或是被窗户碎片割伤的人。暴乱分子多为女性;警方出动了大约200人,加上骑警对暴乱分子进行了数次镇压,这才控制了局势。而鲁道夫·瓦伦蒂诺(他不仅是当代最伟大的影坛英豪,而且可能名垂千古)的遗体则是造成纽约市中心出现大规模骚乱的起因。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向这位安卧在百老汇殡仪馆里的已故明星,致以最后的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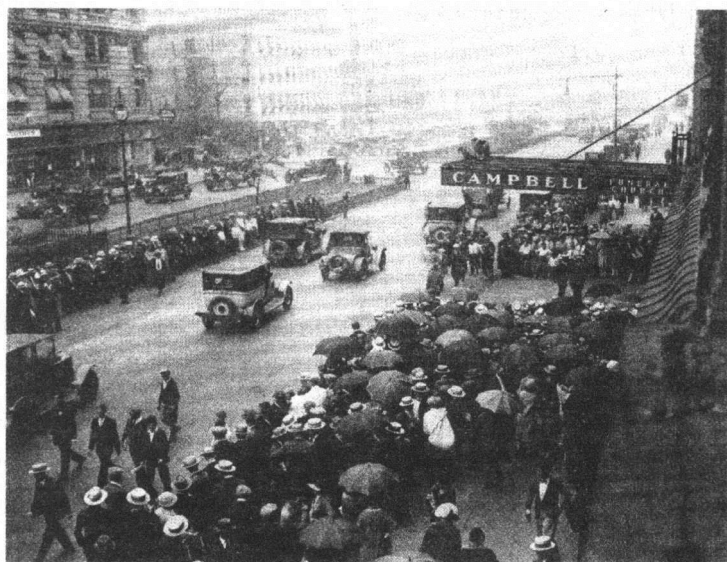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那时，歇斯底里爆发的时机成熟了。那个年代鼓励人们展现行为中各个方面的暴力成分和表现欲望。F. 斯科特·费茨杰罗(F. Scott Fitzgeralds)的圈套为嗜酒贪杯的人设定了基调。人们都在公开展示自己非凡的身体技巧；几乎每位自诩拥有强健肌肉和各项游泳技能的女性都效仿特鲁迪·艾德莉(Trudy Ederle)在英吉利海峡创下女子耐力记录的样子，在身旁有水的地方纵情畅游。而那些天资有限却又爱出风头的女人则上演了一幕幕令人惊骇的壮举，她们认为这才是最佳的选择。在所有大城市里，特技飞机将都市男女们提入高空，让他们在起落架上飘来荡去。其余的人在城市最高建筑的屋顶边缘表演走钢丝。与此同时，那些技巧更为娴熟的同道们开始展露绝技：他们头朝街面，倒悬在8层或10层楼的高处，从约束衣中挣脱出来。人类在表演这些愚蠢至极的壮举时所体现出的聪明才干，似乎永无止境。

然而，无论你有什么多么欣赏马拉松集会、恐怖谋杀或是特技表演，鲁道夫·瓦伦蒂诺才是20世纪中叶这一时刻的真正偶像。他在银幕上的情爱场



1926年8月，31岁的影坛偶像——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暴病身亡。为了看他最后一眼，近万民众(多为妇女)向纽约市的坎贝尔殡仪馆挺进。当时，人群挤破了百老汇两旁的窗户，许多人被飞溅的玻璃扎伤，至少有100名妇女受伤。(©贝特曼/考比斯)

面电晕过无数女影迷。在个人方面,据说这个风流倜傥的拉丁人拥有数百万资产。他既能同芭蕾舞演员翩翩起舞,也能扮成一身戎装的士兵。他曾前后赢得了3位女性(一位财产继承人和两位美艳影星)的青睐并与她们共结连理,但最后都以婚姻失败告终。无论他走到哪儿,总是被如醉如痴的少女们包围着;他的信里全是缠绵悱恻的情话。男人们对他也是一呼百应,许多人都模仿着他的造型:油光可鉴的背头,南美牧民式的鬓角,一条底部宽大的裤子。

19日,城里传遍了瓦伦蒂诺亡故的噩耗。电话立刻像潮水一般涌入医院;甚至出现了4个多小时里平均每小时2000个电话的高峰。两名增派的操作员受命解决电话超载问题。城里的某些地区已经提前开始举行葬礼。商场里的营业小姐低头望着计数器,轻声抽泣,弄得顾客一头雾水。可是,报纸几乎只是对这些毫无依据的事态发展进行了报道。

截至殡仪馆下午四点开门时,已有12000人集中在街头。人们顶着瓢泼大雨,一心盼着瞻仰影星的遗容。

大门开启,送葬者拼命往里挤。各阶层、各肤色、各种族的人们齐集一堂——人群中,有格调高雅的时髦女郎;有裹着头巾,衣衫褴褛的妇女;有一身皮草,衣着华美的主妇;男人和男孩也加入了送葬的队伍。大家缓步经过这位银幕爱侣的遗体,抓紧短短两秒钟的时间看一看他那张憔悴的脸颊。外面,送葬队伍已扩大到6万人左右。大家排成一列;有些地方,4个人并肩而站。队伍跨越了11个街区……人群一度失控,骑警奉命维持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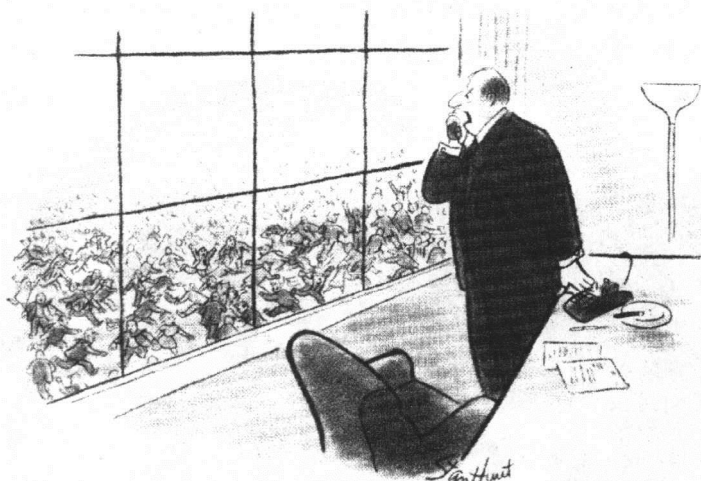
正当瓦伦蒂诺迎来演艺生涯中人数最多的影迷时,歇斯底里却在其他地方以其他形式体现出来。殡仪馆每分钟就能接到2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城里流传着一条谣言:影星的遗体将被安放在一口1.5吨重的坚固的青铜棺材里。但这种荒谬的揣测接着就被S.乔治·尤玛(S. George Ullman)否定了。一些更为恶毒的谣言使得不少人深信:瓦伦蒂诺是被人下毒害死的;而一位助理地方检察官却表示:他对这类不实之词无能为力。此外,人们通过“曾经看护过影星的医疗队因长期守夜而卧病”的事实,发展出另外一段不负责任的传闻。结果,就在当天,从美国其他地区的通讯社传来一则关于“纳格瑞小姐”[著名的无声电影明星——宝拉·纳格瑞(Pola Negri)]身体最新状况的消息。内容称:当她接到自己声名昭著的未婚夫的死讯时,神经完全崩溃。目前,两名内科医师和两名护士正在对其

进行治疗。

截至殡仪馆关闭的当晚,约有 6 万~8 万人参加了遗体告别。

其实,整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极具欺骗性。如果当初遗体接受吊唁的方式恰当而得体,就根本不会吸引如此多的观众。然而,影星的经理却运用近乎残忍的手法谋划了行动。他手下的宣传员向报纸提供了遗体可能停放的殡仪馆的照片,以及送葬队伍的造型图;其中的一张造型图在葬礼举行前就不慎泄露了。报纸媒体也依样画葫芦,进行了夸张的报道(其中包括:各界领导和其他人在棺木旁悲痛欲绝的情节,以及演员死后迟迟不向好莱坞发丧的消息)。这等于是给疯狂火上浇油。

瓦伦蒂诺死后第 12 年,那桑尼尔·韦斯特(Nathanael West)在小说《蝗虫之日》中首次提出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是好莱坞的宣传员引发了民众的疯狂。生在纽约、长在好莱坞的韦斯特对于这两个分别位于美国东、西海岸的舆论中心有着异乎寻常的洞察力。在下面的故事中,一群好莱坞民众守在影院门口,等着首演明星们的到来。而小说的主人公——画家托德·哈克特(Tod Hackett)则湮没在拥挤的人群里。



“见鬼! 布莱克小姐! 是谁闹的乱子?”

接下来,托德意识到:刚刚从脑后飞来的一拳将他击倒在地。现在,倒在一旁的他和霍默(Homer)失散了。剧院前的人群发起了攻势。周围全是搅动的腿脚。他揪着一个男人的衣服,站了起来。这时人群猛地沿着一条长长的弧线向后涌去;于是他又被带向后方。突然,托德发现霍默的脑

袋从人群中探了出来；托德似乎想要大声叫喊却又叫不出声。一只手伸过去，捂住了他张开的嘴巴，并把他推倒在前方。

人群再一次地快速涌动。托德闭上眼睛，努力保持身体的直立。人们用自己的双肩与后背组成了一道海浪，猛烈推挤着托德，并将他从一个方向迅速带往另一个相反的方向。托德不断推打着周围的人，试图面向自己要去的方向。他害怕那种被人带向后方的感觉。

他以桉树作为路标，试图绕过人流，逆向朝路标走去。当他偏离路标时便用力向外推；当人流涌向路标时他又顺流前行。就在他离那棵桉树仅仅几步之遥的时候，一股强大的人流突然袭来，将他带向远处。他绝望地挣扎了一番便放弃了，任凭自己被人流卷走。当托德所在的队伍与另外一群沿相反方向行进的人发生冲撞时，他便成了飞旋的陀螺，四处打转。当两股势力交锋时，他不断地旋转，就像磨盘当中的一粒谷子。他不停地旋转，然后又成了对方势力的成员。压力不断上升，直到他断定自己已经崩溃。此时的他正慢慢地被推入空中。

如果说你从人类身上解读出什么是群众，什么是百姓，那就是：无论他们怎么想，都难以作出理性的判断。

——约翰·德莱顿，《论戏剧诗》



约翰·麦克莱伦(John McClellan),《惊慌》(1937)



易洛魁剧院的大火：“他们已经疯了”

正常情况下,当恐惧和惊慌同时出现时,我们会有两个选择:战斗或是逃跑。在金融市场上,这种选择意味着:当周围的价格纷纷跌落时,你要么坚守立场;要么加入大众的行列,抛售几天前还十分看好的股票。军事统帅同样也会面临关键时刻:是该修建战壕或者下令撤兵,还是该举旗投降。当能源贸易巨头安然公司倒闭时,亚瑟·安德森(Arthur Anderson)的合伙人肯定想过:是要为公司而战,还是退出竞争。两者都是人类的自然反应。

然而,火却能使人类的恐惧越过这个临界点。火能同时刺激我们最多的感觉器官,因此,它最能激起我们的动物本能。火的温度极高,还带着烧灼的气味。我们的眼睛在浓烟里无法看清事物。火还能吸收空气中的氧气并将其转化为更多的燃料和更高的热量,从而改变我们呼吸所需空气中的基本成分。

在户外,动物面对熊熊烈火时的反应大同小异。无论是被森林大火环绕的鹿群,还是被燎原大火包围的鼠群或是人群,大家都会全速逃离火源。在室内面临相同的情况时,所有的本能告诉我们:应当如法炮制。但是这样只会造成更可怕的后果。恐惧与逃跑,以及有限的逃生路线,增加了恐慌;而且我们越是恐慌,我们本能的集体行为就越是缺乏理智。

20世纪,美国最出名的室内火灾应该是1942年11月28日在波士顿发生的“椰林餐厅”夜总会事件。起火时,夜总会里约有800人;事实上,大家都不可避免地向着旋转门的出口迅速涌去。

“火焰飞速蔓延,”1942年12月7日版的《新闻周刊》在描述火灾时这样写道,“烟雾盘旋着穿过走廊,人们被呛得透不过气来。由于惊恐的人群同时从两个方向推动旋转门,门被卡住了。燃烧的帷幔落下来,点着了妇人们的晚礼服和头发。”一些主顾被挤倒在地上活活踩死。而其他人却想从音乐厅往上逃,六英尺宽的楼道被挤得水泄不通。后面的人涌了过来,叠罗汉似地压在了前面人的身上——尸体层层叠叠。”

在受困夜总会的800名主顾里,仅有10人全身而退;还有一半生还

者是熟悉备用出口的夜总会员工。想到有近 500 人在火灾中丧生,就让人不寒而栗。这是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居第二位的剧院火灾。而 39 年前(即 1903 年 12 月 30 日),芝加哥的“易洛魁剧院”则发生过一场最严重的剧院火灾。和“椰林餐厅”夜总会的火灾一样,尽管“易洛魁”的火情迅速得到了控制,却仍旧对生命造成了毁灭性的损失——最终有 600 多人死于非命。

喜剧演员埃迪·佛伊(Eddie Foy)当晚就在“易洛魁”表演。他和阿尔文·F. 哈罗(Alvin F. Halow)在 1928 年合写的自传——《小丑人生》中,对此事进行了如下描述。

当我在幕后东奔西跑的时候,听到观众开始喧哗。肯定有人喊了“着火啦!”(观众中几乎总有一个这样的白痴;几百人在听到这个字眼时也会变得狂躁起来。)人群开始朝各个出口挤去,并已经显现出躁动的迹象。与包厢和楼座里的人不同,由于底楼相对安全,那里的人并未受到严重的惊吓。

我扯起嗓门叫道:“别激动! 没危险! 不用紧张!”并对乐队指挥迪利说:“演奏,先起个前奏——随便什么! 但得演奏!”他手下的一些乐师开溜了。但有少数人,特别是一位矮墩墩的小提琴手,却勇敢地留了下来。

我纹丝不动地站着,希望自己表现出的镇定能让人群同样平静下来。底楼那些人听了我的话似乎宽慰了许多。但是楼上的人,尤其是楼座里的人,已经疯了。

我刚一离开舞台,吊着幕帘的最后几根绳子就给烧穿了。同时,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整个阁楼发生了坍塌,数吨重的燃烧物砸了下来。此时,房间里所有的灯都灭了;又有一只大火球跃入了观众席。火球竟然撞碎了天花板,许多未能逃离楼座的人因此丧命。

观众们的恐惧难以言表。当时的夜总会共有 30 个出口,但是标有指示灯的出口却为数不多。不仅如此,有些出口的门前悬着沉重的门帘;有些门给上了锁,有些门被杠子挡住,无法拉开。

据说:还有些出口的门……不是生锈,就是给冻住了。门终于被撞开了,但人们却错失了宝贵的时间——对门后的许多人而言,这就意味着死亡。由于逃生梯上无法容纳过多的人,许多人摔死在路上;还有许多人干脆跳了下去,一命呜呼。有些人能够生还,只是因为他们在前面那些人的尸体上。

市场、 群氓和暴乱



第三章 恐惧和惊慌

而其实屋内的死者最多;从二楼包厢沿着楼道走下,一路上尸横遍地。许多人因为直接跳过栏杆或是摔出栏杆,死在了门厅地板上;但在这里,踩踏和窒息才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在楼梯的许多地方(尤其是一个形成拥堵的拐角处),尸体摞起来有七八英尺高。消防队员和警察将纠结的令人作呕的尸体逐一分开。他们在尸堆里只找到一名幸存者,许多人在死前都遭受了严重的伤害。死者脸上的鞋跟印无声地验证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人类这种动物在受惊时会像溃散的牛群一样,狂暴而残忍。许多尸

体上的衣服都被扯了下来，有些尸体被踩得骨肉分离。

灾难迅速出现，景象前所未有。从火灾开始，到人群出现死伤、逃跑的短短 8 分钟里，共有 500 多人丧生。

消防局接到警报后迅速赶到，很快就扑灭了观众席中的火苗，只有座椅上的长毛绒垫衬被火烧光。就在这时，一位消防队长把头伸进一扇边门，冲着里面高喊：“这里还有人活着吗？”但却没人作出回应。

盲目而残忍的人群，尽管人头攒动，
却依然意见不和，摇摆不定。

——莎士比亚(Shakespeare)

分化的机制

个体表现出的恐惧和惊慌形式普遍且具有潜在的毁灭力。我们都会在深夜的某一时刻，受到某种知名或不知名事物的惊吓，一身冷汗地从梦中惊醒。惧怕、焦虑、恐慌更为集中地宣泄出人们平时的恐惧，使之得到缓解。然而，群体里的恐惧和惊慌却产生出乘数效应。随着单独个体的恐惧逐步累积，群体的恐惧呈指数形式剧增。惊慌引起更广泛的惶恐。“一切已崩溃，”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在《再度降临》的开篇里写道，“抓不住重心。”这就是恐惧和惊慌在群体中蔓延的结果。下面这篇关于“群体如何在高压下分化”的研究选自伊莱亚斯·卡内提(Elias Canetti)的《群体与权力》。

人们往往发现：剧院里的惊慌就是一种群体分化剂。演出吸引的人越多，剧院的构造越封闭，分化就越是剧烈。

然而，演出本身也可能无法创建出真正的群体。观众的聚集并不一定是受到演出的吸引，而仅仅是因为大家刚好凑在了一起。当初演出未能达到的效果却被一场大火瞬间实现了。火对人类和动物都是危险的；它是集体最强且最古老的象征。火能使观众中任何一丝的群体感受迅速升温。共同而明显的危险衍生出共同的恐惧。观众在短时间里蜕变为真正的乌合之众。假若当时的事发地不在剧院，人们可能会像身处险境的兽群那

样，集体逃跑。而且，人们可能会在同一时间向着同一个方向逃跑，以加快逃跑的脚步。这种强烈的群体恐惧是所有群居动物普遍共有的体验，群体共同的安全取决于群体逃跑时的速度。

然而，剧院里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群体不可避免地以最具暴力的方式进行分化。由于各条出口一次只能通过一两个人，逃跑的能量就转变为将他人拼命往后推的能量。又因为各排座位之间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而座位又各自完全独立，于是大家都坐在或者站在各自的座位上。剧院的标准规格是为了对观众加以限制，最大程度地限制其双腿的活动，使他们只能扯着嗓子干比画。

大火突然下达的逃跑指令和人们动弹不得的事实迅速形成对立。大家都只看见自己独自站在那扇他们必须穿越的大门当中。这样的场景迅速占据了每个人的心灵。于是刚刚还万众一心的群体现在必须剧烈地分化；这种逆转也表现在个体的激烈行为里：每个人都向着四周拳打脚踢。

我们越是激烈地“为自己的生命而战”，就越会同周围的其他人展开殊死搏斗。周围的人就像座椅、栏杆、紧闭的大门一样站着，然而他们却具有生命且满怀敌意。他们推动着个体向着这边或是那边前进，所有的人仿佛都在推动着自己向着正确的方向行进。老弱妇孺统统无法幸免：此时，他们和身强力壮的男人毫无差别。尽管个体不再以“群体成员”自居却仍被群体完全包围。惊慌是群体中的分化剂。由于整个群体都受到了威胁，个体便脱离群体或是想要从群体中挣脱；然而无法摆脱群体的现实使得个体必须得向群体发起攻势。“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如果此时的个体随波逐流就必将自取灭亡。此时的个体当然要力争独立。于是，个体便开始推打挤撞；然而，个体在不断发动攻击的同时，也不断受到攻击与伤害。

心甘情愿沦为野兽的人构成了群氓。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补偿》

西贡的沦陷：“有时间的话，就为我们祈祷吧”

群体分化无处不在：在折扣商店里，“降价”的宣传将原本平静的人群

变为各牟私利的单个买主;在地铁月台上,两地奔波的人群慌乱地冲向开启的车门;在纽约证交所的地板上,买进或是卖出的恐慌打乱了股票买卖的正常秩序,股市乱作一团。其实,群体里的每位成员只要安心等待就会万事大吉;然而如果有人脱离队伍,开始各行其是,那么其他人必定会趋之若鹜。这时麻烦就来了。



越战的最后几个小时:一名男子试图登上一架正要驶离纳特朗的飞机,机舱里已经载满了难民;这时一个美国人照着对方就是一拳。

(©贝特曼/考比斯)

对婴儿潮一代的美国人而言,最揪心的一次群体分化发生在1975年4月。当时,长长的越战终于画上了一个不光彩的句号。随着北越军队向西贡逼近,南越的都城传出可怕的谣言:征服者正准备实施暴行。有关这些事件的流言不断循环往复,增添了本已极度紧张的恐惧情绪,而恐惧又引发了大规模的歇斯底里。记者福克斯·巴特菲尔德(Fox Butterfield)在1975年4月24日的《纽约时报》中刊登了下面这段故事——这是一次对于惊慌和对于重大史实的经典研究。四天后,北越军队攻陷西贡。

南越西贡,4月24日,星期四——现在,西贡人的惊慌昭然若揭,数千名越南人想方设法要逃出国。

剩下的出路不多了;能逃走的人多半认识美国人或是为他们工作。美



国空军 C-141 喷气式运输机搭载着这些幸运的乘客，昼夜不停地从新山一空军基地起飞，赶往密西西比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或是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

其他不那么幸运的人则奔向药店，购买了大量的安眠药和镇静剂。这样，在最糟的情况出现时，他们就可以自行了断了。

另外一些人依旧倾其所有地想要得到一个登机座位。

当时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他曾在美国受训并协助副总理管理经济发展工作)请求他的一位美国朋友迎娶自己怀有三个月身孕的妻子，并把她一同带往美国。“我会付给你10 000美金。”这位越南人说。

南越的出境法律很严格，自从上个月北越军队发动攻击以后，公民惟一合法的出境方式就是和外国人通婚。

一位南越军队的上校伪造了一张出生证明，并且说服了一位在美国国防专员办事处担任秘书的邻居，让她通过母子关系作为掩护，将自己年幼的儿子带上了一架美国飞机。办事处疏散越籍雇员已有一周时间，而今的大使馆仍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这名上校后来委托一位在美国的熟人给姐姐寄了一封信。(他的姐姐嫁给了美国新泽西州罗迪市的一位退伍士兵)“请照顾好我的儿子，”他写道，“泉是我们家的最后一脉香火。有时间的话，就为我们祈祷吧。”

当极端行为被归咎为空虚，普通行为被归咎为习惯，自私行为被归咎为恐惧时，个人几乎就很少犯错了。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罗素·贝克：群体咆哮有限公司

正如我们在本章所看到的，群体的本质并不稳定。他们容易被人牵引着以某种方式冲破我们为其设定的界限。突然的惊恐引发了恐惧。恐惧自给自足，不断壮大，释放出一种集体恐慌。裁判具有争议的判罚惹恼了群体，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就采取了行动——出口被堵死、窗户被敲碎、雨点一般的啤酒瓶砸向了倒霉的裁判。

脱离群体就能使你摆脱困扰,而你会失去群体产生的兴奋感。并非所有的群体都是不好的。群体创造了市场,群体掀起了政治运动。群体给予了我们归属感:无论电视银屏有多大,音响系统有多么尖端,电视转播的棒球赛和45 000名球迷共同观看的比赛有着天壤之别。如果天天都有许多观众到现场观看运动赛事,走向没落的市区地带就能得到挽救:巴尔的摩的内港就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例证。即使群体没有实际集中在某个场所也能令我们激动不已。股票买卖的部分乐趣在于:我们发现自己正在庞大的国际资金中翩翩起舞。

群体本身没有问题,但群体却容易失控。下面这篇名为《谦虚的建议》的文章取自1983年6月19日《纽约时报》的“周日观望”专栏。文中,随笔作家兼幽默大师——罗素·贝克(Russell Baker)针对失控的群体(唉,它们只会使问题再度出现),以半开玩笑的方式,提出了解决之道。

群体已经成为过眼云烟。群体妨碍着交通且难以满足。任何靠近群体的人都会觉得索然无味。群体给治安管理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由于群体制造了大量的垃圾废料,因此也给卫生系统带来了高额的成本。

群体成员也觉得很不自在。他们不断地被人推挤、踢踩。对于民众聚集的各项原因,他们知之甚少或是全然不知。

在电视出现以前,群体必不可少。当时的群体提供了一项机制。只有通过这项机制,公众才能有幸见识到:绞刑、争权夺势的政客、凯旋而归的英雄、娱乐活动、焰火表演,以及像布鲁克林大桥100年诞辰宴会那样的庆祝活动。

打个比方,我们之所以乐于看到电视里转播历史上的游行活动,多数是因为周围涌动的人潮、鼎沸的声响。倘若没有民众喧哗,倘若没有民众伫立街头,倘若没有民众通过嘲讽将运动场搅得天翻地覆,倘若没有愤怒的民众烧毁市长肖像的欢腾场面,那我们的壮举就只算完成了一半。

为了填补这个空白,我们必须拥有虚拟群体。最简单的形式大概要算声音预先经过录制的群体。声音预先经过录制的群体和预录的笑声一样都是虚拟的事物。而所谓“预录的笑声”就是:情景喜剧通过插播人们在很久以前的笑声,让观众注意到剧中的笑料。

声音预先经过录制的群体会通过相同的原理发挥效用,于是重大事件中往往会出现老式电影里人群走向疯狂的场景——1965年的“玫瑰杯”、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二度提名,或者任何可能合适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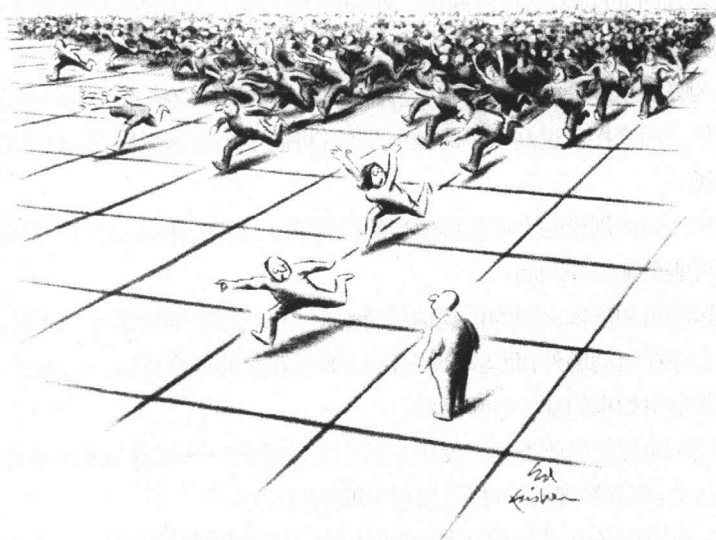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医治群体问题的廉价药方却并不奏效。于是我们会看到专业化群体的崛起。专业化群体由毕业于“群氓学校”的高才生组成,而每位毕业生又都精通某项专业技能。

打个比方来说:由于未经修缮的水洼总是让车轮爆胎,大家便在市政厅前组织了游行。这时,电视传媒若想夸大人们的不满,就必须把电视摄影机和照明器械架在市政厅前。因为人们想到能在电视机前抛头露脸,便可能制造喧嚣与暴乱;而这就会充分表露出他们的不满。

可是这个法子并不总能奏效。即便奏效,群体人数也往往少得可怜,而他们愤怒的咆哮也总带着被逼无奈的腔调。当然有的时候,它又会失去控制,造成民众暴乱。

然而,有了“群氓学校”毕业的高才生,就会弹无虚发。这些人数充足的专家手里攥着“愤怒游行”学位,在预定的时间统一跳下卡车。他们纠缠厮打的场面令人信服;他们非常在行地对着标语喊口号;他们会刚好在晚间播放新闻时,拾起自己抛掷的废物,齐齐散开。

我们可以通过运动场上一个较为普遍的例子来反证:我们需要专业化群体。运动场大约需要60 000名怀有极度偏见的群众来勉励主队、辱骂客场球迷,创造所谓“主场优势”。



“回到第一方阵!”



1985年5月29日,在布鲁塞尔的“希素球场”里,当来自英国的利物浦队和来自意大利都灵的尤文图斯队在争夺“欧洲杯总决赛”的冠军时,足球流氓主义上升到了悲剧性的高潮。正如照片所呈现的那样,球迷们展开了一场混战。形势不断升级,最后一大群利物浦队的支持者冲入尤文图斯的啦啦队中。就在这时,运动场的围墙坍塌了。整起事件中,有3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超景图片库/华盖创意图像)

很明显,神志清醒的人一旦明白自己能在家里更舒服地看到效果更好的比赛,他们就都不愿赶赴现场。然而因为缺少了运动场里喧哗的人群,在家里观看比赛也明显缺少了乐趣。

为吸引主场观众,已经赞助过许多赛事的电视行业将不得不雇用专业化群体。后者接受过高水平的技能训练:将瓶子扔向客场队员,将手纸丢入赛场。

雇用如此规模的专业化群体当然得花钱。这样一来,运动员和群体就会不可避免地争夺利润。

运动员和群体之间的仇视情绪势必升级,并可能导致罢工。届时,运动员会守在运动场外;而运动场内,60 000名雇来的群众则会一边数钱,一边对着空空如也的赛场欢呼喝彩。

我还能想像出此类罢工发生后所引发的愤怒——运动员和专业群众火冒三丈,双方拳脚相向,将酒瓶和手纸砸向对方。

与今天许多电视转播的体坛赛事相比,这在娱乐价值上是一个长足的进步!



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君主论》

哈利·杜鲁门之《耻辱的收获》： 歇斯底里对我们的影响

疲劳会抑制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使我们遭受感冒、病毒的侵袭，甚至罹患更为严重的疾病。同理，恐惧会抑制我们道德的免疫系统；于是原本在健康期间为我们所排斥的思维模式反而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对于经济崩溃的恐慌，对于社会退步的惧怕，对于政府失职的担忧——所有这些都会使我们的行为变得冷漠甚至残忍。这就像大火所引发的恐慌一样，它会让我们忙着找寻最近的出口，而舍弃了平常的礼节。

对煽动家而言，恐惧是最肥沃的土壤。煽动家了解受众的恐慌并添加出一个导航的磁极，方向直指某项事业或者某个恶徒。接着，煽动家把这些汇集的情感收集起来。瞬间，原本模糊不清的恐惧穿越惊惶，成为群体歇斯底里，街头被火把照得透亮。

在这篇 1954 年的致辞中，哈利·S. 杜鲁门(Harry S. Truman)警告人们：如果我们未经验证便开始担心自身的基本安全，就会产生危险；如果恐惧被寡廉鲜耻之人所操控，后果就更加不堪设想。更直白地说，杜鲁门是在警告人们：我们要警惕社会主义，却不能像威斯康星州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掌权的参议院和“反美激进主义分子委员会”那样，对假想的共产党支持者实行政治迫害。杜鲁门总统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地区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此番讲话。而早在 8 年前，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就在同样的地点宣称：“铁幕”已在东欧降下。

当我想起丘吉尔也曾在这里致词时，当我想起这里的传统与法律背景是我们两个民主国家的共同基础时，心中便如履薄冰。我们正是从英国继承了这样的概念：“一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无辜的。”

今天，粗野而阴险的人们正试图颠覆这一概念，他们还试图动摇建立在正当法律程序上的自由根基。进行政治迫害的人再次挣脱束缚，他们往往用豁免权来掩饰自己，用传票和残酷且未经查实的流言蜚语武装自己。



1950年,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吸引了忠实的追随者;约瑟夫对于共产党人实施政治迫害的方针掀起了举国上下的歇斯底里情绪。(美联社/大千世界相片库)

综观历史,由于错误或者夸大的责难引起暴民一时冲动,从而伤及无辜的事例不胜枚举。这几年,群体歇斯底里总是通过不同场合受到大众的一时推崇,从而引起政治迫害。

这种歇斯底里的发展有着统一的模式。

歇斯底里通常植根于:战争环境、严重的经济危机、由战争或是经济危机带来的威胁。不安全感是滋养此类活动的沃土。

在这样的氛围中,煽动家或是其他没有原则的个人能够更轻易地唤起人们情感中非理性的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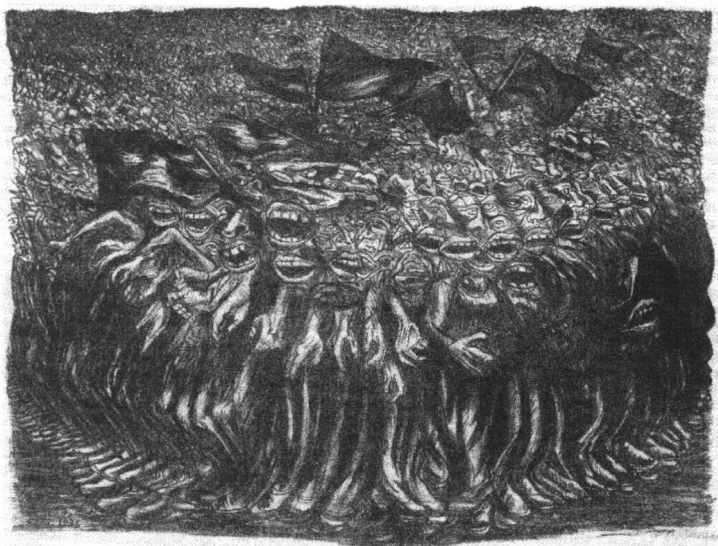
人们对于明显无辜的个体妄加指责;于是,几个世纪奋斗所得的珍贵的民权总有一部分被人们抛于九霄云外。

煽动家主要利用无知和迷信引起暴民的骚动。

种族仇恨、宗教仇恨、阶级仇恨成为火上浇油的原料。自由原则和进步原则最坚贞的捍卫者受到诽谤……

群体歇斯底里公然向天主教发动攻势:马萨诸塞州查尔斯敦地区的乌素莲女修道院发生了纵火与抢劫事件;波士顿出现了暴动;天主教牧师被

人涂上油漆还粘上羽毛;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的一座天主教堂遭到灭顶之灾;在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和切斯比克—俄亥俄运河,发生了针对天主教工人的暴乱。所有这些暴行都只是为以后从政治上更有组织地反对天主教奏响了序曲。



荷西·克莱曼提·欧瑞克(Jose Clemente Orayco),《群氓》(1935年)(美洲国家基金会的纽约现代美术馆,照片© 2002年纽约现代美术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可知论”的精神重获新生。20世纪极度的恐慌和美国“三K党”的死灰复燃使人们对外国人和有组织的劳工产生了恐惧,煽动家操控了这种恐惧,并将它们汇聚在一起。这次煽动家仍是因为政治目的而激发出恐惧。教育机构遭到袭击。天主教和犹太教饱受诋毁与污蔑。结果,“三K党”在许多州组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

和其他那些仇恨运动一样,美国人民最终利用常识消灭了“三K党”。

我们再次见证着那些自称为“自由卫士”的政治怪物的下场。他们板着脸,装出一副极力维持秩序的模样;然而正是他们拿着秩序当儿戏。

他们对于法律秩序的正当程序没有丝毫的尊重。这些承袭了古老政治迫害规程的人根本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们无视美国法律秩序的传统,无视公平游戏的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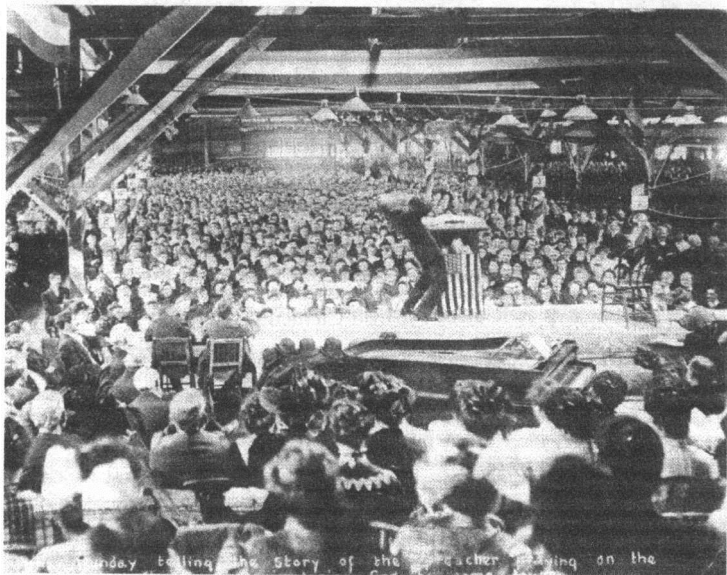
他们其中的一个人甚至横加指责,妄图破坏美国人对政府、军队、学校、教堂、工会和传媒的整体信赖。最糟糕的是,他还扬言要瓦解美国人彼此间必须具有的尊重和信赖。

当一个泱泱大国屈从于歇斯底里的淫威时,国内和国外的自由事业就会遭到破坏。

我们只有身体力行,才能弘扬民主。

我在上帝的祭坛前宣誓:永远与任何强奸民意的暴政进行对抗。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有一种方法能够吸引群体而且百试不爽:确定一个敌人并且毫不手软。布道家比利·桑迪(Billy Sunday)在20世纪20年代的奋兴会上将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对那些受到自由神学吸引、“没有骨气、蹑手蹑脚、虚张声势”的基督徒,展开了猛烈的抨击。

虔诚总是用心灵而不是头脑找寻真理。

——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



当周围的人都丧失理智时，你需保持冷静

恐惧和惊慌中的我们全都无所适从。面对步步逼近的灾难，雄壮的伟丈夫成了软脚虾，体质孱弱的人却英勇无畏。无论男女，无论强大还是谦恭，紧急情况下我们的肾上腺素水平都会急剧上升。然而，如何利用肾上腺素（如何利用它来拯救自己和他人，如何利用它使得事情变得更好或是更坏）却是因人而异。在描写危机的文学作品中，既有为救孙儿举起汽车的老祖母，也有夹起尾巴落荒而逃的流氓。

问题出现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很难为了这一刻而开展训练。安全手册可以给予我们所需要的事实、图解和基本战略，例如，火灾发生时，应当降低身体高度；往身上浇水，等待救援；紧紧压住伤口，阻止血液流动……可是当这一刻真正来临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情感波动，而我们眼前则是手册永远无法复制出的场景——烟是那么浓；水是那么冷，人不可能坚持很久；那么多的血。

问题出现的另一部分原因是：有时，面对危机最佳的反应无法使得公众脱离险境。如果一个封闭空间发生了火灾，对于数量空前的人群而言，上上策是像我们在小学里学到的那样：选择最近的出口，秩序井然地排成一行。然而研究却告诉我们：当剧院或是飞机发生火情时，幸存者往往是那些无视秩序、当即跨过座椅和同伴的脑袋的人。就像老话说的那样：几家欢喜几家愁。

面对惊慌和恐惧的危机，我们需要什么呢？由于变数众多，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好运气，以下三种方式倒可以使你绝处逢生、化险为夷。

- 做一次有违本能的努力，使自己保持冷静。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对某些人是容易的，对另一些人则不然。瑜伽传授的呼吸控制有助于降低血压，从而使其他自然化学镇静剂注入你的体内。（如果你现在马上做 10 次缓慢的深呼吸，就会发现它卓著的功效。）即使你周围的形势四分五裂，审时度势仍能助你一臂之力。还有别的出路吗？是不是因为危机即将过去，所以与其盲从不如静伏？股市反复教导我们：群体得出的普遍答案不一定就是最佳答案。众所周知，1991 年发生了纽约三角女衫公司火灾。罗斯·弗里德曼（Rose Freedman）是事件中的幸存者。当时，

她没有拼命从9楼(那里被她的同事挤得水泄不通)奔下去,而是上了10楼——顶楼的主管办公室。接着她又从10楼逃上屋顶并被营救到附近的一座建筑物上。她的同事中近150人死于那场火灾。弗里德曼享年107岁。

● 保持独立。安全专家称:免受群体践踏的最好方法就是:双手环膝、身体蜷曲。其实这时的你正将自己变成一个小型太空舱——受到挤压时这种太空吊舱不会被压住,而是滚过或是跳走。这种方法在心理学上同样奏效。即使你不得不在形式上向群体迫近,但你越能按照意愿使自己脱离群体,就越能用自己的判断替代群体的判断。

● 培植内心明确的航标。奥德修斯(Odysseus)出过一个好点子。当时他知道自己正要穿过海妖赛壬(Sirens)盘踞的岛屿,因为担心屈从于对方充满诱惑的歌声,他便让手下的船员将自己绑在船桅上,这样他就不会自寻死路了。危机发生时我们被恐惧和惊慌所包围,于是便需要一个强大的内心港湾。它可以在风暴中为我们指明方向并且帮助我们相信自己的决断。如果你跟随别人的脚步,就只能去往别人的目的地。你得了解什么对自己而言是关键,这样你才会具备个性的力量踏上自己的征程。有时,这就是生存所必需的。

我不相信忽略个体的集体智慧。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第四章 暴力行为和私刑处决



引言

我们人类总渴望拥有自己身边最典范的优秀品质: 所罗门的智慧, 特里萨修女的慈爱, 甘地的耐心。本杰明·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在 1730 年左右, 大胆地制定出一项自我提升的课程; 他曾列出自己渴望具备的 13 个优点: 节制 (“不暴饮暴食”), 沉静 (“只说于人于己有利的话; 避免废话连篇”), 守序, 坚决, 如此种种。对于第 13 个也是最后一个优点——人性, 他给出了这样一句简单的诠释: “仿效耶稣和苏格拉底。”富兰克林在自传中表明自己正在力争道德的完美。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各有欠缺, 却又希望个体的本能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导向好的一面。

然而, 群体的本质却能摧毁这些崇高的目标。这是由于: 个人的追求和标准被群体思维所取代; 行为规范由集体而非个人决定; 群体不会因为将来的回报作出牺牲, 推动它们的是最近时期内使之兴奋的一切事物。刺激/反应: 这就是群体, 群体中的每位成员都好像共同生活在巴甫洛夫那条名犬的唾腺里。

当“2001 年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常规赛季即将结束时, 克利夫兰·布朗斯队 (Cleveland Browns) 的球迷因为一个具有争议的判罚, 将啤酒瓶和其他能扔的物品投入赛场; 在这场与杰克逊维尔队的比赛结束前, 裁判花了半小时清理赛场。第二天, 在新奥尔良举行的一场周日晚间表演赛中, 圣徒队与圣路易斯公羊队对垒; 圣徒队的铁杆球迷由于一个针对性的判罚, 在比赛进行到第四节时, 作出了类似反应。一位 61 岁的泥瓦匠在事件中被捕; 对于自己的行为, 他向《新奥尔良平民报》作出了这样的解释:

“我并没有带头闹事, 只是一时激愤罢了。啤酒瓶飞来飞去, 有两三只还落到了我脚边。于是我说: ‘嘿, 为什么不闹他一场呢?’ 接着, 我就被几名警卫拽住了胳膊。”

这就是群体心理本质上最丑恶的一面: 如果唾手可得的的目标自行出现, 而先前的事件又提供了一种表现模式, 兴奋性就有机可乘。“新奥尔良运动场”的裁判、球员和其他人都是幸运的, 因为包括泥瓦匠在内, 所有向

赛场投掷物品的人手里拿的都是啤酒瓶,而不是莫洛托夫鸡尾酒。群氓的泄愤对象往往并没有如此幸运。

“暴乱”(riot)一词来自古法语的“riote”,意指:“一场争吵或争执”;而“riote”本身又能回溯到“ruire”,意指:“咆哮”,因此它和群体、暴乱都有关联。群体可以主动地挑起争吵,也可以被动地卷入争吵;于是,争吵化作咆哮;而咆哮又形成暴力。

在法学界,“暴乱”的定义源自英国的法律,霍金斯(Hawkins)在《王冠的请求》中作出了如下诠释:

“由三人或三人以上的成员制造的一场打破和平的骚乱;他们将各自的权力集中起来,希望相互辅佐,对抗在某项秘密事务的执行中可能表示反对的任何人;尔后,他们不论行为本身是否合法,通过某种令人恐惧的狂暴手段加以贯彻。”

历史终将判定暴乱的真伪。1773年12月18日夜里,波士顿海港342箱茶叶的销毁,被我们归结为“波士顿倾茶事件”而非“波士顿茶叶暴乱”。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整起暴力事件中,大约有200名男子假扮印第安人损毁财物,但惟一遭受暴力伤害的是他们自己的一名同伴:一位租马商。人们发现他时,他正往衣服里塞着茶叶;他的衣服被撕成了布条,身上还涂着泥浆。然而正是由于美国在随后的“独立战争”中击败大不列颠,赢得了胜利,所以当晚倾倒茶叶的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和其他人是以爱国者而非流氓的身份被载入史册。

和“波士顿倾茶事件”一样,暴乱的基础往往是合理的申诉,或者至少是感觉上的不满。1886年芝加哥的“干草市场暴乱”——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幕,源自马孔密克收割机公司的一次罢工。4月30日,一名罢工者在与警方的冲突中丧生。次日——5月1日,为了对这起死亡事件表示抗议,有人向“干草市场”的集会人群里投掷了一枚炸弹,造成7名警察死亡,另有60人受伤;而暴乱却仍在继续。随后,四名集会领导被处决;还有一人在等待处决时,自杀身亡。

20世纪60年代横扫美国城市的种族骚乱源于美国的整部历史;而洛杉矶的“罗德尼·金”暴乱与该市种族关系的历史也同样具有紧密的联系。然而,一旦暴力在群体中蔓延;一旦成员抛却个人标准并接受群体准则,真实或是虚构的原因就会消失。“以血还血。”疲惫的麦克白在总结屠杀时说道。暴乱也一样——它本身还会引起一连串的暴乱,其后果难以

控制。

1968年3月5日,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后不久,有30多人在芝加哥、巴尔的摩、辛辛那提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暴乱中丧生;在华盛顿,暴徒点起的大火蔓延到了国会大厦内部。一名非暴力的信徒在一起集群氓暴力、抢劫、纵火于一体的暴乱中丧生;此外,受害最严重的是那些金试图帮助过的中心城区居民,以及为地方经济谋福的小企业。当出现暴乱时,群氓既没有道德的指引,也没有任何理性。

作为一条普遍规律:群氓的目标越分散,其引发的暴乱程度就越低。群体会示威反对一个不受其认可的政府。然而,它们的暴乱只是针对政府的具体行为:征收茶叶进口税引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

愤怒就像阳光,越是集中就越具毁灭力。将愤怒集中到特定的团体上,它就会燃烧起火。将蕴含这种愤怒的群体掩藏在夜幕下,或是由头巾围成的黑暗区域里,暴力就会进一步地获得乘数效应。在群体中,我们丧失了各自的特征;隐姓埋名的我们与其他人别无二致。黑暗是群氓生存的自然环境,治安维持会成员也在黑暗中展开行动。

第一批已知的被称为治安维持会成员的人,是美国边境小哨为补充甚至替换当时的法律机构而组建的治安维持会的成员。“旧西部”的平原地区时常缺少法纪,于是征募此类民警便无可争议。不止一个西部人赞美过那些挺身而出、从不法分子和腐败的县司法官手中夺回小镇的质朴店主。然而,将法律的钥匙交给群众往往会使得激情取代理智、谣言取代证据、宿怨取代公正。一个人的治安维持会却是另一个人的“三K党”;绞死一名偷牛贼的治安维持会成员和在密西西比私刑处决一名无辜黑人男子的“三K党”之间有着直接而真实的联系。

在本章随后的部分中我们将看到: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小说《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中,对动用私刑的群氓心态进行了一次最令人难忘的描写;花甲之年的吐温还在世纪之交的一部题为《私刑泛滥的美国》的散文中表现了这项主题。

“为什么群体……在得克萨斯、科罗拉多、印第安纳,在良心饱受煎熬、痛苦万分时却袖手旁观;同时,又故作姿态,装出欣赏私刑处决的样子?”吐温写道,“为什么群体没有振臂高呼以示反对?我想,仅仅是因为这样的做法不受欢迎;每个人都害怕遭到邻居的非议——对于种族发展的整个进程而言,这比受伤和死亡更可怕。私刑处决时,人们会搭

乘便车,带领妻小,从几英里外赶来观看。难道他们真是来看这种场面的吗?不——他们来,只是因为害怕待在家里;他们惟恐被人发现,招致非议。”

马克·吐温断言:人们将一种有着相同威力且贯穿整个种群的模仿力加附在自身意愿上,并予以接受。他写道,众人皆知:“社群与个体都是模仿者;老生常谈的私刑话题必然会在附近各处甚至更远的地方,引发其他的私刑事件;只要时机成熟,它们就会萌生出疯狂与时尚。这种时尚就像一场不断扩散的疾病,传播得越来越广;每一年,它都要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州。私刑处决已经经过了科罗拉多、加利福尼亚、印第安纳,现在来到了密西西比!我可以亲眼见到一个黑人在纽约的‘联合广场’上被烧死,而在场的5万民众里,却看不到一位县司法官、州长、警察、上校、牧师或是法纪代表出面干预。”

马克·吐温的愤怒还暗示着私刑处决更为深远、阴暗的一面。当激情占据统治地位时;当法制消失时;当州府通过口头或者书面形式,支持并鼓励暴民统治时;当个体舍弃自身道德标准而接受群体规范时,流言四起,暗示便具有了邪恶的力量。这时,种族灭绝便蓄势待发。

在群氓的标准里,没有需要纠正的不平之事。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洛杉矶,1992年4月29日~5月1日:毁灭之舞

当群体变得非常愤怒、觉得非常委屈时,感觉往往会退到暗处,惩罚取而代之。法庭上,企业时常如坐针毡:愤怒的员工会因恶劣的工作条件或是资金不足的养老金计划,控告企业;愤怒的消费者会因发现劣质产品或是质量监控受到忽视,追讨企业。在“福特探险者”出现一连串的事故之后,福特公司和火石公司立时感受到了群体的愤怒。有时,投资者惩罚股票,不是因为企业业绩拙劣,而是因为它们品行不端。人们越是冲动地在股价上泄愤,购股的机会就越好。

当愤怒的群体为了泄愤而放弃法律救援时;当它发现自己在更高的权威面前势单力薄时,这种惩罚会变得充满暴力。1992年春的洛杉矶事件

就是这样。此前一年的1991年3月3日,司机罗德尼·金(Rodney King)和一名叫做布赖恩特·艾伦(Bryant Allen)的乘客正驾车行驶在洛杉矶的某条街道上;这时,一辆警车示意其停车。但是金却让警方以100英里的时速,追着他跑了将近8英里地。当金的车子最终停下来时,4名警察对他进行了为时2分钟的毒打。伤势检验表明:他有56处棍伤,6处踢伤。就在警察教训金的时候,一名叫乔治·霍利迪(George Holliday)的男子正站在附近的阳台上,于是他录下了这段场景。之后,世界各国的电视台竞相播放这段录像。

14个月之后的1992年4月29日,根据加利福尼亚州西马地区的一个陪审团在西米谷(应被告要求,审判地点被转移到那里)作出的裁定:除一名警员被判使用过度暴力以外,撤销对其余三人的所有指控。于是,骚乱继续。当暴乱在三天后结束时,有50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12000人被捕;洛杉矶蒙受了十多亿美元的财产损失。这场浩劫不亚于26年前在该城瓦茨地区发生的暴乱。

下面一系列源自《洛杉矶时报》工作人员的目击报告就仿若一段带血的芭蕾,解析了暴乱时的场景。它展现出:这场由义愤填膺开始的暴乱是如何撕下理智的伪装,成为肆意的伤害;又是如何在怒火消散时化作了成堆的谣言。该系列登载在大卫·科伯特(David Colbert)以第一人称叙事的精选集——《见证美国》中。

迪安·E. 墨菲(Dean E. Murphy)

4月29日下午15:45,西米谷法院。现场秩序一片混乱。10项无罪裁定使得大批记者从四处涌来,他们搜寻着陪审团、被告、检举人、律师、社区积极分子的踪迹。

陪审团和多名被告人都不想发表谈话。就在斯特西·C. 库恩中士(Sgt. Stacey C. Koon)准备溜之大吉时,他险些被一群记者和摄影师逮个正着。“你有罪! 你有罪!”抗议者们冲着双唇紧闭的库恩喊道。同时,行进的人群将一名摄影师挤到了一辆停着的轿车上。

法庭中,劳伦斯·M. 鲍威尔军官(Officer Laurence M. Powell)(指控称,他对罗德尼·金实施的殴打最多)站在强光映照的二楼简报室里,嘴角挂着笑意。“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他说。

在回答一个问题时,鲍威尔说,他对那些因为判决感到不满的人,没什

么可说的。“我认为无须回应他们，”他说，“他们只能自己回答自己，并作出自己的决定。我认为自己根本无法改变他们的感受。”

寇克·麦考伊(Kirk McCoy)

4月29日下午15:45，市中心的非洲人卫理公会主教派教会第一教堂。非洲人卫理公会主教派教会第一教堂中，人们神色黯淡。但在法官宣读判决时，你仍能从教会成员和众人的脸上，看出惊诧的神情。

“无罪，无罪，无罪。”

然后我看见了赛斯欧·(切普)·默里[Cecil (Chip) Murray]牧师。

他将右拳砸向左掌心，开始哭泣。

“他们什么都没给我们，什么都没有。连一块骨头都没有，上帝呀，连一块骨头都没有啊。”

肖·赫伯尔(Shaw Hubler)

4月29日下午18:40，佛罗伦萨和诺曼底大街。你可以看到：在佛罗伦萨和诺曼底街角的半英里开外，直升机云集。近处，人群正在奔逃；扫描器上显示着警方和电视工作者之间的相互叮嘱：“马上离开那里。”

场面僵持不下。人们在人行道上排成六列；大家高声呐喊，交头接耳，还挥着拳头。有些人攥着啤酒罐和汽水罐；有些人把孩子抱在怀中，拖家带口地加入到斗争的行列里。他们身着短袖、运动衫，就像是排好队、准备参加7月4日美国国庆日的游行。

交通方面，司机开始紧张起来，他们将汽车开入逆向车道，想要赶快逃走。每当轿车来到交叉路口时，年轻的孩子——青少年——就蹿了出来；一旦他们发现车里坐的不是黑人，就拿起手中的混凝土块和砖头，向对方砸去。

从他们因愤怒而扭曲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是那么年轻，太年轻了。他们的手腕似乎很纤细，胸膛似乎很脆弱。石块被砸进一辆辆的车里；你还能听到叫骂声：“噎，狗×的！噢，噎！”

寇克·麦考伊(Kirk McCoy)

4月29日晚间21时，曼彻斯特和史劳森大街。我和同事迈克·梅多斯(Mike Meadows)驱车来到位于曼彻斯特和史劳森大街的一家酒店，在街头

交叉巡查,搜索着劫匪的踪迹。有四个人带齐了工具,开始纵火。当时我站在酒店对面的人行道上,听到有人在我身后嚷道:“他×的,不要拍照。”

于是我转过身,发现一名男子在离我 15 英尺远的地方站着。他手里拎着一只酒瓶,正用枪指着我。枪响了。我转过身,沿着街道直奔正在发动的车子,幸好梅多斯还在那里等我。

在我逃跑时,那家伙冲我开了五六枪。

如果他当时神志清醒,我就在劫难逃了。

大卫·法莱尔(David Ferrell)

4 月 30 日上午 11:45,曼彻斯特和佛蒙特大街。我们在步行时遇到一位光着膀子的黑人男子。他领着自己 7 岁的儿子看着地上洒落的石块儿。该男子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但他说:自己从小就听说过有关瓦茨事件的各种传闻。现在,他想让自己的孩子也感受一下法律沦丧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愚蠢,”他哀伤地说,“这就是愚蠢。”

乔希·迈耶(Josh Meyer)

4 月 30 日下午 16 时,镇中心购物中心。周边的火势失去了控制,几辆警车和几辆配有铁钩、云梯的消防车,一路摇摆着疾驰而来。这时,一名妇女冲到大楼的前门;她的眼中透着狂野,脸上挂着笑意。那样子活像已故的模特——塞维利亚(Seville)。没等摇上车窗,她就撇下高声啼哭的婴儿,跳出了自己的轿车。然后,这位穿着打扮体面而职业的女士冲入商店,趁火打劫。

李·哈里斯(Lee Harris)

4 月 30 日晚间 23 时,史劳森大街附近的克伦肖林荫大道。骚乱中,有件事情却在有序进行着。先是有人将克伦肖镇中心一台 Versateller 自动柜员机的前端砸开。接着,男人、女人和小孩排成一列,抢起钱来。前一个人抓走一把钱后就让路给下一个人。

此前,辛普勒斯(Simples)和他的雇员已经佩带着来复枪和半自动步枪成功守卫了两个晚上;可是当国民警卫队到来时,他们就离开了。辛普勒斯对此后警卫队的渎职感到万分悲痛,这与他在得知洛杉矶黑人生活后的感受一样。“警卫队不过是让我们对某件事寄予希望,”他说,“它总是先

让我们对某件事寄予希望,而后再让我们彻底失望。”

迈克尔·莫里奥(Michael Moreau)

5月1日夜,西米谷。我从家里出发,经过荒弃的高速公路,前往西米谷。我开着租来的车,驶离118号公路,上了第一大街,来到一间车库;我的轿车正在那里检修。

当我等着付账时,走来一位金发碧眼的女人。她的皮肤尽管晒过太阳,却仍显白皙。她声称:“他们说今晚会有整车整车的人来到镇里。”“什么人?”车库老板问道。“有色人种,”她回答,“他们说要来这里大闹一场。”

我不知道她的消息从哪儿来的,可能和我的邻居一样吧;就在此前一晚,有人告诉他目标商店正遭人洗劫。但碰巧,邻居之前刚刚去过目标商店,那里压根儿就没事。

群氓就是一只怪兽;拥有足够的脑袋,却没有足够的智慧。

——本杰明·富兰克林,《穷理查德历书》



在美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暴乱中,洛杉矶的劫匪从一家伟伦鞋店里偷走鞋子后逃之夭夭。1992年春,四名白人警员被控在录像带中殴打一名叫罗德尼·金的黑人汽车司机;而之后的审判却几乎推翻了所有指控,于是暴乱一触即发。(美联社/大千世界相片库)

是乌合之众，还是抵抗者

就像解析 1992 年的洛杉矶暴乱那样，电视银屏似乎能够轻易解析出群氓的伪装。群氓中的一些人的确蒙冤受屈；但更多人却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利用抢劫、纵火、滥用暴力所形成的混乱，满足个人的需求和欲望。而在暴民内部，情况就更为复杂。

以下表述选自朱尔斯·阿彻(Jules Archer)在《骚乱》中题为“是什么将个人变为群氓”的章节。[其中，所谓的“科纳委员会”就是“国家内乱咨询委员会”。它因前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科纳(Otto Kerner)而得名；它的组建是为了对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大规模国内骚乱进行研究。]

美国人普遍认为：那些制造骚乱的民众仅仅占据美国种族、宗教、政治或经济团体中很小的部分。游手好闲者、少年犯、游民、惹是生非者、罪犯，会被轻易归入乌合之众的范畴。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将 20 世纪 60 年代的少数民族暴乱，归咎于少数“自私自利且利欲熏心的人”。

“乌合之众”理论受人推崇是因为它再次向美国公众保证：我们的社会没有严重的问题，暴乱反映的只是极少数人的不满。此外，该理论认为：如果目前暴乱牵涉的只是乌合之众，那么，只需竭力封锁其言论并阻隔外部的煽动分子，就能防止未来的骚乱。这样就没必要去面对一切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是骚乱的根源，纠正它们需要多数人进行痛苦的变革和重新的调整。

然而，“国家内乱咨询委员会”却发现，“没有证据显示，全部骚乱或者任何一起骚乱……是由某个国际组织、国内组织或是地方团体谋划、指导的。”该机构还发现：典型的暴乱者并不是罪犯、失业者或者“下层阶级”的移民。

群氓好似冰山的一角，它往往反映出人们无法看见的更大的群体阻力。“洛杉矶骚乱事件管理委员会”在 1996 年的报告中称：尽管大多数居住在洛杉矶的黑人没有直接参与瓦茨暴乱，但许多人却对暴乱者表示了支持。



1970年5月4日：国民警卫队向美国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的反战游行队伍发射了催泪弹，示威者四散而去。之后，由于学生向警卫队投掷石块，引起警员向人群开枪，造成学生4死9伤。（©路透社新媒体有限公司/考比斯）

群体中的兽性

如果刺激因素足够强烈，群氓的行为有时候就会看似正当，至少在早期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暴乱除却一切理由的伪饰，便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了。没有了借口的掩饰，参与者的兽行以及群众心理那摧毁一切道德感的能力，在空洞的信条下表露无余。

无路可退或是自认为是无路可退的投资人就像是足球迷，一直在胡闹。很多时候一触即发；瞬间之后，我们面对的就只是一个蒙受了损失的产业部门或是满地狼藉的运动场的一角。一旦群体中的兽性爆发出来，还会导致更糟的后果；1989年，纽约中央公园发生了一件臭名昭著的事件——一名妇女在慢跑时遭到袭击；这件事就是群体兽性爆发的体现，它非常准确地折射出了一种都市现象——“越轨”。

以下叙述源自1989年5月8日的《新闻周刊》杂志；记者大卫·格尔

曼(David Gelman)与彼得·麦奇洛普(Peter McKillop)完成了这篇报道。对于“狂徒们”行为的成因,专家们众说纷纭;然而我们非但没能掌握到多少作案动机,反而收集到一堆无稽之谈。遭到该团伙攻击、凌辱,险些丧命的妇女的伤势最终得到了恢复,她还参加并完成了“纽约市马拉松赛跑”。

两周以前,在四月一个温暖的夜晚,一位年轻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正在独自慢跑。突然间,一群年轻黑人和拉美青年对她展开了追逐。接下来在中央公园发生的一切,让人不寒而栗。他们利用拳头和石块攻击这名身材姣好的女子,她的头部被戳伤五次,之后又遭到轮奸并且被迫口交。几小时后,当她被人发现时,颅骨已有多处骨折,身体大量失血。直到上周,她仍处于昏迷状态,并伴有严重的脑部损伤迹象。

在最初的陈述中,七位被控参与此次攻击的年轻人很难被编入反社会者的案例选辑中。通过朋友、老师、亲戚的多方证实,他们个个勤奋刻苦、按时礼拜、性格腼腆。从个人角度出发,他们身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特质。但当他们站到一起时,却被控犯下如此淫邪的罪行。正如曼哈顿区律师事务所的一位调查员所评价的:“即使纽约”也对此事的残暴性始料未及。

其实,在纽约人对这次攻击的残暴感到震惊的同时,黑白人种之间紧张情绪的又一次爆发,也令其始料未及。近年来,这种紧张情绪正使得这座城市走向瓦解。无论是不是白种人,许多人都赶忙说:这次事件更多的是与阶级,而非种族有关——满怀仇恨的平民区居民针对享有特权的“雅皮士”发起了攻击。从这个角度看,他们起码得到了一位黑人精神病学家——耶鲁儿童研究中心的詹姆士·柯墨(James Comer)的支持。他认为:这段插曲似乎“既反映了贫富阶层问题,也反映了种族问题”。而柯墨和其他人发现:似乎还有其他力量在起作用——一部分是青年人的放纵,一部分是“从众”心理——它们与种族或阶级的关系不大。

警方称:起初大约有 35 名青年(有的年仅 13 岁)在公园里开展“越轨”活动——各类流氓暴动集会。近期,流氓暴动集会已经对纽约的一些公共场所造成了破坏。该团伙分别对一名正在慢跑的男子和一名无家可归的男子发动了两次毫无目的的袭击;而后,团伙人数逐步减少,剩下 8~13 名的中坚力量。最终,有 7 人被认为对这名慢跑中的妇女实施了强奸。这类

探险队是自发而成的。这些在住宅附近逗留的青年往往漫无目的，他们只想找一点刺激。“他们当时可能说‘我们去玩儿越轨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厄尔·沃伦法律学院的主任富兰克林·基姆林(Franklin Zimring)说，“但是没有人说‘我们去强奸吧’。”基姆林曾于1984年对纽约的青少年杀人案作过研究；他认为这个团伙可能已经被他所谓的“冒险情绪——你这样做，因为你已难以自拔”控制了。

行为学专家认为：通常，在群体的活动中，至少有一个领导。他能够利用其他成员希望证明自身价值的心理需求，操控他人。而轮奸行为的唆使者拥有双重驾驭感，他不仅要驾驭受害人，而且要驾驭同伙。他要让同伙觉得必须和他一样厚颜无耻。必须承认，群体蕴含着一种微妙的力量：它能够使行为产生效力，并因此鼓励这种行为。它对青少年的影响尤为显著，因为青少年特别容易屈从于同伴压力。然而，关键在于：由于群体能让成员隐姓埋名，因此他们相对无需承担太多的罪责。“这基本上是一种个体个性的丧失，”罗伯特·庞扎雷拉(Robert Panzarella)(他是纽约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治安科学专业的一位教授)说，“群体成员会去做自己在个体状态下从未想要完成的事情。”这也是一种分工，但却产生了可怕的结果——“尽管个体的行为似乎微不足道，但群体的行为却可能导致可怕的结果”。

从中央公园强暴案中，我们能发现明显的犯罪过程。与之后被告的陈述相同，是团体中一名15岁的成员率先朝那名女子比划了一下，并说“去搞定她”。于是，另一名14岁的成员先帮助他将受害人打翻在地，再是一顿拳脚。接着，其余成员各自拿起石头、砖头、铁管，对她进行了攻击；他们绑住受害人的手脚，扯去她的衬衣和运动长裤，实施了强奸和口交。“没有人真正理解这群孩子，也没有人明白他们当时的想法。”耶鲁的柯墨告诫道。但通过他们自己的描述，当时出现了经常在群奸时见到的加速疯狂。攻击者们竭力相互超越，从而形成了一种动力。在此案中，这种动力将他们推过法律的边界，犯下了可怕的罪行。

尽管报纸上说，这些年轻人在被传讯时似乎毫无“痛悔”之意，但是一些观察家却怀疑报纸并未发现那是集体行为产生的恶果。另一方面，多萝西·刘易斯(Dorothy Lewis)[她是一位犯罪精神病学家，因对连环杀手特德·班地(Ted Bundy)开展的工作而声名大噪]警告说，那些在最初强调此

类团队外表健康的报刊报道,应当受到质疑。刘易斯相信,进一步的调查将会表明:这些实施强暴的青少年也遭受过某种伤害。她说:在类似的案例中,此类行为的实施者要么自己就曾经受到过虐待,要么曾经目睹过家庭暴力的可怕场面。这些早先的经验使得青年人“无法遏制自身的冲动”;本质上,她认为:那个晚上在中央公园就是这种情况。“在我看来,”刘易斯说,“起初只是一帮流氓在四处游荡,最后他们却制造了一起十恶不赦的变态案件。”

诺亚方舟上的野兽再多,也无法和群体中兽性的种类相提并论。

——本·琼森(Ben Jonson), *Explorata*

私自执法:想不可想之事

和暴乱一样,在参与者心中,私刑执法似乎仰赖于这样的逻辑:法律不足以完成任务;缺乏保护的女子在街上不安全;如果一个黑人、犹太人或是其他一些人实施了谋杀,就应该给所有的黑人、犹太人……一个教训。和越轨一样,私刑执法揭掉了一切文明的伪饰,也抹杀了所有人类进步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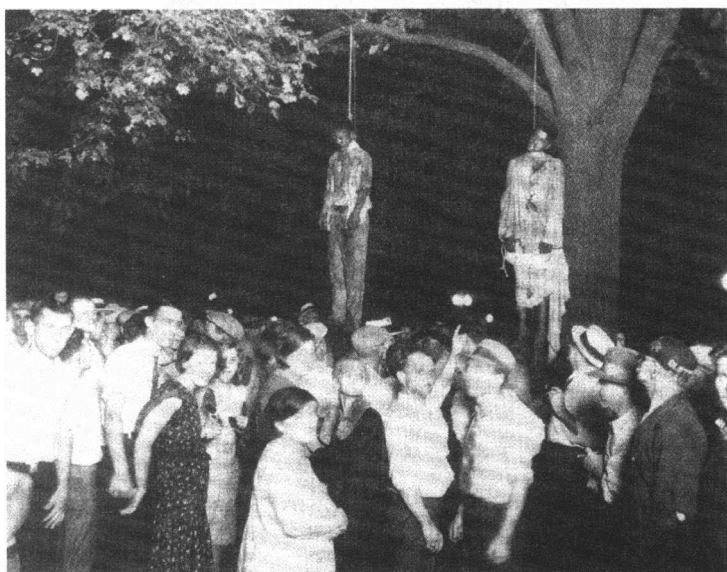
下面配有照片和政治卡通的内容,试图展现出暴民可怕复杂性中的所谓“公正”行为。它从一个年幼时曾经目睹一场私刑处决的人的角度,从诗作歌曲的角度,从动机分析的角度,从马克·吐温的角度,对群体心理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研究。第一部分是1985年查尔斯·哈代三世(Charles Hardy III)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节目中所作的一段采访。一位黑人男子回忆了83年前,当自己5岁时,在佛罗里达州的家乡杰克逊维尔目睹的一次私刑处决。

“他们就在那边的桩子上烧死了一个黑人”

他们有一个大大的十字架。“三K党”就在那边的桩子上烧死了一个黑人。噢,真是可怕。五里外你就能闻到肉体灼烧时散发的味道,真是可怕。你知道吗,那些“三K党”等到大火燃尽、尸体被烧焦以后,

在周围走来走去，从尸体上割下了一些东西——手指和脚趾，他们把这些给了那些白人妇女。她们得把这些带回家，那些妇女和她们的孩子，必须把这些带回家，然后把它们放入玻璃罐里或是摆放在壁炉架上。 “三 K 党”党徒嘴里还叫着：“那些还要吗？对，这就是我们对待老黑们的方式。看到这个老黑的脚趾了吗？还有这里、这里、这里，见到了吗？”

知道吗，那些事让我明白：如果他们想要对我下手，只要可能，我就会杀死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会惩罚我，伤害我。可我也知道，如果我动手去杀他们，就会像那样被他们杀害，我就完了。



1930 年 8 月 7 日，一群来自印第安纳州马里恩的暴徒袭击了国立监狱并劫持了 3 名黑人青年；后者被控谋杀了一名年轻的白人男子，并且奸污了对方的女友。其中两名遭到劫持的青年——托马斯·席普(Thomas Shipp)和艾布拉姆·史密斯(Abram Smith)被处以绞刑；暴徒将他们的尸体吊起来示众了 4 天，杀鸡儆猴般地向其他美国黑人发出警告。之前，这 3 名青年在马里恩无一人被判谋杀罪。(© 贝特曼/考比斯)

比莉·哈乐蒂的“悬垂在白杨树林里的奇异果实”

私刑处决本身，是对人类残暴的一种最深刻、最可怕的表达；长久以来，它一直是作家和诗人关注的焦点。

这首蓝调歌词的创作者是纽约市立学校的一名教师——阿巴·米若珀尔(Abel Meeropol)，当时他使用了刘易斯·艾伦(Lewis Allen)的笔名。1939年，比莉·哈乐蒂(Billie Holiday)以《奇异的果实》为名，对其进行了首度演绎。

南方的树林孕育出一颗奇异的果实
树叶上血迹斑驳，树根上血痕累累
黑人男孩的尸体在南方微风中飘摆
奇异的果实悬垂在白杨树林的枝头

在南国壮丽优美的田园风景中
我却看到男孩痛苦扭曲的表情
在木兰香甜清新的花朵芬芳中
我却突然闻到血肉灼烧的味道

这一颗被乌鸦攀摘的果实
被暴雨洗礼，被狂风舔噬
阳光下腐烂，从枝头坠落
这一颗奇异而苦涩的果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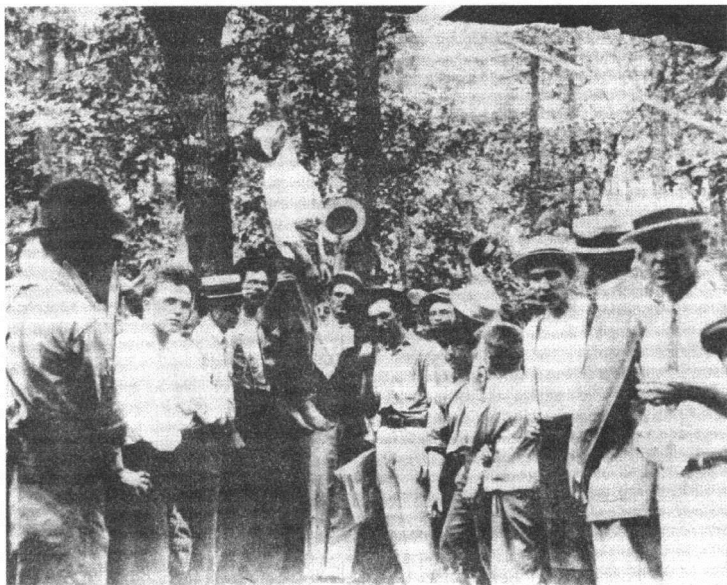
我认为群氓心中邪念丛生。他们患有历史性大众暴乱的心理时疫。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尽在预料之中的”结果

替罪羊以各种形式出现。单个公司会沦为替罪羊，用自己的销售额或

股价清偿一个产业部门的罪过。因特网泡沫市场崩溃之初，投资者一直以为分析家应当对决策负责；但归根结底，是投资者自己受到贪婪的驱使，在极不理智的状况下，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政客和首席执行官也沦为替罪羊，他们被迫对远远超出自己势力范围之外的经济条件和地缘政治条件进行忏悔。少数民族派和少数种族派也同样沦为替罪羊。当群体对一个局外人，一个“其他人”进行责难时，即便责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群体也不会因为自身在个体上与集体上的不足产生多少罪恶感。



1915年8月17日，利奥·弗兰克(Leo Frank)被绞死在佐治亚州“福瑞磨坊”的一棵树上。这位接受了康乃尔教育的弗兰克被指控谋杀了自己的一名雇员；死前，一个治安维持会团体曾将他从佐治亚州立监狱中劫持出去。

利奥·弗兰克(Leo Frank)是一名居住在纽约的犹太人，他曾移居到亚特兰大去经营一家铅笔厂。1913年，他因谋杀自己的一名雇员——14岁的玛丽·范根(Mary Phagan)，被判有罪。起初弗兰克被判绞刑，但由于一位门房(他也曾被怀疑涉嫌此案)提供了大量不可靠的证词，佐治亚州州长将判决改为终身监禁。由于罪行本身的性质和颇具争议的减刑，此案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佐治亚州，在美国参议员兼出版商汤姆·沃森(Tom Watson)的蛊惑下，民怨沸腾。

两年后,在1915年8月的一天,25名自称是“玛丽·范根的骑士”的武装人员在米勒奇维尔割断了通往佐治亚州立监狱(弗兰克被囚于此)的电话线,闯入监牢,带着弗兰克遁入茫茫夜色。第二天的某个时候,在玛丽·范根儿时的家园附近,这个袭击团伙用绞索套住利奥·弗兰克的脖子,将其绞死。在下面的摘录中,针对这起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私刑处决非黑人的事件,佛罗里达大学的历史学家——W. 费兹修·布伦戴奇(W. Fitzhugh Brundage)发现了掩藏在表象背后的根本原因。



“三K党”组建于美国内战结束后不久的1867年。57年以后的1924年,“三K党”党徒聚集在弗吉尼亚的波多马克河畔,庆祝这个仇恨团体的诞辰。从白宫望去,燃烧的十字架清晰可见。

1915年8月17日对利奥·弗兰克的私刑处决缺乏共性。弗兰克的种族、恶名和阶级都使他有别于许多美国私刑处决鼎盛时期(1880~1940年)的暴民牺牲品。这一时期,有大约4 000名黑人死于南方暴民之手;相比之下,死于南方暴民之手的白人可能还不足350人。然而,尽管对弗兰克的私刑处决可能有别于私刑处决的常规模式,但它却在诸多方面展现出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将私刑处决现象延续至20世纪,并断言了利奥·弗兰克看似极不可能的遇害。

在19世纪晚期,私刑执法者,特别是西部边陲的私刑执法者,已经通过征收固定税费的方式,对有违礼法的白人网开一面。少数民族——墨西

哥人和意大利人——有时则沦为南部治安维持会成员与西部治安维持会成员的猎物。而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私刑处决已经根本性地成为了一种南部种族现象。那时,针对白人的私刑处决难得一见——超过 95% 的暴民牺牲品是美国黑人。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弗兰克遭到的集体处决呢?

弗兰克和许多在南部接受私刑处决的白人牺牲品一样,明显是一个局外人。针对白人的群体暴力,充分利用了仇外、偏执,以及南部白人出于本能想要将群体的正式成员和擅闯者区分开来的强烈愿望。由于弗兰克是一名北方出生的犹太人和工厂主,他自然遭受双重凌辱。作为一名犹太人,他成为野蛮的反犹太活动攻击的目标(这表现出南部白人对于移民和“非新教徒”的怀疑)。而作为一名北方的工厂主,他被简单描绘成一个剥削穷弱南部白人(特别是受害者玛丽·范根这样的年轻女工)的资本家。

除了身为局外人,除了因信仰而遭受迫害,弗兰克还触犯了最可能引起南部白人举行公审的罪行。尽管黑人只要稍有越轨就会触怒白人;而由白人实施的谋杀和袭击却被其他南部白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凶残的罪行或者狼藉的名声往往都不足以使民众针对肇事白人施展超越法律的暴力。然而,两者相互结合就会激起民愤。弗兰克涉嫌的公然侮辱事件——奸杀一名守身如玉的白人女孩——同样也激怒了多数动用私刑的南部白人。也因此,弗兰克涉嫌的罪行和他的民族都被贴上了极不诚实的标签。于是许多南部白人认为:弗兰克理应接受他们原本为美国黑人预设的命运。

阶级间的紧张气氛构成了弗兰克死亡的最后催化剂。国民想要维护弗兰克的斗争,激怒了许多佐治亚人;弗兰克的减刑似乎证实了汤姆·沃森的警告——欺骗将使弗兰克逃脱审判,并使一名普通南部女工(或者,借用沃森那段可爱的措辞:“人民的女儿”)的名节受辱。早在弗兰克被私刑处决以前,南部的首席律师们就认为:暴民诉诸公审源于他们对公理的担忧;他们担心饱受贿赂的律师利用正当的法律程序,阻碍对于罪犯(尤其是家道殷实的罪犯)的惩罚。人们的不满集中在复杂的法律流程和审判流程上。政府的赦免权和法律的公正性,均令人怀疑。弗兰克的案例告诉我们:有时,社群会硬生生地用自己的惩罚手段替代国家某项程度不足的处罚。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报道(对于弗兰克的裁决、维护弗兰克的战斗、斯莱顿州长的减刑决定)将人们持续的担忧推向高潮。人们长久以来便一直认为:在外界的影响下,律师会不择手段,公理会姗姗来迟,政客会腐化堕落。

尽管这些私刑处决的理由流于俗套,它们却令民众暴乱变得非常体

面;它们免除了许多南部白人的罪责,并且将处死弗兰克视作平息民愤的惟一方法。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无论暴民处决弗兰克的手段有多么可怕,都尽在预料之中。

马克·吐温:天底下最最可怜的是一群暴徒

安然的破产以及公司高层管理者之后在“国会山”的游行,富有教益地告诉我们:应当如何通过现代手段去应对一个被喻为私罚暴民的国会小组委员会——先是瞅准场合,制造谎言与困惑,恰如其分地流露出悔恨;当其他手段都失效时,便寻求《第五修正案》的援助。可是早在 125 年前,马克·吐温就为挫败趾高气扬、怒火中烧的群体,提出过一种更好的方法。

在美国文学中,这段源自马克·吐温《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的节选^①最好地展现了私罚暴民的心态。在不足两页的文字中,吐温笔下的暴民先是群情激昂,最后四散而去。人群无可厚非的愤怒,使得局面更为复杂。作为泄愤对象的歇朋上校,刚刚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了一个醉酒的本地人;事发时,对方在尘土飞扬的阿肯色河岸小镇街头,咒骂着歇朋上校。然而这回,私罚暴民却遇到了歇朋这位平生难逢的对手。

他们涌上街头,向歇朋的住所进发;一路上他们又喊又叫,怒火中烧的模样,活脱脱一副印第安人的架势。任何事物都得让到一旁,不然就会给踩得粉碎;那场面看着就让人害怕。孩子们在这群人的前面边跑边叫,试图避开压近的人群。沿路的每扇窗户里都挤满了女人们的脑袋,每棵树上都扒着黑人男孩,黑人男女们透过围栏观瞧着他们的举动。一旦人群压近,他们就四散逃离。许多妇女和姑娘都吓得要死,一个劲地哭。

他们簇拥着来到歇朋的栅栏前,里三层外三层地挤在一起,吵吵闹闹的样子,就连自言自语的声音也听不到了。那是间 20 英尺见方的小院。有人高喊:“拆掉栅栏!拆掉栅栏!”霎时间,撕扯声和破碎声不绝于耳;终于,栅栏倒了,前排的人开始潮涌般地冲进来。

就在这时,歇朋走了出来;他一言不发地站在小门廊的顶上,手里拎着一把双管大枪,气定神闲,早有所料。人群里的喧闹声戛然而止,人潮向后缩去。

^① 节选译文引自许汝祉译:《赫克尔贝里·芬历险记》,译林出版社 1995 年版。

市场、 群氓和暴乱

第四章 暴力行为和私刑处决



1959年4月25日,当被控强奸一名白人妇女的查尔斯·帕克(Charles Parker)在密西西比的一所监狱等候审判时,遭到劫持。9天以后,人们在河里发现了帕克的尸体。他身中两枪。史崔特在《华盛顿邮报》上勾画出帕克被劫持时的情形。[1959年,美国密西西比州波普勒维尔——选自《史崔特·赫布洛克》(Straight Herblock)(西蒙与舒斯特出版集团,1964年)]

歇朋默不作声,只是直直地站在那儿,向下瞧着。这静默的场面让人心里发怵,又说不出地难受。歇朋用眼睛在人群中扫视着,目光所及之处的人都想把他瞪回去,但他们不敢;他们只是垂着眼皮,一副鬼头鬼脑的模样。不一会儿,歇朋微微一笑;那笑声并不悦耳,让你觉得像是嚼着一块掺了沙子的面包。

然后,他慢慢开了腔,满是鄙夷的口吻:

“你们真是要用私刑把每个人都处决了呀?这简直是可笑至极。你们还真以为自己有足够的勇气用私刑处置一条好汉呀?你们真是勇敢,勇敢

到在那些孤苦无依，饱尝驱离的女人身上涂满柏油，再粘上鸟毛。所以，你们也以为自己有足够的胆量，向着一条好汉下手吗？只要是白天，只要你们不在背后，一条好汉就能在你们这号人的手里，安枕无忧。”

“我还不了解你们？我太清楚你们这号人了。我生在南方，长在南方，也在北方呆过。所以，我知道常人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常人嘛，无非是些懦夫罢了。在北方，只要愿意，任何人都能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他们只能回家祈福，想用谦卑恭顺来忍受一切。在南方，这伙人总是孤军作战，他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拦劫一整车的人。你们的报纸一直标榜你们勇敢啦，无畏啦，于是你们就真以为自己比其他人人都勇敢。可其实，都是一路货色，你们也不比别人强多少。你们的陪审团为什么没有绞死杀人犯？无非是害怕哪个犯人的朋友会在黑暗中朝他们的背后开枪。而他们也的确会这么干。”

“所以他们总是宣判无罪；接下来，一条好汉领着身后百十号头戴面罩的懦夫，连夜出动，用私刑结果恶棍。而你们的错误在于：你们没有带来哪位好汉，此其一；第二，你们没有在晚上来，也没有带什么面具。你们带来的不过是半条好汉——像勃克·哈克纳斯那样一个人，要是没他带头，你们早就跑得喘不过气了。”

“你们原本不想来。常人嘛，不愿麻烦，也怕担风险。你们也一样。可是只要有像勃克·哈克纳斯那样的半条好汉，在那儿叫道：‘处死他，处死他！’你们就害怕得不敢后退了，其实你们是怕见到自己真正的嘴脸——懦夫。于是你们扯起嗓门，跟在那半条好汉的屁股后头，怒气冲冲地跑到这儿来，还信誓旦旦地想要大干一场。”天底下最最可怜的是一群暴徒。军队就是这样一群暴徒。他们打仗不是因为拥有什么与生俱来的勇气，他们的胆量全是从群体里，从长官身上借来的。不过要是这群暴徒没有一条好汉作统帅，就连可怜也谈不上。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夹起尾巴，滚回家去，爬进洞里。如果你想搞什么私刑处决的话，就依着南方人的规矩，晚上再来；还有，按照习俗，他们会带上面罩，再带个好汉过来。现在滚吧，带着你们那位半条好汉，滚！”——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枪架到左臂上，还扳上了扳机。

暴徒们突然向后退去，纷纷夺路而逃；勃克·哈克纳斯也紧随其后，一副狼狈相。其实只要我高兴，是可以留下来的，但是我却不想那么做。

暴民被恶棍领导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市场、 群氓和暴乱



1962年9月，执法者在密西西比大学汇合，准备对抗主张种族平等的人士。[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图片库]



不只是反对派和获胜无望的局外人才具有狂乱暴徒的心性。政府当局也可能具有暴徒最丑恶的特质。这张著名的照片由美联社的比尔·哈德森(Bill Hudson)拍摄完成。1963年，“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组织了一场游行。画面中，警察驱使警犬袭击一位示威群众。(美联社/大千世界相片库)

第四章 暴力行为和私刑处决

“男人们一边叫嚣，一边投掷石块”

下面描写的这场民众用石头发动的攻击是私刑执法的先祖，它为群体伸张正义提供了一个现代版本。然而这一回，暴民却是依照国法行事。这篇电讯由记者 R. M. 麦考尔(R. M. Macoll)撰写，并刊登在1958年2月11日的《伦敦每日邮报》上。电头是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城市——吉达。

崭新的美国大轿车排起长龙，沿着尘土飞扬的街道徐徐前进。

附近的商店橱窗里塞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美国的电冰箱和空调、德国的照相机、意大利的电气装置。

街角附近的泥瓦匠们正在辛勤地劳作，他们正为一幢12层的现代化写字楼进行最后的装修。吉达的海港充斥着爆破声和喧嚣声，像这样责令完工的建筑还有很多。

然而，庞大的人群里鸦雀无声，大家对此熟视无睹。

一位王子(他是国王的侄儿)在椅子上正襟危坐。王子面前铺着一条长毯。两名身穿卡其布装的军警将一名男子从卡车里带上前来。该男子未满三十，却显得镇定自若。

他的双手被链条反绑；由于链条缠住了脚踝，因而走路时步履蹒跚。

他来到长毯的一角，屈膝跪下；军警喝令他只许盯着王子的脸。

在他身旁的一位官员展开卷轴，开始高声宣读这名男子的罪行和法院的裁决。现在的人群鸦雀无声。

突然，警队散开；手持长剑的刽子手登场了。他从后边蹑手蹑脚地接近跪倒在地的受害者。官员的宣读刚一结束，刽子手就弯下腰，用手指在男子的背上轻轻碰了碰。

出于本能，男子在惊恐中抬起了头。刽子手立时手起刀落，砍下了他的首级。

围观人群中传来一声低低的长叹。

现在，一名妇女被拖上前来。她同那名男子合谋害死了自己的前夫。她也不到三十岁，身段婀娜。

她也是跪着听完了犯罪陈述。接着，刽子手拿着一根木棒走上前去，他用尽全力在女人的肩头砸了一百下。

棒打结束，女人瘫在一旁。

然后，一辆卡车倒着开了上来，并将车上的石块和石子卸成一堆。王子一声令下，民众跳上石堆，捡起石块将那名妇女活活打死。

由于这名妇女一身穆斯林打扮，嘴巴又被塞住而不能喊叫，所以人们很难判断她是怎样经历了最后那段可怕的煎熬。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沙漠里，那就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了；然而人们却将刑场设在吉达现代化的商业中心，这就令事件显得凄惨而恐怖。

太阳高悬在碧空中。一则熟悉的美国软饮料广告做着轻声叫卖。“到中东来，”附近橱窗里的一则航空旅游广告则说，“感受这浪漫的气息，缤纷的色彩，异域的风情……”

人群不再沉默。男人们一边叫嚣，一边投掷石块，脸上露出凶残暴虐的表情。

大家对那名男子被处决的方式还心存疑虑？好吧，请不要忘记：就连1936年的法国也仍然保留着最后的公开处决形式。斩首至少还带些人性，并且执行干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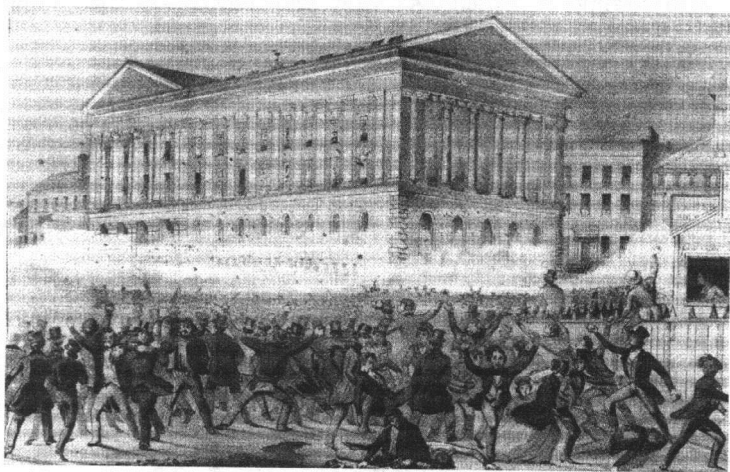
然而，那名妇女接受处决的场面却把许多在场的欧洲人吓坏了。他们不会马上忘却这起事件。

人们用石头对妇女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攻击，其间，一位医生不时到场检查受害者的脉搏。最终，医生宣布了妇女的死亡。

这种双双处决的事件不久之前刚刚发生过。

乌合之众……犹如大海，百川汇流，难寻根源；乌合之众千差万别，各不相同。浩渺的大海最是反复无常、飘摇不定，翻涌的海潮最是令人惊惧、冲动、残暴。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49年5月10日,15 000人集中在纽约城的艾斯特歌剧院,抗议一位英国莎士比亚话剧的表演者出演剧目。此前,这位演员曾不加掩饰地对观众表现出轻蔑态度。由于人群不肯散去,民兵们开枪击毙了23名示威者,“新奥尔良战争”的死亡人数还不及它的一半。这幅表现当时暴乱场景的石版画由库瑞尔(Currier)和艾夫斯(Ives)创作完成。

卢旺达:当暴民掌权时,恐惧变得平常

无论是开展经济、政治活动,还是简单地泄愤,疯狂的暴徒总是危险的。但如果暴民和国家融为一体,就可能造成最可怕的局面。1994年,在卢旺达这个非洲小国里,一场痛苦的种族灭绝所需要的各项条件全都齐备了。

卢旺达自古就被分为两个种族团体:胡图族居多,约占人口的90%;图西族则占少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至1959年该国第一次民主选举这段时期,由于比利时统治者在殖民非洲广泛推行“各个击破”政策,作为傀儡的图西族占据着主要统治地位。而1959年选举后出现的暴乱却使身为多数派的胡图族掌权。宿怨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进一步加深;20世纪90年代早期,煽动家又开始火上浇油。

身为总统夫人的阿加特·哈比亚利马纳(Agathe Habyarimana)创立



市场、 群氓和暴乱

第四章 暴力行为和私刑处决

了一份名为《康古拉》(意为“觉醒”)的报纸——它通过“胡图族的十项戒律”，鼓吹“胡图族专权”，其中包括“第八项戒律”：“胡图族不能对图西族姑息养奸。”受政府支持，年轻的胡图族男性开始自发组织“印特拉哈姆伟”民兵。有过之而无不及，该国副总统在 1992 年 11 月的讲话中，号召胡图族迫使所有图西族人离开卢旺达。如果对方不走，胡图族人就要“消灭”这些“蟑螂”。

一年半以后，暴乱真正开始。那时，卢旺达 700 万人口中，有 80 万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图西人。有 200 万人逃离祖国；另有 200 万人在国内也被迫背井离乡。

下面这段摘录源自《人权观察》中的一项长期调查。每个人都因为这些异常恐怖的事件看似平常的表面[即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说的“恶魔的平凡”]而深感震惊。作为事发地的布塔雷，恰好位于卢旺达首府——基加利的西南部，与布隆迪的边境接壤。当 1994 年 4 月的大屠杀开始时，布塔雷仍是一个拥有 26 000 人口的小区中心，图西人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

就像在基加利，士兵们……连同国家警察，还是先拿布塔雷的知识精英和政界精英开刀。有时，他们通过当地向导的指引或者直接向邻居询问，径直来到事先选定的屠杀目标的家里。民兵向正规武装力量提供支持。很明显，许多“印特拉哈姆伟”民兵在前十天里就被秘密带来；此外，大约 100 名总统卫兵和民兵，也于 4 月 20 日来到布塔雷。

下午 16:00 至 17:00，一架 C-130 型运输机降落在布塔雷机场；这也许是如此庞大的飞机第一次使用小型跑道。当晚，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架奇特飞机的到来，也发现有不明身份的士兵和民兵出现在镇上；于是他们断定：外来分子已经飞抵布塔雷。而事实上，当比利时人驾驶飞机从内罗毕赶来疏散一群欧洲修女和联合国军事观察家时，这些外来分子就已经驱车抵达了。除了来自布塔雷地区以外的民兵，报道称：在 4 月 20 日，由莎洛姆·恩塔霍巴里(Shalom Ntahobari)率领的本地杀手也展开了最具毁灭性的攻击。

尽管有些人是在家里被士兵和民兵就地杀害的，但许多人却是在各处主要的屠杀场地接受处决的(比如：博物馆后面，大学植物园里，或是精神病学中心和教学区附近。屠杀从 4 月 20 日晚间开始，持续了四天。据布塔雷镇的居民叙述：枪声此起彼伏，而从这些屠杀场所传来的枪声尤为频

繁。



1976年4月,波士顿。特德·兰兹马克(Ted Landsmark)是一位美国黑人,他同时也是“波士顿商会”的执行理事。这天,他正在去市政厅开会的路上;突然,反对用校车接送跨区学童的示威者,顺手抄起一面旗帜作武器,袭击了他。这张表现攻击时可怕场面的照片由《波士顿先驱报》的斯坦利·J. 福曼(Stanley J. Forman)拍摄。(斯坦利·福曼/《波士顿先驱报》)

士兵从气氛祥和的布耶附近展开了屠杀,袭击了卡伦齐(Karenzi)教授这样的图西族领袖。部队中负责保卫卢旺达总统简—巴蒂斯特·哈比亚利马纳(Jean-Baptiste Habyarimana)的兄弟——巴刺仁伽纳(Bararengana)教授的“总统卫队”,于4月21日凌晨2:00来到卡伦齐的寓所;他们将卡伦齐带到了“老鹰酒店”门前。“外部安全组织”的士兵在那里架起了路障。卡伦齐和另外一群人(其中还有一位教授,他被指控伪造了自己的身份证)在那里排成一列。据一位目击者陈述:当时,恩萨比马纳(Nsabi-mana)长官和副教区区长尼史马毓努阿穆伊(Nshimyunuremyi)就站在不远处,“宜必思旅馆”前面的街道上。一名镇外的民兵就当着他们的面,杀死了两男两女和五名儿童。其他人中,仅有一人成功脱逃;卡伦齐教授随即遭到枪杀。他家中的孩子和年轻人因为藏在天花板里才侥幸逃生;但最后也仅有一人躲过了屠杀……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除了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军队还将目标锁定在富人身上。4月20日,士兵们冲入一位居住在布塔雷中心的富商家中,杀死了他和他的家人,抢走了大约300 000卢旺达法郎(近1 700美元)。两天后,一个叫克洛德(Claude)的年轻士兵伙同三名“印特拉哈姆伟”民兵回到这里(据称,他们来自莎洛姆的部队)。他们带着五名年纪不大的成年人和一名12岁的男孩来到不远处的教学区刑场,并在那里杀害了他们。在屯巴,六名国家警察率领一行人,对一位妻子是图西人的瑞典企业家的房舍发动了袭击。这群普通人带着弯刀、长矛,甚至还有一把弓箭;领头的是一个年轻人,他头上倒扣着一顶全球帽,打扮得就像一个外国佬。国家警察在两次鸣枪示警之后,便冲了进去。他们从这户人家抢走了数十万卢旺达法郎,之后他们叫来百姓,把这里又洗劫了一回。有些百姓偷走了昂贵的物件,但其他人似乎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羞愧,于是只拿了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像是一只盛满土豆的饭锅或是一件儿童玩具。一位目击者称:看来,百姓们参与抢劫实属无奈。临走时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

士兵们杀死了那些被认为曾反对种族灭绝的胡图领袖,就像其他部队在基加利杀害国家政府中的胡图族官员一样。据目击者描述,尼泽伊玛纳(Nizeyimana)和他手下的卫队士兵谋杀了他的邻居——副检察官马塔博罗(Matabaro)。士兵们还杀害了吉恩—马里·维亚内·马尼拉欧(Jean-Marie Vianney Maniraho)教授及其家人;教授曾在一次公共治安大会上,对小镇里出现大规模武装的局面,表示批评。在西阿瓦,士兵们烧毁了一名胡图妇女的住所,因为她与一位反对“胡图专权”并推行“共和民主运动”的民族领袖有着联系。几天后,她被杀害于一段栅栏前。据说这是巴拉乌戈(Baravuga)代表下达的命令。4月21日的晚上,士兵与民兵杀死了地方次级长官瑞法尼·尼林瓦亚(Zephane Nyilinkwaya)和他的14位家眷。胡图族的尼林瓦亚同时也是“社会民主党”成员,军队认为他可能会带头反对屠杀图西族人。4月22日清晨,一位无国界医生组织^①的医生在经过尼林瓦亚的寓所时,发现这家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门前的车道上。其中一个婴儿才三个月大;他后脑中枪,倒在母亲怀里。而他母亲的胸口则被一颗子弹洞穿。医生还发现了两名幸存者:一名17岁左右的女孩(一颗子

^① 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MSF)于1971年12月20日在巴黎成立,是一个由各国专业医学人员组成的国际性志愿组织,是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译者注

弹穿过了她的双乳)和一名 14 岁的男孩。当医生准备带着他们去医院时,两名士兵跑上来横加阻拦。最后,医生费尽唇舌才得以将伤者带去救治。

在某些时刻,受某些强烈情感的左右(譬如在一次盛大的活动中),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体也能具备心理群体的特征。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乌合之众》

当周围的人都丧失理智时,你需保持冷静

如果将私刑处决看做暴民的谋杀,你就不大可能使自己卷入其中;你既不会给别人套上绞索,甚至也不会目睹那可怕的场面。然而毋庸置疑,在年鉴中,有关“南部和‘旧西部’的治安维持会成员在执行绞刑时引来大量民众,人们往往兴奋异常”的内容,比比皆是。

如果私刑处决让人难以产生联想,那么,种族灭绝就更加令人无法想像了。当邻居和同胞仅仅由于种族、宗教、部落的不同被满门抄斩时,有谁会熟视无睹呢?又有谁更恶劣到落井下石的地步呢?然而历史上却有太多道貌岸然的人干过这些勾当。事情怎么会这样呢?

另一方面,游行开始时抱有各种崇高目标(拯救环境、保证人民权益或者人类权益、维护公理)的人们,最后怎么会和警官或者国家警卫队发生暴力冲突呢?而那些警官和国家警卫队成员可能就是我们隔壁邻居的子女。

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拒绝面对群体暴力、私刑处决乃至种族灭绝;而它们其实是我们一直支配的情感裁决的极端形式。我们惩罚孩子根据的往往不是他们的行为本身,而是我们自己面对混乱现场时的感受——整日的工作使我们心力憔悴,老板的叱责使我们怒火难平;于是面对 10 岁的孩子,我们无所适从。

我们惩罚股票也完全出自情感:之所以惩罚股票,不是因为股票的内在价值已经崩溃,而是由于我们对股票已经丧失了兴趣。因特网泡沫市场充斥着这类例证——投资者对稳固而饱受赞誉的公司不闻

不问,却对规模比皮包公司还小的企业情有独钟。

正如本章所展现的那样,我们也总是以这种方式来考虑更为重大的问题。当提出的要求无法被卫兵接受时,我们会变得懊丧,并且开始投掷石块;于是卫兵也跟随自身的情感,以更激烈的方式作出回应;最后便出现了混战。由于缺乏在任何法庭都站得住脚的证据,我们干脆便把正义捏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受到权势的驱策,并且担心违抗大众,于是便将自身的不安——我们在过去的失败和我们对未来的担忧——传递给其他一些人;最后便出现了屠杀。

情感裁决寻找着替罪羊——那些所谓“羔羊”的现代化身。他们先是和某个团体的不幸联系在一起;之后,就被踢出群体,或是遭受屠戮。人类的天性驱使我们这样做;而大众传媒则通过宣传苦难的家庭要求应有的公正,在一旁煽风点火。然而,真正的裁决不仅限于此。真正裁决的证据,要能在智力法庭而非情感法庭上站得住脚。

正如本书其他部分多次提到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不仅要花功夫了解现有的提议,而且要花功夫了解自己反对或是认可该提议的动机。现在左右你的是理智还是情感呢?你是否查验过控诉的逻辑?或者,你已陷入了情感的重重包围?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暴徒的统治一旦失控,文明的正常法则一旦遭到废弃,民众就会四散奔逃。1945年,新教的神学家——马丁·耐摩勒(Martin Neimoller)在《罪行的控诉》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著名的文字:“在德国,他们首先袭击了共产党人,而我却保持缄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而后,他们袭击了犹太人,我仍旧保持缄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接着,他们袭击了工会会员,我依然保持缄默,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然后,他们袭击了我;那时,已经没有人仗义执言了。”我们应当在暴乱以前,而非暴乱以后实现这种同理心的飞跃,因为我们不大可能和群体狂热和谐共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八名纳粹特工就潜入了美国东海岸;他们身携炸药,准备摧毁桥梁、铝车间、发电厂和其他目标。当这一小撮入侵分子被逮捕时,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下令:特工人员必须在一个秘密军事法庭接受裁决。为这群破坏分子辩护的责任被交给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律师、身为第一次世界大

战老兵的肯尼思·罗亚尔(Kenneth Royall)。假如罗亚尔依照计划走个过场,事情本可以就此了结,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秘密军事法庭带有极端色彩的情感裁决,却令他感到震惊。罗亚尔觉得:无论是不是德国特工,不论是不是破坏分子,他的委托人都应当受到民事审判的全面保护。于是他将案件上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尽管法院最终对罗亚尔的一项主要观点表示赞同,他却还是输掉了这场官司。他的委托人也被秘密定罪,8人中有6人被处决。而之前罗亚尔甚至不知道判决已经强行下达了。在民意的法庭上,他也输掉了这场官司。他面对当时情感的狂潮,坚守了自己的原则;却被故乡的《夏洛特观察家报》公开辱骂成一头“哼哼乱叫的蠢驴”。其他报纸和公众评论员的态度也好不到哪儿去。然而最终,原则而非情感占了上风。罗亚尔并未因此身败名裂;恰恰相反,他被提升为准将,之后又成为陆军部副部长。1947年,作为罗斯福接班人的哈利·杜鲁门委派他担任了美国最后一届的陆军部部长。

肯尼思·罗亚尔知道,在危急时刻,情感是我们最不可靠的向导——情感越是粗鄙,也就越不可能指引我们找到真理。和马丁·耐摩勒(Martin Neimoller)一样,罗亚尔也知道,对他的委托人进行秘密审判的法庭,某一天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

因此,当暴徒们有时由于摇摆不定,
给予我们过高赞誉或是过分责难时,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星星般的目标,
坚持自己的决定,丝毫不为所动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选择一个星星般的目标》



第五章 领导者和跟随者



引言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他的散文《自助》中写道:“做人首先不能墨守成规。”在文章后面的内容里,爱默生重申了这一观点并且加以扩展:“在人世间随波逐流地生活不难;在独处时固守己见地生活不难;而只有伟人才能在茫茫人群里尽享独处的自主。”

一代代的美国个人主义者都受到这些话的鼓舞。尽管与公众意见的洪流相悖,爱默生却还是对战时的和平主义者发表了一番支持他们立场的讲话。他赞成反文化的嬉皮士和披头族对传统嗤之以鼻,并坚称:“愚蠢的坚持是狭小心灵里的妖魔。”然而,人们其实还是喜欢随波逐流。我们大多都是社会动物。好比狼群想要找出统帅它们的雄性首领,我们也想找出指引我们前行的人类首领。

利用人类跟随领导的本能,营销者往往将新产品瞄准市场那狭窄的开端部分(即早期使用者,他们设定了其他人跟从的方向),而不是自己希望最终到达的市场宽广的中间部分。商家首先会在市中心大力开展某一新款青少年服饰的营销活动;但相对而言,这里最终的销售总额却不会很多。然而,平民阶层玩剩下的老把戏却可以在说唱乐手的背上玩出花样;说唱乐表演最终走入音乐电视。而这就是大众传播的力量:贫民区青少年的品味决定着生活在城市近郊和远郊的孩子们的消费欲,即便后者绝对不会穿过哈莱姆、瓦兹或加比利尼—格林这些黑人街区。

银行界显赫一时的内森·罗斯彻尔德(Nathan Rothschild)和其他的伦敦投资者都曾经关注过 1815 年的“滑铁卢之战”。当时,如果拿破仑击败英国和普鲁士的军队,英国债券的价格势必会暴跌;而如果英国获胜,情况就刚好相反。但是,和其他投资者不同,罗斯彻尔德有一个优势:一个基于信鸽的情报系统。该系统始终保持着最新的技术水平,直至 22 年后人们发明了电报,并将其取代。

由于比伦敦的其他人提早将近一天知道了拿破仑的溃败,罗斯彻尔德进行了一次公开的抛售表演,他假装等着坏消息的到来。见到投资者中的“头狼”迅速逃走,其他投资者也紧随其后,一场抛售恐慌开始了。当债券价格开始回升时,罗斯彻尔德通过中介重新进入市场,并开始再度购股。

用美式橄榄球的术语说,罗斯彻尔德来了一个“横向传球”。当所有人都朝着一个方向运动时,他却另外开出一条光明之路,把球带给了一名膀大腰圆的接球手。而光明是指:100万英镑的利润、一笔财富和基于领导者一跟随者动态关系上的所有一切。

从传统上讲,军事教练已经利用了这种跟从的本能——我们对方向与指令永远的渴望。而且他们不断提升这种本能;于是,在上级的号令下,言听计从的士兵们甚至会翻越悬崖峭壁。由于更多地了解到群氓心理的危害,也有了越战中“米莱大屠杀”这样的前车之鉴,当代的军事教练放宽了标准。他们告诉今天的美国士兵:既要质疑错误的指令,又要坚决地服从命令。

士兵至少会遵从原始的求生本能。而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却要求“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信徒去完成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在履行指令的过程中,他们不但要表示顺从,还要被动地承受各种打击。甘地和之后的马丁·路德·金都有效地运用了非暴力手段来应对暴力反应。这既显示出人类群体本能的力量,也证明了我们能够将这种力量导向积极甚至崇高的目标。

正如金在自己著名的《从伯明翰市监狱发出的信》中所写的那样:“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要做极端主义者,而在于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极端主义者。我们要做服务于仇恨的极端主义者还是服务于博爱的极端主义者?我们要做为保留不公正而奋斗的极端主义者,还是为正义事业奋斗的极端主义者?”问题在于领导者想要从他们的追随者心中唤起什么。

甘地和金都试图唤起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所描述的“我们天性中更美好的一面”。由于甘地缺乏推翻大英帝国的火力,金也没有消除几个世纪种族仇恨的兵力,于是两位领袖都诉诸了战争的道德力量。他们希望:人们比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表现得更好。数百万民众作出了响应。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在就职演说中,告诉美国同胞:“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什么。”这一句孕育出“和平工作团”并带来更广泛影响的服务口号,激起了人们同样的反响。

相反,煽动家却不让受众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知道:在群体的庇护下,男人和女人都会失去道德的指引;在陷阱和伪装的庇护下,他们的行为更是不堪。煽动家的目标不是提升受众的行为水准,而是让群体

沉沦。煽动家蛊惑着过于冲动且缺少方向的群氓,民众因此感到愤怒并觉得受到了威胁。于是,就需要有人对此负责。然而,民众因何感到愤怒呢?他们受到了谁的威胁?谁又应当对此负责呢?煽动家的工作就是提供这些答案:他们将公众的情感汇集在一个目标上,直到对方咆哮着要求进行“不受理智约束的报复”——它是“情感裁决”的相同形式,而我们曾在前一章领教过“情感裁决”。将群氓推向这个极端,往往需要蛊惑民心。在煽动家的蛊惑之下,剥削阶级,邻邦,国家的某个民族、种族或宗教团体,都能成为群氓眼中各种罪孽的替罪羊。

煽动家利用各种形式的象征符号——从横幅与旗帜到青年团、精心设计的标题和大规模的集会。他们中最具效率的成员谙熟群众心理。通常,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内容非常简单,并在缜密的解决方案出台前就得到了很好的宣传:你们受到压迫;他们应当负责;我们需要行动。

请看阿道夫·希特勒(Adolph Hitler)在《我的奋斗》(1922年第1版)第11章叙述的一段内容。在此后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整条可怕的历史轨迹就是源于这样一种极端的救助:

因此,只要不开展声势浩大的斗争以启迪民众,犹太人仍将是贸易联盟运动公认的领袖。只有开展声势浩大的斗争,民众才会更好地理解自身不幸的根源。如果政府当局能消灭犹太人并剥夺其工作权,也可以实现相同的目的。

20多年来,希特勒鼓吹着相同的理念。就像今天江湖郎中常说的那样,他不遗余力地“鼓吹宣传”。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让群氓信服,然后将整个国家化为自己领导的群氓。经他妖魔化的加工,犹太人多半都走投无路。

煽动家总是有意制造暴乱——以希特勒为例: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经济局势混乱;加之煽动家不断制造谣言与暗示(一个优等民族、雅利安人的命运之谜、所谓犹太人的下流做派、共产主义者、吉普赛人),群体中便出现了恐惧和惊慌。这种恐惧和惊慌集中在特定的敌人身上,以暴力和治安维持会的方式体现出来。情况最糟时,未经约束并且受到广泛支持的煽动会引发战争和种族灭绝。

就像牛群由于气候状况或是天敌出现而神情紧张,狂热的群体也是无法预测的。成功地领导群体需要娴熟的技能。惊慌的人群会四散奔逃。蛊惑民心固然能将人们聚到一起,却同样也能反过来吓跑妖言惑众的人。

为了博取公众支持,发动1991年针对伊拉克的“波斯湾战争”,乔治·布什

市场、 群氓和暴乱

第五章

领导者 and 跟随者



人类就像群居动物。我们中的多数人会跟随领导的指引。这张照片中,2 000只绵羊进行着年度迁徙,它们要跨越阿尔卑斯冰川,进入奥地利北部蒂罗尔的夏季牧场。

(George Bush)总统及其助手们努力将伊拉克的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刻画成:魔鬼般的暴徒、地区灾难的根源、对全球安全的威胁。[就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过去常说的那样:它增加了成为事实的砝码。]努力有了成效,行政宣传员理所当然且轻而易举地便将萨达姆当做了一面靶子——而当战争以中东的摩菲斯特^①安全驻守在巴格达告终时,在许多人看来,蛊惑民心的大获成功反倒衡量出了海湾战争的彻底失败。

领导群体有点儿像驯狮员的工作:首先,你需要椅子和皮鞭来确保野兽变得狂躁,但当你把头伸进它那张血盆大口时,却还抱着一线希望告诉

① 浮士德传说中的魔鬼,浮士德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这个魔鬼。——译者注

自己:狮子尽在我的掌握,不会一口咬下来。

如何分辨煽动家和真正的领袖呢?信息的内容能够说明很多问题。他们是要你构建城市还是摧毁城市?他们是要你开荒垦田还是把其他人驱逐出境?这些内容出现时的情景也能说明问题。你无需会一句德语,就能听出阿道夫·希特勒言论中的暴力和敌意。你无需懂英语,就能听出亚伯拉罕·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的内在美。声调足以说明问题。尽管如此,“母亲测试”可能是最准确的检测手段了:你想让自己的母亲或是其他非常受你尊敬的人知道你正站在人群中,聆听这位领袖的发言吗?或者说,你是否喜欢为仇恨找借口呢?是你善良的一面被唤醒了,还是邪恶的一面被唤醒了?

群众的暴虐就是成倍的暴虐。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元首:群氓的呼声

当领导指挥群体行动时,群体往往会背道而驰。可是一位和群体亲密无间的领导(他仿佛是群体的代表,是群体共同愿望的呼声),就没有这种问题。阿道夫·希特勒就属于这种情况。

一开始,希特勒及其心腹就知道:维系群众最主要得靠情感而非理智。先让群众由衷地信任你,接着他们的思想就会跟着你走了。1927年,纳粹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描述了当年国家社会党在纽伦堡举行的重要集会:

数千名列队经过元首的德国纳粹冲锋队士兵用目光灼灼地、骄傲地凝视着他。他们带着“元首同样因他们而骄傲”的保证,回了家。元首看见最优秀的德国血统经过了身畔……国家社会党人的思想明确而果决。而它却没能像“褐衫军”^①闪动的眼眸和拥护者热情的表达那样,以优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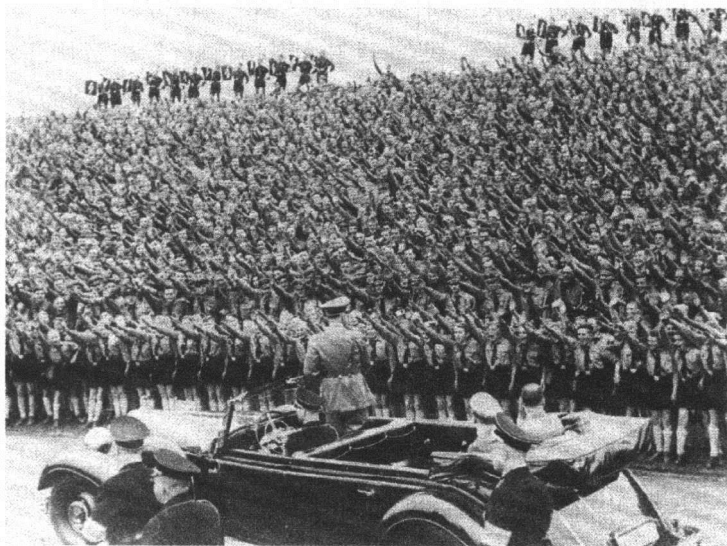
^① 德国纳粹冲锋队,纳粹的准军事组织,任务是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镇压那些反对纳粹的人。冲锋队人员接受军训,拥有武器,身着统一的褐色制服,因而又称“褐衫军”。——译者注



形式体现出自身的价值。

1932年，当纳粹党在慕尼黑集会时，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之间的情感已变得水乳交融。希特勒就是群氓；群氓就是希特勒。在1932年9月11日版的《纽约时报》杂志上，作家玛丽·李(Mary Lee)捕捉到了这难忘的一刻。

数千名小伙子脱下外套，按军衔在入口处排成了整齐的队列。人们战栗不安，就像男校学生在开展重大活动前一刻的表现。尽管情绪激昂，大家却又表现得十分安静。远处，广场的圆形大舞台上挤满了人，甬道和门口也都挤满了人，现场被围得水泄不通。



纳粹党于1938年9月召开的纽伦堡大会上，数千名年轻的团体成员朝着元首致敬。“德国是欧洲为和平奉献最多的国家，”希特勒在大会上说，“德国做出了最大的牺牲。”(超景图片库/华盖创意图像)

三个小伙子挥舞着衬衫，挤进当中一圈人的中央。“退后！”他们喊道，“退后！领袖！他往这边来了！”人们赶忙跟着他们，冲向之前付过5马克的凉廊。咦，位子呢？现在那里已经座无虚席。人们正伸着脖子，东张西望。“元首！”他们说，“元首！他来了！”大家全都站起身，每个人都翘首观望，并且互相推搡着。“领袖！他来了！”有人被挤到了后面，身体紧贴着看台的围栏；而他们本还想在看台上找到一席之地。体魄强健的年轻人手拉手围成了一排人墙，为元首留出了一条通道。

“嗨！嗨！”一万只右手向上高举着。女人们热泪盈眶，男人们声嘶力

竭地呐喊。你能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情感——一种认真。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政治集会，群情激昂的人们似乎正要去参加一场婚礼或是葬礼。“嗨！嗨！”人们奋力向前涌去。

一名男子从人们的身畔经过。他身材中等，体态丰满，上唇正中挤着一撮小胡子；一张丰满、松弛、粉嘟嘟的脸上几乎毫无表情，这是一张温和的脸。眼前的这个男人完全不像墨索里尼那样夸夸其谈。他可能是一位餐馆服务员，也可能是一家旅馆里善良可信的领班。他缓慢而安静地经过人群，没有一丝趾高气扬、好勇斗狠的情绪。他看上去像一位营养良好的市民，一个缺乏锻炼却呼吸了足够新鲜空气的人。为什么，这个男人不是一个伟人呀！

“嗨！嗨！”他爬上了讲台。民众们大吵大嚷。环顾这个虔诚到几乎狂热的神情专注的群体，你会发现：与眼前的这个男人相比，群体拥有更多的力量。

这位普通的市民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蓝色套装。他走到台前，脸上几乎没有表情；那双明亮的眼睛也同样缺乏任何的生气。他的四肢瘫软，当他抬手致敬时，你会觉得他的右臂在隐隐作痛。现在，他望着人群，那样子就像一位和蔼的教师俯视着自己的学生。他就像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佣似的，用手肘的力量而不是肩膀的力量向人群示意；不然，他就站在那里，将双臂交叉叠放在腹部；左手心里的手绢被揉成了一团小球。眼前的这个男人能有什么力量呢？

军乐响起。小伙子们迈步，从观众中一条拥挤而狭窄的通道穿过舞台。他们身着短袖，抬起右臂，迈着正步径直来到希特勒站着的讲台下方。接着，他们便又继续列队前行。最后，他们穿过一扇门，隐没在远处的黑暗之中。每个小伙子都抬头望着希特勒的眼睛。那是年轻的目光，那是19岁理想主义的目光，那是渴望为理想赴汤蹈火的目光。他们等着号令，等着接受为之献身的事业，也做好了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准备。每个人都望着希特勒的眼睛，仿佛他就是那种理想的化身。

希特勒的目光似乎和每个小伙子都有交集。他凝视着台下，仿佛能从人们经过时的目光中获得力量。他从不微笑。他的严肃反映出小伙子们的严肃，反映出理想主义，也反映出年轻人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些年轻人会前仆后继地走出去，迎接死亡；他们的种族寻求着某种宣泄，而他们也会跟随任何能够激起自己民族内在勇气的人。那就是这个男人——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他已经掌握了个体渴望为群体作出牺牲的好斗本能，利用并引导了这种本能。他是领导者，而不是煽动者。

在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有3 000个小伙子从希特勒所在的讲台下



方列队经过。望着那一张张充满渴求的脸庞时，你不禁会问：他们这是要去往何处？他们是否知道答案呢？希特勒又是否知道答案呢？

墙上写着醒目的大字标语：“自由和面包！”“让马克思主义见鬼去吧，这样，真正的社会主义才能生存！”“德国的劳动者要起来反对犹太人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德国的社会主义才能生存！”



柏林的花衣魔笛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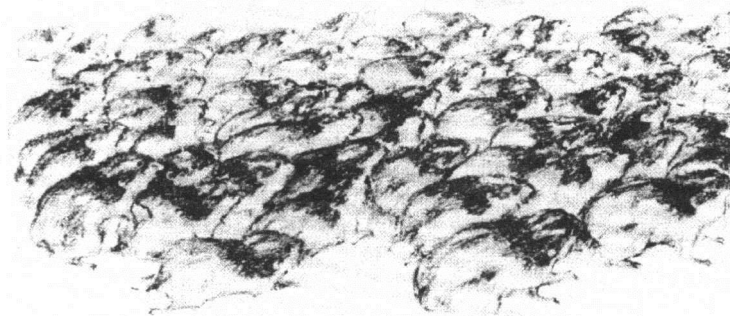
行军终于结束了。小伙子们全部退场，并隐没在黑暗之中。希特勒走到台前，双手交叉叠放在腹部，左手还攥着一块手绢。挥手示意时，他总是用肘部带动右手，并伸出中指；那模样就像一位妇人晃着被火炉烫到的一根手指。然而，不知怎么的，他的力量就蕴藏在这些极为虚弱的姿势里。有人认为，这个男人体现出一种感受；反映了一种思想；代表着一种因为身体衰弱，而难以传达的理想。有人认为希特勒并没有影响民众。有人认为是民众左右着希特勒。有人认为他表达了民意，道出了民声。

煽动家是群氓的走卒。

——戴奥詹尼斯(Diogenes)

旅鼠的看法与做法

说到盲目跟随领导,旅鼠是最具代表性的生物。挪威旅鼠大规模的迁徙行程有时甚至以集体投水自尽的方式告终;因为这样,有关它们的内容频繁见于传说、漫画和照片。然而正如我们在以下这篇摘自沃尔特·马斯登(Walter Marsden)《旅鼠年代》的短文里所看到的,驱策这种著名啮齿动物前进的是惊慌,而不是求死的愿望。



挪威旅鼠的数量每10年就会激增2~3倍,由于数量过剩,它们被迫四处觅食。当受到天然屏障的阻碍时,旅鼠就会被迫集结成群,有时它们还会组成长长的队伍。因为这样,这种小型啮齿动物便成为了从众本能的标志。有时,成群的旅鼠会跳入海里被活活淹死;其实它们只想找吃的,并不想自杀。这幅由琼·桑德琳(Joan Sandlin)绘制的插图出自阿兰·阿金(Alan Arkin)的《旅鼠条件》。

人们会在特殊环境下发现聚集成群的旅鼠。旅鼠极少选择群集

的时间。它们这样做,很可能是迫于当地的地形。长长的海岸线会阻碍旅鼠犹如龟爬的迁徙行程,拦住它们上行的去路;当两条支流相互交汇,而旅鼠沿着河岸下行时,又会被卡在一个漏斗形的地带。在这种情况下,旅鼠便只得群集在一起。

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所谓不计后果的前进……旅鼠们不断地聚集,最终会导致拥挤不堪的局面,并会产生类似恐慌的反应——某种形式的群体暗示。在群体迁徙的诱因中,包括了一种在竞争与压力的诱导下而产生的精神失常。

一群旅鼠在意见分歧时,和华尔街那群利己的个人主义者没有两样。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

跟随领袖:非暴力的暴力

在领袖号召成员作出的所有牺牲中,最大的牺牲可能是放弃自卫的本能。当莫罕达斯·甘地——这位圣雄向印度的英国殖民统治者发动非暴力的人民抵抗运动时,就完全是这样做的。1930年5月,韦伯·米勒(Webb Miller)亲眼看见:2 500名甘地的支持者在达拉撒纳举行了针对政府囤放食盐的游行,以反对英国强行征收的一项盐税。那时的甘地正身陷囹圄。他已于当年的4月6日,以“生产私盐抵制英国垄断”的罪名被捕。然而他作为榜样的影响力却并未因此而减退。米勒将下面这则报道发表在《新自由人》报上。这是一篇对于人们不计任何代价跟随领袖的经典研究。

盐层周围都是积满了水的沟渠,400名来自当地,身着卡其布短裤,头戴褐色穆斯林头巾的苏拉特警察把守在这里,并由6名英国军官对其发号施令。警察们带着警棍——这是一种5英尺长、末端用钢材制成的棒子。路障内,25名手持来复枪的当地士兵被召集起来。

甘地的拥护者十分安静地聚在一起;他们来到距离路障100码的地方停了下来。一支精选出的纵队从游行队伍中走了出来,他们吃力地穿过水

渠,来到钢丝密布的路障前面。而手持棒子、蓄势待发的苏特拉警察,正围在那里。军官们要求游行自行解散,还搬出了近期的一项强制性法规——禁止在任何地区出现 5 人以上的集会。但纵队成员却用沉默无视着警告,依旧缓缓前行。我和游行队伍中的大多数成员一起站在距离路障大约 100 码的地方。

忽然,军官一声号令,20 名当地警察冲向前进的队伍。包着钢皮的警棍雨点般地砸在示威者的头上。但游行中却没有一个人抬手抵挡。他们就像保龄球瓶一样摔倒在地上。在我站着的位置上,我能听到棒子重重地砸在不受保护的头颅上所发出的令人厌恶的声响。伴随着棍棒的撞击,在一旁守望的人们出于同情,也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和喘息。

在那些被击倒在地的人里面,有些人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有些人昏迷不醒,有些人由于颅骨骨折或是肩膀断裂,身体痛苦地扭动着。两三分钟的时间里,地上便已经布满了尸体。他们白色的衣服上,印满了大片血迹。而那些幸存者仍然默默地、顽强地、按照先前的队列,继续前进,直至被击倒在地。当第一支纵队中的所有人都被击倒时,担架手们不受干扰地将伤员迅速抬到一间茅草屋内。人们事先已经把那里布置成了一间临时诊所。

接着,另一支纵队登场,而示威活动的领导者则要求他们保持克制。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几分钟内就会被击倒,甚至被杀,但是我却没有看见他们有一丝的动摇和恐惧。他们抬头挺胸,稳稳地迈步前行,没有音乐、没有欢呼、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其减轻伤亡所带来的苦痛。警察冲上前来,有条不紊地、机械地击打着第二支纵队的成员。没有战斗,没有抗争,游行只是向前行进,直至被击倒。

没有哀号,只有人们摔倒后发出的呻吟。由于负责抬走伤员的担架手人手不足,我看见:有 18 名伤员被同时抬走。另外 42 人仍然血流汨汨地躺在地上,等着担架手的到来。而被用做担架的毯子上则浸满了鲜血。

我不愿选择众人所希求的东西,
因为我不愿随波逐流,
与庸俗的群众为伍。

——威廉·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

领导跟随者：火场中的怒火

甘地要求自己的追随者不加反抗地承受暴力袭击，并且说：这样，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才可能结束。这其实是一种追求积极目标的群体狂热。瓦格纳·道奇(Wagner Dodge)则要求追随者，即15名“美国空降森林消防队员”，去完成更加有违本能的任务。道奇要求他们走进自己事先设计的火圈中，这样，大家就可以从肆虐的山林大火中解脱出来。甘地的追随者接受了甘地的要求，印度也获得了独立。而道奇的追随者却没有接受道奇的要求，于是几乎所有人都葬身在紧随其后的火海之中。

究竟是什么使得群体的表现向着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呢？是情感。在甘地和道奇的事例中，民众都未被告知应当表现出理智。另外，过往的经历也会产生效力。身为空降消防队长的道奇之前曾经决定将他的队伍空降到火区的后面，而那里是一处危险地界。面对大火，他两次改变了方向，结果15名队员全都各自逃命去了。而道奇最终却真的想出了解决方案：他在草场上放的那把火很快烧光了附近所有的易燃物。这样，地面附近就有了一些供人呼吸的氧气；而再大的火势也只能在周围蔓延，进不了这个圈子。而此时的他已经威信全无。

事发时间：1949年8月5日。事发场景：蒙大拿荒野中的曼恩峡谷火场。道奇的队伍已经置身火场两个小时了。不一会儿的功夫，人们就救出了道奇和两名擅长短跑的队员——沃尔特·兰希(Walter Rumsey)和罗伯特·萨里(Robert Sallee)。他们三人成功摆脱了大火的围追堵截，否则他们非死即伤。以下文字选自诺曼·麦克林(Norman Maclean)在《青年与烈火》中对当天情形的描述。

道奇已经带领队员走出了树林，他们的身后就是熊熊大火。道奇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能够迅速燃烧的异常干燥的草地，他也第一次看到了山脊的顶端。据道奇判断，那里处于自己上方大约200码的位置。两相权衡，他认为自己和队员跑不了200码，于是，几乎立刻就用火柴点着了一片干草，创建出一个此后著名的“安全出口”。但这种做法却也引来了人们在火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激烈讨论。

当时也许只有道奇才明白在主火的前面点火的用意。它其实不会形成逆火；人们根本来不及在沿山谷上行的区域组织防火线，主火火势必会全线向前推进。尽管不是逆火，火势却可能因为失去控制，在沿山谷上行的途中形成二次火灾；火势会从后面赶来，并迅速逼近消防队员。

正当道奇用第二根火柴燃起第二把火的时候，他抬头看见自己放的头一把火已经烧着了山坡上 100 平方英尺的草地。“这边，”他不停地朝身后的队员喊着，“这边。”许多队员看见他的时候，肯定这样问过自己：“那个蠢货到底在搞什么？”烟升起过两次；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当然会提出这个问题。

当时，队员们所处的位置从树林边缘一直延伸到前方草地的中心（这里也是道奇点火的地方）。兰希和萨里说：队员们原本毫不惊慌，但现在所有人都开始惧怕死亡，并和死亡展开了追逐赛。情势生死攸关，整个消防队都已经发觉：反常的举止照例迅速地扩散开来。说到同死亡赛跑，大家都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在树林的边缘，队员们可能第一次见到了峡谷的顶端；那里的火势已经攀上了峡谷的南面，整个峡谷顶端已被大火环绕。他们还可能从开阔的空地上隐约见到了峡谷的底部。岩石在烟雾中爆裂。队员们无需扭头向后看——他们能够感觉到热浪正穿过后背，径直钻入肺部。从空地边缘望去，他们可能也第一次见到了山脊的顶部。那里距他们不止 1.5 英里，但在他们的眼里却只有 200 码的路程。这个狗娘养的为什么要停下来点另一把火呢？……

后来烟雾根本就没有散去，只留下了这样一幅清晰的画面：先头队伍来到道奇和他点着的草丛旁边。而据道奇之后的陈述：当时整个队伍拉开了大约 150 英尺的距离。至少有 8 个人间隔很近，也离他很近。于是他试图在不阻拦对方的情况下，作出解释。道奇告诉队员：除非他们走入他在草地上燃起的火堆里，否则必死无疑。在以后的“调查报告”中，道奇明确表示：他认为，当时大家来不及爬上山顶；而接下来的事情也证明了他的观点。当时，吼声震天、烟雾迷漫；但他却一直朝着队员“大声叫喊”——道奇肯定：至少那些离他最近的人听见了他的喊声，身后的那些人也从他的动作中悟出了他的意图。缭绕的烟雾发出阵阵声响。突然出现了片刻的停顿。接着，一个人说：“见鬼去吧！我要从这里出去。”于是，队员们都跟着

喊声冲了出去。

队员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奔逃。烟雾中,道奇不清楚是否有人转身看过他。但他估计:主火不出 30 秒就会追上他们。

暴徒做任何事情都仰赖第一印象。

——拿破仑(Napoleon)



奥诺雷·杜米埃(Honore Daumier)的画作《卡米尔·德穆兰在皇
宫》,表现的是:1789年7月12日,一位年轻的作家在皇家宫殿前,号召
法国人民抵抗皇权统治。而最终,德穆兰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于1794
年4月5日执行。

砍下他们的脑袋

想到美国独立战争,在你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卷:华盛顿(Washington)在约克镇接受了康华利(Cornwallis)的投降;或者,杰斐逊(Jefferson)、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其他人齐集在费城的自由宫,最终签署了伟大的《独立宣言》。而想到10年之后的法国大革命,闪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则是截然不同的一番场景:阴森恐怖的断头台、盛满首级的箩筐、嗜血成性的民众。

差异存在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两次事件所构筑的神话产生出不同的结果。其实,聚集在美国“市镇广场”上的亲英分子和巴黎街头愤怒喧哗的民众一样,都怀有崇高的目标。差异还在于领导者本身,以及是否存在领导者。美国有自己的缔造者;而法国却只有一帮暴徒,因为没有领导,暴徒们犹如无头苍蝇,只知道用现在的恐惧回敬过往所承受的暴虐。

“死亡之车在巴黎街上隆隆驶过,声音空洞刺耳。”查尔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这样写道。“六辆死囚车给断头台小姐送去了那天的美酒。自从想像得以实现以来,有关饕餮颀颀不知饱足的种种恶魔的想像便都凝聚在一个发明上了,那发明就是断头台。”以下文字描写了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暴乱时的场景,它选自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于1893年首度出版的《历史故事》。

“去巴士底狱!去巴士底狱!”人们呼喊。无法无天的暴徒使得整个巴黎沸腾了。

月复一月,周复一周,日复一日,自从“三级会议”(会议要求民众向国王捐资献款,为了人民供给政府)召开后,革命情绪便已经在人民(例如:第三等级代表和市民)的心中滋长起来。

现在,巴黎人民被激怒了,城市街头一片混乱。人民的怒火直指这座监狱要塞,这座封建主义的堡垒,这个压迫势力的据点;这个藏匿着法国国王诸多黑暗秘密的恶名昭彰的看守人。过去,民众对它总是又怕又恨;而现在,民众的怒潮却直指灰暗的城墙。

巴士底狱是压迫势力的鲜活象征。这座配有守卫的堡垒一直威胁着巴黎。

资本

世界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狱墙上的大炮挑衅地望着民众。群众霎时间变得更加愤怒。来自第三等级的代表曾给德洛内(Delaunay)——巴士底狱的典狱长，送去一条消息，让他撤去这些激起民愤的大炮，并保证这样就能平息民愤。

这条建议倒是不错，可惜典狱长却不大聪明。由于迟迟不见信使的踪影，代表们坐立不安；街上也更加混乱。代表团终于带着消息回来了：典狱长亲口保证，除非迫于自卫，否则不会向民众开火。然而，即便当代表们在市政大厅向大家转述典狱长的托词时，巴士底狱的大炮也仍在向巴黎民众发出挑衅的怒吼！

正是那声炮响将德洛内送上了黄泉。听见炮声的市民怒火中烧。

“叛国！”人们高喊着。

“去巴士底狱！去巴士底狱！”的呼声再次响起。愤怒的民众犹如势不可挡的洪流向前涌去；人们冲上街头，并且很快就沿着高墙将这座令人憎恶的监狱要塞团团围住。一些勇士已经割断锁链，把第一座吊桥放了下来。人群迅速冲向第二座吊桥，准备发起攻势。

要塞的守卫不堪一击，防御力量只有 30 个瑞士兵和 80 名伤残军士。

人群中突然传来一声枪响；士兵们立刻还击；有几个男人负伤了；人群中又传来几声枪响；典狱长下令开炮；战斗开始了。

这是一场短暂的交锋。国王的近卫军受命镇压暴民——各级官兵纷纷投入战斗。其中，两位名叫艾礼(Elie)和赫林(Hullin)的下级军官倒戈成为暴民的首领，并带领民众向要塞发起攻击。

德洛内提出了投降，并称：如果他和他的部下能够身携兵器载誉而出，他就投降。然而，这项提议只是招来了一阵讪笑。

“我们只能够保证你的生命和安全，”艾礼说，“对此，我以军官的名义向你保证。”

听到这里，德洛内命令士兵们放下第二座吊桥，打开城门。愤怒的人群带着对那座要塞的憎恶涌了进来；他们疯狂地冲入要塞中的各条走廊与通道，用锤子砸开牢门，放出了里面的囚犯。有些犯人已经在这里绝望而痛苦地过了大半辈子。随着谜底的揭开，人民的复仇之火愈烧愈旺。

尽管艾礼和赫林曾经向典狱长保证过他的生命安全，但他们却错误估计了自己驾驭这群狂徒的能力。他们在跑远以前，曾经为了俘虏的安全赤手空拳地同民众展开较量。在市政厅广场，赫林用自己强健的双臂一把搂过典狱长，在他光秃秃的脑袋上扣了一顶帽子，以为这样可以掩人耳目。

但是,没过一会儿,赫林就给掀翻在地,被众人踩在脚下;正当他挣扎着站起来时,却发现德洛内的人头高悬在枪头上。



1917年3月,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 Nicholas II)退位。两个月之后,俄罗斯人民在莫斯科集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此时,时局相对稳定;但之后事态却急转直下,沿着暴力方向发展。6个月之后,布尔什维克们以武装政变的方式掌握了国家政权;1918年7月,尼古拉和其他皇室成员在乌拉尔山脉的一间囚室中遇害身亡。

一知半解是一件危险的事

有些人博学多才,因此不会迷失心智。有些人一知半解,只能随波逐流地跟着大家买进股票。

问题的关键是——这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保持应有的勤勉。无论炒股、从政还是将一个危在旦夕的民族推上审判台,我们都需要小心谨慎、毫不畏缩地问问自己:我究竟被卷入了怎样的事件?在以下这则取自《当代寓言》的故事里,作者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完整地展现了——一个受骗者——“一只非常聪明的苍蝇”。

一所古宅里住着一只大蜘蛛,他织出一张美丽的网来捕苍蝇。每当苍

蝇落在网上而被缠住时，蜘蛛就会出来大快朵颐。这样，当另外一只苍蝇飞来时，就会以为这张网是一个安全、平静的歇脚地。

一天，一只非常聪明的苍蝇在蛛网上嗡嗡地盘旋了许久，却并不降落。于是，蜘蛛爬出来说：“下来吧。”然而，和蜘蛛相比，这只苍蝇太机灵了，他说：“我从不在于看不见其他苍蝇的地方歇脚；而在你的房子里，我没有看见任何其他的苍蝇。”于是他飞走了。最后他来到一个苍蝇群集的地方。正当他要降落在他们中间时，一只蜜蜂嗡嗡地飞上来说：“别去，傻瓜，那是粘蝇纸。那些苍蝇都被粘住了。”“别傻了，”苍蝇却说，“他们是在跳舞。”于是他落在粘蝇纸上，和其他苍蝇一样被粘住了。

寓意：安全不能靠数量或其他任何事物来保证。

好汉不会跟随无知的乌合之众变幻无常。

——西塞罗 (Cicero)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关于领导者和应声虫的故事

W. H. 奥登(W. H. Auden)在短诗——《一位暴君的墓志铭》中，以悲伤而幽默的笔触描绘了领导在拥有绝对权力时的情形：

他追寻的是一种完美，
他创作的诗作通俗易懂；
他知道人类的蠢钝犹如自己的手背，
并对军团和舰队钟爱有加；
他欢笑时，尊贵的参议员开怀捧腹，
他哭泣时，年幼的孩童们命丧街头。

尽管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著名的故事《皇帝的新装》笔调委婉，但却异曲同工。当统治绝对化，当惟一的答

案是“对”，当人们只能附和领导者的古怪念头时，愚蠢与惊恐一样飘然而至。

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

皇帝为了要穿得漂亮，把所有的钱都花到衣服上去了。他既不关心士兵也不爱逛戏院，只喜欢驾车出去炫耀自己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钟头要换一套新衣服。人们以往提到皇帝时总是说：“皇上在会议室里。”但人们一提到他时，总是说：“皇帝在更衣室里。”

每天都有许多外国人来到皇帝居住的大城市里。有一天来了两个骗子。他们说自己是织工，能织出谁也想像不到的最美的布料。他们还说：这些布料的色彩和图案不仅非常美丽，而且用它缝制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作用——凡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极其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那肯定是最与众不同的衣服！”皇帝心想，“我穿上那些衣服就能够看出我的王国里有哪些人不称职；我就能辨别聪明人和笨蛋了。对，我要叫他们马上织出这样的布来！”

于是，他给了两个骗子一大笔钱，令他们立刻开工。

骗子们架起两台织机，装作正在工作的样子；可织机上什么也没有。他们立刻向皇帝要来了最好的生丝和最贵的黄金。他们将这些东西都揣进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空空的织机上忙碌地工作，直到深夜。

几周过去了。皇帝想：“我很想知道布织得怎么样了。”

但是，想到那些不称职的人看不见布料，他心里又觉得很不自在。当然，皇帝相信自己根本不必担心；话虽如此，他还是觉得先派一个人去看看比较妥当。

“我要派最忠诚的老大臣到织工那儿去，”皇帝想，“他能对布料的样子作出最佳的判断，因为他很有见识，而且没人比他更称职了。”

于是，善良的老大臣来到两个骗子工作的地方。两个骗子正在空空的织机旁工作着。

“天呀！”老大臣睁大了眼睛想，“我什么都没看见！难道我真的那么愚蠢？我从没这样想过，也绝不能让人知道。难道是不称职？不行，我决不能说自己看不见这些布料。”

“您对布料有什么意见吗？”一个正在织布的骗子问。“噢，迷人——非常迷人！”老大臣一面回答，一面透过眼镜细细打量。“多么好看的图案，多么美丽的颜色！是的，我要禀告皇帝说我对它非常满意。”

于是骗子们以织布为理由，要来了更多的钱、生丝和金子，并且把它们一股脑儿都揣进了自己的腰包。织机上一根线都没有放。而他们依旧在空空的机架上工作。

不久，皇帝又派出一位忠诚的官员去查看布是不是很快就能织好。他的运气比前一位大臣好不到哪儿去：他看了又看；可是那里除了空空的织机什么也没有，他什么也看不出来。

“这段布美不美？”两个骗子一面展示着子虚乌有的美丽图案，一面问。

“我并不愚蠢！”这位官员想，“那肯定是不配担任现在的职位。这样的话，我就决不能让人发现。”于是，他夸赞了一番自己看不见的布料，还表示自己喜欢那些美丽的颜色和迷人的图案。“是的，真是美轮美奂。”他对皇帝说。

城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那华丽的布料。皇帝也想亲自瞧瞧还在织的布料。于是，他选了一群特别圈定的随员（其中包括已经去看过的那两位忠实的大臣），来到两个骗子的处所。骗子们正在全力以赴地织着布，但却连一根线的影子也没有。

“您看这漂不漂亮？”那两位诚实的官员说，“陛下请看，多么美丽的花纹！多么美丽的色彩！”他们指着那架空空的织机，因为他们以为别人一定能看见布料。

“这是怎么回事？”皇帝想，“我什么也看不见？真是可怕。难道我很愚蠢？难道我不配做皇帝？这真是我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啊，真是美极了！”皇帝大声地说，“我十二分地满意。”他满意地点了点头并细细打量着织机，因为他不愿说自己什么都看不见。全体随员看了又看，也没有看出更多的东西；但他们因随声附和着皇帝：“美极了！”他们建议皇帝在下周举行的游行大典中就可以首次穿上这件华丽的新衣服。“衣服美极了”的消息就这样传开了。每个人都说不出地快活。皇帝还封两个骗子为“御用织匠”。

两个骗子在举行游行仪式的头天晚上彻夜未眠，还点起了 16 支蜡烛。人们能看见他们正在辛苦地工作，要完成皇帝的新装。他们假装把布料从织机上取了下来；拿着剪子在空中裁了一阵子；还用没有穿线的针缝了一通。最后他们说：“现在，衣服做好了！”

皇帝带领自己最高贵的骑士亲自前来。而两个骗子举起手臂，好像拿着什么东西似的。他们说：“请看，这是裤子！这是外套！这是披风！”。“这衣服像蜘蛛网一般轻柔；穿上它的人会以为身上没什么东西似的；这也

正是它的妙处。”

“是的。”所有的骑士都说。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那儿什么也没有。

“请皇帝陛下脱下衣服，”骗子们说，“我们要在这面大镜子前为您穿上新装。”

皇帝把自己身上的衣服统统脱光了。两个骗子装作把他们刚刚缝好的新衣服一件一件地给他穿上；皇帝在镜子面前转了转身子，扭了扭腰肢。

“噢，这衣服看上去多么美丽！多么合身呀！”大家都说，“多美的图案！多美的色彩！这真是一套华贵的衣服！”

“外面已经准备好了华盖，只等陛下出去，就能撑起来游行了！”典礼官禀报。

“好了，我穿好了。”皇帝说，“这衣服合不合身？”于是他又转向镜子，因为他要装出一副认真欣赏这件衣服的样子。

两名要用手托起拖裾^①的内侍弯着腰，用手在地板上东摸西摸，仿佛正在拾着斗篷；然后，他们假装手上拉着空气中的某样东西。

于是，皇帝就在富丽的华盖下开始了游行大典，街头围观的人都说：“皇帝的新装可真是漂亮！他披风下面的拖裾是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呀！”谁也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什么都看不见，因为这就说明自己不称职，或者很愚蠢。

“可他什么都没穿呀！”一个小孩儿最后叫出了声。

“真是童言无忌！”父亲说。于是，大家开始交头接耳地把这个小孩说的话传开了。

“他真的什么都没穿！”最后所有的百姓都说。

皇帝有些震惊，因为他觉得人们说的话似乎没错。可是他心里又想：“我必须完成游行大典。”于是，他摆出一副更高傲的神气；而内侍们紧跟在他身后，托着并不存在的拖裾，手也攥得更紧了。

去，用最美妙的外表把人们的耳目欺骗；
奸诈的心必须罩上虚伪的笑脸。

——莎士比亚，《麦克白》

① 封建时代欧洲贵族的一种装束，指拖在礼服后面的很长的一块布。——译者注



“所有人都想说‘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群氓心理:愚蠢与豪勇的蓄积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及其 1897 年的处女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对群众心理的各项诠释作出了巨大贡献。本书也不例外。勒庞的文字总是带着他那个时代夸大的风格,然而,他却从未停止对大众、群氓行为、领导者和跟随者进行观察。以下内容选自该书的第一卷——《大众心理》。

●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并且只有在那些情况下,聚结的人群才会展现出和那些构成人群的个体截然不同的新特点。集结时,所有人的情感与思想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而他们意识中的个性却荡然无存。一种集体心理就此形成。尽管它只是昙花一现,却呈现出了异常鲜明的特征。由于缺乏更好的表达,我暂且把集结产生的结果称为“一种有组织的群体”。你也可以根据自身偏好,使用“心理群体”这个术语。它塑造了个人,并遵守着“群体精神统一性”。

● 心理群体表现出以下极为奇异的特点:无论构成心理群体的个体

是谁,无论这些个体的生活模式、职业、性格或者智力是否相近,如果他们真的形成了群体,就会拥有一种集体心理。这使得他们的感觉模式、思考模式和行为模式,与个体孤立时的状态截然不同。某些思想和感受只有在个体形成群体的状况下,才会产生或是化为行动。心理群体是由异质元素迅速结合而成的临时事物。确切地说:这就像构成活体的细胞通过重组,形成了一个新的事物(其特质与每个单独的细胞迥然不同)。

- 在集体心理中,个体的智力天分被弱化,从而导致其个性的削弱。异质元素被同质元素淹没;无意识的特质占了上峰。

- 群体所蓄积的不是天赋的智力,而是愚蠢。

- 今天我们知道:一个群体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完全丧失自己意识中的个性。这时,他们对剥夺其个性的操控者,言听计从;其行为也完全有悖于他们自己的性格和习惯。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我们会发现:个体在群体中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很快发现:自己(他可能受到了群体释放的磁影响,也可能受到了其他一些为我们所忽略的因素的影响)处于一种特殊状态中。这更类似于痴迷的状态。神情恍惚的个体发现……自己意识中的个性已然消失殆尽;意愿与洞察力也不知所终。

- “个体构成有组织的群体”这一基本事实使得个体在文化阶梯上连降数级。孤身一人时,他可能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个体;而在群体中,他就成了野蛮人——即一种靠本能行动的生物。他具有自发性、暴力、凶残的特征,却也具备了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他自身具备的某些功能使他受到文字与图像的左右(这种情况根本就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个构成群体的孤立个体身上),使他在诱惑下作出明显有违自身兴趣或习惯的事情,也使他与原始人更为相仿。个体就是一粒沙子,和其他沙子一起,被风任意煽动。

- 在群体中,发生根本变化的不仅仅是个体的行为。即便个体仍未完全丧失独立性,其思想与感情也已经发生了转变。这种深刻的转变使吝啬鬼变成了挥霍者,多疑者变成了信徒,诚实的人变成了罪犯,懦夫变成了英雄。

- 我们可以从之前的内容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群体的智力总是比孤立的个体低,但从感情及其引发的行为的角度看,群体会根据环境的不同,优于或是劣于个体的表现。这完全取决于群体接受的暗示的本质。

- 往往是群体而非孤立的个体,在感召下为了取得宗教或者思想的胜利,舍身赴死;往往是群体为了光环与荣誉激情四溢;往往是群体在诱导



之下(就像“十字军东征”时一样,几乎没有任何的粮草与武器)将异教徒的救世主送进坟墓,或者……保卫家园。毋庸置疑,这种英雄主义是有一些无心插柳的成分,但也正是这种英雄主义造就了历史。

群体将一切尽收囊中,毫无损失。

——歌德(Goethe)



群体亦正亦邪,威力旗鼓相当。这张照片拍摄于1968年8月21日的布拉格。当时的捷克民众群集在国家广播电台的外围,抗议第一辆“华沙条约组织”的坦克进驻城内。



另外两个例子证明群体运用团队力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上图表现的情景是:1965年3月底,主张民权的领导者和支持者由阿拉巴马州的谢尔马城出发,踏上了前往蒙哥马利州首府的路程。在不久之前谢尔马的流血事件中,一名支持民权的抗议者丧生。下图表现的是:1970年8月26日,人们在纽约市的各个街道举行了“女性要求平等”的游行。



卢迪亚·吉卜林对领导与跟从的看法

在此奉上一首卢迪亚·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诗作——《是否》;它为我过去40多年中就群体狂热进行的思考,给出了最好的解答。世上所有的交易室、办公室、政府议院都应当将这首诗奉为金科玉律。我们



也应当将其铭记于心。

当周围的人都丧失理智并且归咎于你时，

你是否能够保持冷静？

当所有的人向你投来怀疑的目光时，

你是否能够相信自己却又允许他们怀疑？

你是否能够等待，不知疲倦地等待？

当你受人欺骗，不要以谎言作为交换。

当你遭人怨恨，不要将仇恨作为回应。

不要粉饰装扮，不要故作高明。

你是否能够梦想，却不会让梦想成为主宰？

你是否能够思考，却不会把思考视为目的？

无论是迎接凯旋的成功还是经历彻底的失败，

你是否都能荣辱不惊？

当你自己所说的真理被流氓们扭曲，成为愚人的陷阱时，

你是否能够忍受这些不实之词在耳畔萦绕？

当你为之奉献终生的事业遭受破坏时，

你是否能够俯身，用破旧的工具将其重新搭建起来？

你是否能够不计往昔的荣辱，放手一搏？

即便遭遇失败苦痛，也要从头再来。

即便被人冷嘲热讽，也能毫不计较。

你是否能够直面人生的转折，全情投入？

即便身心疲惫，即便一无所有，

心中却还有一个信念在高喊：“坚持下去。”

当你与平民交谈时，是否依旧能够保持美德？

当你与国王同行时，是否依旧能够平易近人？

无论仇敌还是朋友，是否都无法对你造成悲伤创痛？

置身茫茫人海的你，是否能广结人缘却又留有分寸？

你是否能在无情的岁月中，
充分利用生命航程里的分秒时光？
如果一切真是这样，
你就拥有了世间万物，甚至更多……
这时，我的孩子！你就是一位真正的勇者。

当周围的人都丧失理智时，你需保持冷静

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里，每个人都是国王，但并不是每个国王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任何组织，无论它是一支篮球队、一家钢铁公司还是一所学校，为了繁荣和生存都必须保持金字塔式的结构。生活中既有领导者也有跟随者，后者的人数总是多于前者。问题不在于每家企业里的每个人是否都有同等的权利，真正的问题是：当你自己担负领导责任时，应该如何最好地履行职责？当你被要求走在后面充当跟随者时，又该如何最好地履行职责？以下是这两种角色各自应当遵从的一些法则。

对于跟随者：

- 质疑权威。这样说正是由于：一项来自高层的指令并不见得非常高明，也并不一定具有最高尚的动机。
- 不要怕说出自己的想法。如果领导者希望集思广益，你就可以显出与众不同；而如果领导者充耳不闻，你可能明珠暗投。
- 密切关注动力。你越是觉得自己事与愿违地被周围的人群推着向前走，就越是要站稳脚跟并为自己好好地想一想。开展这项投资、加入这支游行大军的决定是你自己作出的吗？或者，你正在从群体中汲取勇气和信仰吗？

● 自己做主，起码要做自己头脑的主宰。你领着人们走出哪里，又走向何方呢？为何如此？如果你能够内外结合，更多地审视自己的行为，那么你的理解力就越是深刻。

● 相信直觉。当群体开始活动时，推理会使我们落在后面，而直觉却很少这样。一项行为不仅要有意义，而且应当使人内心感觉正确。

对于领导者：

- 容许下属的违抗——这不是一味地容忍，但你必须给出足够的空

间,这样下属才能给出好的点子并对航向进行调整。一位被应声虫包围的领导者只能听见一种声音。

● 举止仍要谦恭,不要忘记基本的物理原则:当你坐在金字塔塔尖的时候,支撑你的是下面的每一个成员。

● 问题一:你的一系列行为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还是为了那些跟随者的利益?领导者能够获得更多的回报,但他们也必须承担群体所赋予的责任,并为了共同的利益履行这种责任。

● 问题二:当旅程变得艰难,来不及争辩时,你是否在群众中打好了基础,使其仍会跟随你的脚步呢?信任不是强加的,它是无数行为的点滴积累。

● 问题三:你是否真的自己做主,或只是鹦鹉学舌般重复别人的话语、因循守旧呢?领导者不只是骑着高头大马,或占着办公室里最大的房间。如果需要,领导者在旅程中应当高瞻远瞩、勇往直前。

在最后的分析中,无论你是领导者还是跟随者,群体狂热均向个人品质提出了考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屈从于集体的冲动?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我?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自行决断?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他人为我们作出选择?不要仅仅因为想置身其外,就与群体对阵;但也不要为了和谐相处就随波逐流。群体的冲动是好坏兼备的。

自己给自己提建议;相信自己的能力;重大决断应当在寂静而不是喧闹的时刻作出。这样,当你在投资理财、投票选举或是争取荣誉时,就不会过分地偏离正确的航向。

我们不应沿路而行,
而要另辟蹊径。

——日本谚语

文本的出处

Lewis Allan, "Strange Fruit," words by Lewis Allan, Copyright © 1939 (renewed) by Music Sales Corporation (ASCAP).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secured.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Jules Archer, except from *RIOT!: A History of Mob A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 1974 by Jules Archer. Hawthorne Books, Inc.

W. H. Auden, "Epitaph on a Tyrant," copyright © 1940 and renewed 1968 by W. H. Auden, from *W. H. Auden: The Collected Poems*. Used by permis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and Faber & Faber Ltd.

Russell Baker, "Roar of the Crowd," from the June 19, 1983, issue of *The New York Times*. Copyright © 1983.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New York Times*.

Richard E. Band, excerpt from *Contrary Investing* (McGraw-Hill) Copyright © 1985.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Writers House as agents for the proprietor, New York, NY.

Bernard Baruch, Introduction to the 1932 edition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by Charles Mackay,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Elliott V. Bell, "Crash," from *We Saw It Happen: The News behind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 by Thirteen Correspondents of *The New York Times*. Copyright © 1938 by Simon & Schuster, Inc.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New York Times*.

Barton Biggs, essay on seventeenth-century tulip mania in Holland,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W. Fitzhugh Brundage, excerpt from *Lynching in the New South: Georgia and Virginia, 1880 ~ 1930*. Copyright © 1993.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Fox Butterfield, excerpt from report on the fall of Saigon i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4, 1974. Copyright © 1974.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New York Times*.

Elias Canetti, excerpt from *Crowds and Power*, translated by Carol Stewart. Copyright © 1960 by Claassen Verlag, Hamburg. English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62, 1973 by Victor Gollancz Ltd.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Farrar, Straus & Giroux and Victor Gollancz Ltd.

J. P. Chaplin, excerpt from *Rumor, Fear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Copyright © 1959 by J. P. Chaplin. Used by permission of Ballantin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Eddie Foy, excerpt from *Clowning through Life*, copyright © 1928.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Penguin, Putnam, Inc.

Robert Frost, "Take Something Like a Star" from *The Poetry of Robert Frost*, edited by Edward Connery Lathem. Copyright © 1977 by Lesley Frost Ballantine; copyright © 1949, 1969 by Henry Holt and Co.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enry Holt and Company, LLC.

David Gelman with Peter McKillop, "Going Wilding" from *Newsweek*, May 8, 1989. Copyright © 1989 Newsweek,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Charles Hardy III, excerpt from 1985 *Horizon* interview,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National Public Radio.

John Houseman, excerpt from "The Men from Mars" in *Harper's Magazine*, December 1948,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estate of Joan

Houseman.

Human Rights Watch, excerpt from paper on Rwandan Genocide from <http://hrw.org/reports/1999/rwanda/Geno11-4-04.htm> # P293 93256.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Martin Luther King Jr., excerpt from "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 copyright © 1963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copyright © renewed 1986 Coretta Scott King. Reprint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Estate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c/o Writers House as agent for the proprietor. New York, NY.

Mary Lee, excerpt from article on Nazi Party gathering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11, 1932. Copyright © 1932.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New York Times.

Robert Locke,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the Dot-Com Crash" from FrontPageMagazine.com, April 24, 2001.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Robert Locke and FrontPageMagazine.com.

"Los Angeles, April 29 to May 1, 1992." © 1992, Los Angeles Times.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Norman Maclean, excerpt from *Young Men & Fire* by Norman Maclean. Copyright © 1992.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 M. Macoll, "Stoning to Death in Jeddah" from *Daily Express* (London), February 11, 1958. Copyright © 1958.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Daily Express Ltd.

Webb Miller, excerpt from *I Found No Peace: 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Copyright © 1936 by Webb Miller.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New York Times*.

Roswell Daily Record, "RAAF Captures Flying Saucer on Ranch in Roswell Region" from the *Roswell Daily Record*, July 8, 1947.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Berton Roueche, excerpt from *The Medical Detectives*. Copyright © 1978. First appeared in the August 21, 1978, issue of *The New Yorker*. Used by permission of Harold Ober Associates.



Matthew Schiffrin, excerpt from "Amateur Hour on Wall Street,"
Forbes, January 25, 1999. Copyright © 1999.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Forbes.

James Thurber, "The Day the Dam Broke" from *My Life and Hard Times* by James Thurber. Copyright © 1933, 1961 by James Thurber.
"The Fairly Intelligent Fly" from *Fables for Our Time*. Copyright © 1940
by James Thurber; copyright © renewed 1968 by Helen Thurber and
Rosemary A. Thurber. Both stories are reprint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semary A. Thurber and The Barbara Hogenson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Harry S. Truman, "Address of the Honorable Harry S. Truman,"
given at Westminster College, Fulton, Missouri, on April 12, 1954.

Nathanael West, excerpt from *Miss Lonelyhearts and Day of the Locust*,
copyright © 1939 by the estate of Nathanael West.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 and Gerald Pollinger, Ltd.

Tom Wolfe, excerpt from an article on the Beatles arrival in New
York City from the February 8, 1964, issue of 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Janklow & Nesbit Associates for the
author.

插图与相片的出处

第一章

第 1 页: *Harper's Weekly*, February 1890. Run on a Bank.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第 6 页: © The *New Yorker* Collection 1998 Leo Cullum from cartoonbank.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第 8 页: Pieter Holsteyn the Younger.

第 11 页: © The *New Yorker* Collection 2001 Peter Steiner from cartoonbank.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第 13 页: *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 New York, April 12, 1897, Leadville Colorado Town Center.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第 18 页: *Harper's Weekly*, February 1890. Run on a Bank.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第 20 页: © Henri Cartier-Bresson/Magnum Photos.

第 25 页: © Bettmann/CORBIS.

第 29 页: © The *New Yorker* Collection 1999 David Sipress from cartoonbank.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第 31 页: *Doonesbury* © 1998 by G. B. Trudeau. Reprinted with per-

mission of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 All rights reserved.

第 35 页: © Seymour Chwast, the Pushpin Group.

第 38 页: Michael Klein.

第二章

第 41 页: AP/Wide World Photo.

第 46 页: The Granger Collection, New York.

第 48 页: © Punch, Ltd.

第 50 页: George Bellows, *The Crowd*, 1923.

第 57 页: AP/Wide World Photo.

第 58 页: © Bettmann/CORBIS.

第 59 页: © Hulton-Deutsch Collections/CORBIS.

第 60 页: © The *New Yorker* Collection 1985 Charles Addams from cartoonbank.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第 62 页: E. Hausner/*The New York Times*.

第 65 页: © The *New Yorker* Collection 1992 Tom Cheney from cartoonbank.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第 66 页: 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第 73 页: The *New Yorker* Collection 1990 Edward Koren from cartoonbank.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第三章

第 75 页: George Grosz, *Pandemonium*, 1914. Courtesy Moeller Achim Fine Art Ltd.

第 77 页: *Harper's Weekly*, New York, May 31, 1883.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第 81 页: © Bettmann/CORBIS.

第 85 页: © Bettmann/CORBIS.

第 87 页: © The *New Yorker* Collection 1979 Stan Hunt from cartoonbank.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第 88 页: John McClellan, *Panic*, 1937.

第 91 页: George Grosz, *Pandemonium*, 1914. Courtesy Moeller

Achim Fine Art Ltd.

第 94 页: © Bettmann/CORBIS.

第 97 页: © The *New Yorker* Collection 1980 Ed Fisher from cartoonbank.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第 98 页: 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第 100 页: AP/Wide World Photo.

第 101 页: Jose Clemente Orozco, *The Masses*, 1935, Lithograph,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第 102 页: Brown Brothers.

第四章

第 105 页: Brown Brothers.

第 113 页: AP/Wide World Photo.

第 115 页: © Reuters NewMedia Inc./CORBIS.

第 119 页: Bettmann/CORBIS.

第 121 页: Brown Brothers.

第 122 页: Brown Brothers.

第 125 页: Poplarville, Mississippi, U. S. A., 1959-from *Straight Herblock* (Simon & Schuster, 1964).

第 127 页: Charles Moore/Stockphoto.

第 127 页: AP/Wide World Photo.

第 130 页: Great Riot at the Astor Place Opera House, New York. N. Currier, 1849, 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第 132 页: Stanley J. Forman/*Boston Herald*.

第五章

第 137 页: Honoré Daumier, Camille Desmoulins au Palais-Royal.

第 141 页: Hans Truöl.

第 143 页: 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第 145 页: © Punch, Ltd. (October 9, 1938).

第 146 页: Illustration © 1976 by Joan Sandlin. From *The Lemming Condition* by Alan Arkin.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第 151 页: Honoré Daumier, Camille Desmoulins au Palais-Royal.

第 154 页: Brown Brothers.

第 159 页: © The *New Yorker* Collection 1979 Henry Martin from
cartoonbank.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第 161 页: © Josef Koudelka/Magnum Photos.

第 162 页: W. Sauro/*The New York Times*.

第 162 页: © James Kareles, Courtesy Howard Greenberg Gallery,
NYC.

市
场、
群
氓
和
暴
乱

插图与照片的出处

自17世纪30年代的荷兰成为郁金香投机风暴的中心以来，泡沫和繁荣就一直从经济、社会、政治各个层面塑造历史。在《市场、群氓和暴乱——对群体狂热的现代观点》中，罗伯特·门斯切按照历史年代的先后顺序，回顾了其中最具有纪念价值的往事，从专家的角度，就“如何在群众性癫狂中保持冷静”提出了建议，从而对人性的黑暗面进行一次深层次、历史性的解读。自本书出版后，好评如潮……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亚瑟·卢维特认为：“罗伯特·门斯切的历史典故，引人入胜、笔调流畅地讲述了投资者受贪婪、愚蠢和诡计毒害的种种情况……这本精彩绝伦的编年史将其统统收录。”

高盛公司前总裁约翰·C. 怀特海对此书的评价是：此书“机智诙谐、富含哲理，是一本必读之作”。

先锋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约翰·C. 伯古指出：“罗伯特·门斯切的这部精品，极富有教益地提醒着一个我们全都心知肚明却又不承认的事实：当对股价的认知与企业价值的实际状况脱节时，秋后算账的日子也就到了。”

经典作品《黄金的魔力》和《与天为敌》的作者彼得·伯恩斯坦赞誉本书“极富趣味；它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本跨越年龄阶段、财富阶层、政治信仰的必读之作……阅读时，不要蜻蜓点水，而应逐字逐句地仔细品味”。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彼得·G. 彼德森欣喜地评论道：“在历经了各种‘非理性繁荣’和‘传染性贪欲’之后，我为读到这部由一位有着非凡文笔和卓越投资纪录的人编写的充满睿智而又理性的书籍而感到高兴。”

本书作者罗伯特·门斯切系高盛集团的高级董事，高盛集团机构投资部的创建者。



<http://www.wiley.com>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Wiley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ISBN 7-81098-713-5



9 787810 987134 >

本社网址：www.sufep.com

ISBN 7-81098-713-5/F · 659

定价：30.00 元

2006